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在小说的后台 / 韩少功著.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3

( 东岳文库 )

ISBN 7 - 5329 - 1885 - 8

I . 在... II . 韩...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0 ) 第 87223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4 插页 154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 11.00 元

## 东岳文库前言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

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 目录

## 序跋

### 男性或无性的文学之后

..... ( 3 )

米兰·昆德拉之轻 ... ( 9 )

民族的长旅 ..... ( 23 )

记忆的价值 ..... ( 27 )

比喻的传统 ..... ( 31 )

平常心，平常文学 .....

..... ( 35 )

说小人物 ..... ( 39 )

两岸的共同使命 ..... ( 42 )

多嘴多舌的沉默 ..... ( 46 )

南方的自由 ..... ( 55 )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  
..... ( 61 )

在小说的后台 ..... ( 64 )

圣战与游戏 ..... ( 72 )

回望 ..... ( 74 )

食翁之意 ..... ( 77 )

提醒读者 ..... ( 80 )

美丽的眼睛 ..... ( 82 )

有生命的萝卜 ..... ( 86 )

序《黑狼笔记》 ..... ( 90 )

与遗忘抗争 ..... ( 94 )

序《惶然录》 ..... ( 97 )

人生的失约者 ..... ( 102 )

体裁的遗产 ..... ( 105 )

文无恒范 ..... ( 110 )

### 访谈

鸟的传人 ..... ( 115 )

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  
..... ( 132 )

精神的白天与夜晚

.....	( 144 )
世俗化及其他 .....	( 152 )
雉：另一个中国 ...	( 166 )
当年对床夜语 .....	( 170 )
超主义的追问与修养	
.....	( 173 )
反思八十年代 .....	( 180 )
书信	
闲邮拾零 .....	( 201 )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	( 206 )
新闻特写	
亚洲金融风暴观察	
.....	( 247 )

## 序跋



## 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sup>①</sup>

在我看来，小孩子的思维就是文学思维。他们懵懵懂懂，东张西望，一边撒尿一边把脚跟前的某只蚂蚁想象成江洋大盗，最善于发现和牢记大人们绝无兴趣的某片树叶或某道墙缝，常常莫名其妙地发出欢乐叫器。

在我看来，女人的思维也很趋近文学。她们讲话琐细和□嗦，习惯感情用事而不在乎天经地义，为了追求美丽而不畏梳洗打扮的麻烦和艰辛，极容易掉眼泪和无根无由地生闷气，常常瞥一眼就看出陌生来客身上未被男人所察觉的某些深刻特征。

奇怪的是，世界上的儿童作家和女性作家毕竟不多。曹植式的神童，李清照式的才女，在作家队伍里寥若晨星。文学如官场、商场和苦工场一样，竟也基本上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86年蒋子丹小说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以男人为主角。尤其列举第一流作家时，一长串名单里性别比例十分不平衡。文学史总是散发出男人的醺醺酒气。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眼下女作家越来越多了。蒋子丹就是湖南作家中较有成绩的一位。她得益于家学的陶冶影响，得助于家道的曲折坎坷，凭着自己敏感、机智、无所畏惧等素质，在较短的时间内，业余写出了这一本小说集。她早期写的是童年回忆的月亮岛和小毛猴，写的是女人感喟中的丁香花和故乡明月，那完全是一捧朦胧而轻柔的幻想和情感。但她获得较大影响并不是靠这些作品，而是在她愈来愈远离这个儿童和妇女的世界之后。她的精神开始走出家门，笃笃笃地闯入更广阔的外部天地，和男人们一道思索和行动，奔波忙碌，唇枪舌剑，交涉和调查，讨论和攻读——读那些多是由男人们弄出来的典籍和主义。于是她的创作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对女性心理的小敏感依旧有所延续，作品中愈来愈多地被打进了理性的、功利的、社会的新元素。她开始尖锐地批判社会庸俗势力（《出国演出队名单》），开始冷静地剖析干部心理状态（《橙红色的黄昏》），开始努力观察并表现自我经验以外的形形色色人物，或是行政科长（《话说老温其人》），或是鞋匠（《鞋后跟的故事》），或是保姆（《绿草坪的话题》），并通过他们推动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生气勃勃的思索。

至于《黑颜色》，飘忽奇诡的文字中透出冷峻艰深的形而上的人生理解，也许表现了她新的惶惑和新的觉悟。

蒋子丹和不少女作家一样，似乎并不珍视自己的女性精神特质，而愿意与男作家们同路同步，有的甚至比男人干得更好或者更威风凛凛。这是一种进步吗？当然是。

说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她们也许并未体会出自己的所长，却深知自己的所短，深知要写出文学自己还要干些什么。一位村妇几句简单的哭诉可以启发托尔斯泰或卡夫卡，甚至可以比他们的佳句佳章更具光彩，但村妇本身毕竟不是托尔斯泰或卡夫卡。村妇的心智即便是一颗可贵的艺术种子，但种子不是花朵。即便是种子已经蕴含了花朵的各种基因和潜在机制，但它如果想成长壮大，却还需要各种养分及各种复杂的分解化合过程，还需要太阳——整个人类文化成果——的光照。否则它必定在泥土中腐烂，必定被村妇所可能有的无知、保守、狭隘所淹蔽。女人首先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而存在的。不公正的历史曾把她们久久遗忘在家园之内锅灶之旁，造成了她们生理——心理上的畸变和欠缺。她们的解放，当然需要她们像男人那样参与社会，求取功利，强化理性，实现与现代文明的沟通和融会，成为健全的人。她们中间的很多人，常常鄙弃那种作娇作痴卖俏卖乖等等过分的所谓女性感，正气昂然又大义凛然，

表现出一种男性化或“无性化”的倾向，难道不是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反弹？不是折射了她们努力纠除历史偏弊而实现妇女全面解放的一种心理冲动吗？

当然，很难说蒋子丹眼下写的就是男式小说——任何感觉和概括都是很褊狭的。而且她好动好变，将来作品中出现什么新的元素，思想艺术品格将向何处演变，现在都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更大成功将取决于她是否进一步扬长补短和扬长避短。

作家们各有长短，根源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个人气质禀赋和阅历经验的因素，也受制于生理——心理的条件。就这后一点来说，男人和女人的作品终究不会完全一样的，也毫无必要是完全一样的。妇女的解放，也许并非最终是要让女人酷似男人，等同男人，成为男人。时下并不少见的一些现象，如男人女装，女人男装，男人女气，女人男子气等等阴差阳错大概只是妇女解放的误区。

真正的妇女解放，也许不但体现于她们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普遍价值，还体现于她们实现自己作为女性的特殊价值，即她们在与男人趋同的过程中还推进趋异的过程，发挥自己精神上的长处和优势——何况这些长处和优势中可能潜藏着巨大艺术能量。上天使她们美丽、聪明，细巧而且富有同情心，身体柔弱而声音清脆。使她们与孩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更易领悟生命存在的种种奥

秘，更多地受到童心的感染。不少学者还证明：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善于直觉，更有耐劳的韧性，有更好的听觉和语言能力，更习惯隐藏她们最深的感情……当然，她们的平均脑重比男人的大约少六盎司，这种差异将带来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如果她们把自己生理——心理所有特性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投入文学创作的熔炉，是能燃烧出十分异样的光彩的。这种燃烧需要她们进一步开掘自己，在更高的层次上健全和解放自己，更好地创造和施展自己的独特心智。因此，如果说蒋子丹曾经历了“写得像女人”的最初境界，那么，庶几乎“写得像男人”则是她难得却并非完满的第二境界；今后，她也许还将进入“写得又像女人”的更新境界，她的作品将越来越与她本人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我不能说女作家都该这样，我只能说有一些达到过这种境界的女作家，比如中国的李清照，英国的夏绿蒂·勃朗特，美国的那位“家庭妇女”——狄金森。这些作家以她们特有的魅力，以她们苦涩而灿烂的主题，展示了一个个伟大女性的丰富心灵，无疑成为女作家史册中最动人的几章——而所有的男作家概莫能及。

她们是不可替代的。

写得像女人或男人，正如写得深沉或明朗，从根本上来讲不可刻意求之。

蒋子丹已经写出了一本书，她如果愿意继续写，就

静静地写吧，不要管人家怎么说。她当然能够写得更好。

一九八六年七月

（此文为蒋子丹小说集序言）

## 米兰·昆德拉之轻<sup>①</sup>

### —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很多“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文学热。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位作家大概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判别文学高下的标尺，他担心青年作者视野褊狭的好心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之外，这位大作家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的小说，甚至连东欧当代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谈论“反映”“问题”一类？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87年翻译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了的学问，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决无方块三之类的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时髦的场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那种不见作品的沙龙空谈。

## 二

东欧文学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两先生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支等等东欧作家，也早已进入了中国读者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其部分诗作也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

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其实还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 三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此书颇为推崇。《新闻周刊》曾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

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藉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自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为了主潮。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

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呢？

#### 四

我们还得先了解了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带领学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日增，后来法国总统特授他法国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一九六八

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首先都是以法文译本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 五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的严厉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的失落,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了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强权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不够,但

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入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情绪的、深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 六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哲学的贫困和审美的粗劣，使它们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色。昆德拉也写政治，用强烈的现实政治感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在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示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是乐于并长于作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入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

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 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 Kitsch，失掉了最开始那种解放个性的初衷。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引自小说中的描写）。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 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

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说。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 indifferent 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冷漠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小说，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 indifferent 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到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入俗和出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度向的

小小圆点。

## 七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尔特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他并不着力于（或许是并不擅长）传统的实写白描，至少我们在英译本中未看到那种在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等等方面的良苦心机，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常常表现出来的。用轻捷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用轻松的文体开掘沉重的主题，也许这形成了昆德拉小说中又一组轻与重的对比，契合了爱森斯坦电影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必须对立冲突的“张力（tension 或译：紧张）说”。

如果我们没忘记昆德拉曾经涉足电影，又没忘记他曾经作为爵士乐手的经历，那么也不难理解他的小说结构手法。与时下某些小说的信马由缰驳杂无序相反，昆德拉采用了十分特别而又严谨的结构，类似音乐中的四

重奏。有评家已经指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第一小提琴），特丽莎（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中提琴），弗兰茨（大提琴）——它们互相呼应，互为衬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主要旋律。而托马斯的窗前凝视和萨宾娜的圆顶礼帽等等，则成为基本动机在小说中一再重现和变奏。作者似乎不太着重题外的偶作闲笔，很多情境细节，很多动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转接和照应，也很少一次性消费。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的否决，似乎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机性极强的人事经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张力”。

文学之妙似乎常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在于两极之间的电火。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张力，有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张力，有情绪与情绪之间的张力，有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的张力。爱森斯坦的张力意指内容与形式之间，这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矛盾，由内容渗入了形式，由

哲学化入了艺术。

而形式化了的内容大概才可称为艺术。

## 八

有一次，一位朋友与我谈起小说理念化的问题。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错，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角度看去也有几种，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例证。只有在人生的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且不说某些错误褊狭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在文学领域里，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着的理念，与血肉浑然内蕴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经过岁月的淘洗，也许终归要失去光泽。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呢？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密切关系。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现代作家中，不管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萨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等又推出了一批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也许昆德拉本就无意潜入透明的纯艺术之宫，也许他的兴奋点和用力点除了艺术之外，还有思想和理论。已经是现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发展，既然人的理知与情感互为表里，为什么不能把狭义的文学扩展为广义的读物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第三人称叙事中介入第一人称“我”的肆无忌惮的大篇议论，使它成为了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而且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结合，现代主义先锋技巧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结合。作者似乎想把好处都占全。

## 九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序结构内寓藏着的意味。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又不

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尤其西文中丰富灵活的虚词功用，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读通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于面向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比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译者误解，他写作时就特别注意遣词造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的基础。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地说起来，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都令我诚服。

但是，为了了解兄弟民族的文学，翻译仍然是必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地作一种肤浅的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从捷文中直接译出昆德拉的这部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 十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一九八七年一月

（此文为翻译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序言）

## 民族的长旅<sup>①</sup>

三年前，我在湖南省苗族地区兼职，对当地苗族的生活很感兴趣。比如服装，苗族男子多着汉装，尤其眼下的少年，多是喇叭裤或牛仔裤的爱好者；“港味”、“洋味”颇足。惟苗族的妇女，仍穿戴着她们的头帕、银饰、腰裙等等，以昭示着苗族传统的尊严。这种男女服装之别，传说源于汉将马援南征时，苗民“男降女不降”。似乎男子汉都熊包，竟纷纷易服以降，全然不如妇女们仍把头帕戴得英雄慷慨。另一句话是“生降死不降”，即男子虽生时有点“服装卖族主义”，但死后仍无一例外地身穿民族服装入殓，以表达死是苗家鬼的心愿。这种传说与解释虽不大可信，但细细想去，其中的悲壮和美丽却使我感动。我宁愿相信这一种不是真实的真实。

苗族在中国分布很广，其族源的考察是一个远未完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2年《海南苗族民歌》，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成但又极有意味的课题。手头有一九四七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凌纯声、芮逸夫两人所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两卷，有苗族学者石启贵一九四〇年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册，这两种著作材料丰实，考据严谨，在湘西苗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内功绩卓著，至今后无所继。它们的作者均从“苗族西来”说，认为苗族源于甘肃、陕西一带，只是因为战争，被以黄帝为代表的汉族部落所逼迫，才流落迁徙至长江以南。近代诸多学人如王国维、章炳麟、范文澜等，也大多持这种观点。

另有法国人萨维那，著有《苗族史》一书，以更强的想象力，测定苗族发源帕米尔高原。根据苗族古歌中关于冰天雪地以及“半年白天半年黑夜”的某些记载，洋学者认为这些歌谣在地理学知识十分贫乏的古代，只可能产生于北极地区，至少，苗族迁徙的足迹，一定曾留驻于里海之滨或更靠北的一些地方。这些说法也许杂有附会，但苗族中那些极地雪国风光的遗痕，你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幽深神秘的谜。

路途遥遥，山重水复。苗族的先人们就是这样唱着歌，从远远的西陲走来的。在湘西，在黔东，在川、桂、滇等地，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子孙，他们的谷种，他们的爱情，他们关于生和死的歌唱。每当月朗星疏之时，苗山里就会飘溢出那清冽、尖利、高亢的歌声，牵动着满山木叶颤抖，牵动着山涧溪月碎碎的波动。这个时候，你仰望

星空,也许会突然感觉到,我们的地球在这个广阔漆黑的宇宙间孤独长旅,它是必定要发出这种声音的。

当我来到海南岛,我才惊异地发现,苗族的先人,不仅从帕米尔高原跨过了长江,而且还在继续南下,大约于明代初期横越了琼州海峡,登陆在海南北黎港,直上五指山峰,在面临太平洋茫茫天水的天涯海角,才最终停止了寻求的步伐。五指山,是苗族几千年南迁史最后的句号吗?好像被一个神圣而不曾言传的目标所引导,他们一代代地脚踏星霜长旅,到底是在寻求什么?在奔赴什么?

这不是一个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诗的问题。而诗的问题如屈子《天问》,不可能解答。

苗族诗人李明天赠与我一本《海南苗族民歌》(李明天搜集整理,海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使我有了一本有关海南苗族的资料。苗族是爱好歌唱的民族,无事不可入歌,无人不爱唱歌。因其没有文字,歌谣更成了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重要工具。

李明天细心将其发掘搜集,分类整理,考证注解,倾注了他对故土乡亲的热爱,对研究海南苗族历史文化可说是难能可贵的奉献。这些民歌朴拙纯真,当然不是给那些见钱眼红未商先奸的冒险家们看的,也不是给那些成天以劲歌劲舞武打片聊补空虚者看的。这些民歌,

只能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常常被广袤大地、被浩瀚海洋、被椰林深处如水月光所深深感动，他们和很多苗族歌手一样，知道歌并不是唱出来的，只能从心里流出来。

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被许多现代的男女所耻或不屑，其实这正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作为，如同真正的大智者，才懂得童心的纯净弥足珍贵。工业发达之时，更应注意保护人性和自然，保护人性与自然结合的成果——民族民间文化。我曾在美国见到许多印第安文化保护区以及博物馆，印第安人常驱车去那里聚会，载歌载舞，手足情深。美国在文物保护、资料整理、习俗保持和推介方面的浩繁工作，实在令人惊叹。研究非洲、南美、中国民间文化的专家现在也多。有一教授在中国含辛茹苦三载，只是为了陕北地区的民间剪纸，并以此而自豪。他们的坚定，是人性的证明。

也正是在那里的明尼苏达州，我见到了苗家妇女正行于陌上——她们和亲人多为越战时期从印度支那越洋过去的，在那里建立了新的苗寨苗村。我不禁想到，苗族真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民族，生之长旅不止，几乎不声不响就越过了大洋。可以肯定，以其勤劳和友善，他们的歌声也将使大洋那边的月夜更加迷人。

一九九〇年三月

（此文为李明天编《海南苗族民歌》序言）

## 记忆的价值<sup>①</sup>

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名词是愈来愈显得生疏了——尤其是对于流行歌曲哺育下的新一代人来说。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

毕竟有很多人忘却不了。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串铃铛叮叮咚咚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地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晴夜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0年《知青回忆录选》，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里无声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里了，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或函大文凭，代表美国绿卡，或是代表个体户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格出丝毫毕致清晰图影——如那远方的村落。

这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惟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到了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衣衫褴褛，身无分文，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们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这梦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不仅后辈人将讨厌任何用作炫耀和教诲的苦难，连他们曾密切相关的友人，也毫无义务要把他们的苦难看得特别要紧。我曾返回当年落户务农的乡村，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已行行列列地高大

着，对寻访旧地的知青只能漠然。一些旧相识已多老态，谈起往事也只能闪烁其辞只鳞片爪，像谈起远古一个模模糊糊的传说。除了找到某堵旧墙上半块褪了色的油漆“语录牌”算是知青可笑的遗迹之外，那里没有纪念碑。

不会有纪念碑，不会有金质勋章，不会有档案馆史料办离退休老知青活动中心，甚至未能熬过那岁月的男女学友们，远方的坟前不会有鲜花和新土年复一年。关于遥远村落的梦境，只能默默地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不值得沮丧。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禽兽。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忆还有别的什么吗？难道是舶来的电视机和冰箱？或是吃过了又拉过了的酒肉？

幸福已存在了上下数千年，并不是电视机和冰箱时代的专利。幸福也将伴随人类继续下去，行将经历谁都阔绰得根本不用电视机冰箱当然更不靠油灯照明的时代。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任何人都幸福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记忆的富有。

步入中年的知青们，历史已在他们记忆的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骨后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多

一些迈向前路的沉着。

由我们几位朋友通过一份杂志开始征稿，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后编辑完成的这本《知青回忆录选》，就是献给这些人的。

愿他们在睡梦惊醒时，这本小书能陪伴他们到天明。

一九九〇年五月

（此文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知青回忆录选》序言）

## 比喻的传统<sup>①</sup>

《女女女》不是一篇关于女权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一位有厌女症的男人在发泄他的刻毒。事实上，这位作者是热爱女人的，并觉得这个世界的毛病多半要由男人负责，由那些商界政界乃至权威学府里装模作样的男人们来负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男人比女人丑恶。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但这篇小说并不接触这样的主题。另一方面，作者甚至不愿意接触和服从任何主题，对任何因果关系的概括都觉得粗糙可疑。随着叙述的推进，他的思考总是充满着失败感，比如对肯定与否定的奔赴，对乐观与悲观的奔赴，常常适得其反。中国有些古人用闭口不言或打哑谜来应付这种处境。同样，作者在这里也只能回归到“吃了饭就去洗碗”这样原始而简单的生活信念。在他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1年韩少功法文版小说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看来，持有这种生活信念的人，其心灵是比较安全的，能够抵御浩繁哲学教条的侵扰——虽然这不是一种积极的解决。

么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之下驯良而克己的妇女，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她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所谓同情心的脆弱。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和尴尬。她的死亡也是一句长缓得使人难耐的符咒，揭发着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着神在黑暗里仍然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

如果我们把血淋淋的世界大战或连续三年的五谷丰登，看成是某句符咒的应验，也许并不会使某个中国乡下农民感到特别荒唐和难解。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没有西方科学与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和人生的见解。比方说，他们会振振有辞地断定，某个人的死亡与地震有某种关系，某一棵怪树与邻近一位妇女的不孕有某种关系。在民间传说中这一类丰富的见解，是另一种知识，另一种逻辑。它不过是把假想当成了真实，或者说，是把假想中或多或少的真实因素加以强化，用来支撑自己面对世界的信仰。

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当然是荒唐的、不实用的、有损国计民生的。但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笃信不疑

的种种“真实”，不也是不断被查证出或多或少的假想因素吗？地心说与日心说都过去了，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什么的也将要过去，科学与理性总是有局限的，有时还会使我们心胸十分狭窄，性灵十分呆滞，比方说我们真的认为，某个人的死亡与地震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尽管这个想象有些夸大甚至永难证实。

事实上，科学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假如征兆、报应、机缘、参悟、幻觉、宿命、神秘感应等等全部被科学排斥，假如真实不能得到假想的滋养的佑助——就像西方早已发生而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么美就没有了，生命的丰富性就没有了，文学作品乃至语言中的比喻也不会有了。几乎每一个比喻都隐含着对科学的背叛，都是假想对真实的拒绝和超越，都使人的心灵有了不同于电脑的特殊价值。把女人说成花，这是最普通的比喻。一个是人，一个是植物，把人说成是植物，这不真实，不符合科学的常识。比喻通常就是在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寻找它们的相关，指示它们某种共同的本质。比喻把科学所割裂的世界，予以艺术的联系和整合，表现另一种真实。越是精彩的比喻，本体与喻体之间就越具有科学所判定的差异、阻隔、距离，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不会把女人比作女人，只会比作花、星星、流水、鸟或诗。比喻总是在寻找对科学常识最强烈的对抗。

比喻是文学的基因。比喻寓含了文学最基本的奥秘——在语言日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今天，仍然顽强固守着人类的神性，人类的美。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一，就是不仅仅把比喻当作修辞的手段，而当作对生活本质的理解，由此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使自己宁静和丰足——尤其是中国的民间文学。这样的作品会有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甚至鬼鬼怪怪。我希望法国的读者能够给予理解。如果我的小说无助于这种理解的话，那是我的笨拙和肤浅所致，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一九九〇年六月

（此文为法文版《女女女》自序）

## 平常心，平常文学<sup>①</sup>

黄茵这本小书本来是不适宜由我来作序的。因为我碰到什么事爱瞻前顾后，寻根究底，而她想什么问题似乎都不愿往深里去，瞬间即止，感觉便可，女式的喜乐哀愁飘忽而零碎，全无定数，不能让我过瘾。但是读完这一百篇后，我又庆幸她不似我这般拘泥于前后与根底，才保持了自己生活感受的率真、简捷、鲜活以及稚拙，才能够在生活里俯拾皆美。美是不可能有什么定数的。淡抹是美，浓妆亦美。自由之轻与责任之重都可以闪耀光辉，全看你有无对美的敏悟。黄茵爱吃，爱旅行，爱流行音乐，爱交朋友而且爱把男朋友统统称为“男孩”，常常在凡人小事中捕取开心的根据和爱慕的目标，形成了她特异的人生。这等福气恐怕主要是因为她尚未被成人思维污染太甚，有时候发点小脾气生点小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2年黄茵散文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哀怨也决不往深里去，在只存在于一个个瞬间的世界里，她是着着实实如孩童般生活也希望别人都是孩童的。说这不深刻，也对，这一百篇自然不是圣经不是资本论甚至适宜在儿童商店里陈列出售，但深刻也常常很危险，常常被我等平庸之辈拿来肢解美感，干些成年人的蠢事。正如一些半吊子专家学者，倘若他们一看见花便想起花的拉丁学名纲属科目产地用途化学成分，或想起花的传说掌故名言警句人格比附意旨寄托，深刻倒是深刻了，但较之一位叫叫喊喊采着花的孩童来说，他们心中少了多少花季里的惊喜！

说黄茵完全是个孩童也不对。她的开心与爱慕中其实也伏有无法排遣得开的繁杂与深重。这本小书的后半部分，忧患的声部似乎渐强，她开始羡慕活得完全传统的父母，她开始寻索自己烧菜与挣钱的某种终极意义，茫然于自己对潇洒与平实的选择，在黄昏时空荡荡的居室里她活得如一位哲人。当这些现代的尖端话题和超级自疑冒出来时，我暗暗为她捏了一把汗。这些问题不去深究也罢，倘若深究又不得彻悟，用她的话来说是不得通透，高处不胜寒，便会苦矣哉黄茵。一个人要有点智慧并不难，智慧得有些傻头傻脑就不容易了。天下的知识人士尤其是知识女性谈起人生多悲苦之言，就因为他们有了些知识，于是心志远大，想追求某种高层次的活法，但他们的知识又往往不够通透，悟不到平平常常才

是真才是福才是美的大道理，所以被知识所累，倒不如愚笨一些的人还多少能守着点自己的执著与宁静。古人推崇平常心，这实是人生智慧的精要。黄茵是有平常心的。我愿她的尖端话题与超级自疑在穿越思索的惊涛骇浪之后，仍能通向一片平常心的绿岸，仍能通向她快快乐乐的厨房和旅途，并在那里收获更多不瞻前不顾后不寻根不究底的美。倘若不是那样，她就只能是活活被所谓知识毒害了去——如同时下众多焦灼不宁的男士女士，苦海无边。

黄茵对写作也是平常以待的，并不刻意于玄奥与花哨，拿起笔来就像聊天，于是运用短章随笔这种体裁也是很自然的结果。文学样式与生活常态的疏离实是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小说太像小说，散文太像散文，太显技巧与规则，种种专家化和仿专家化的文字面目愈渐生异，最后只能退到专家圈子里去自家热闹，与大面积的读者没有多大关系。看那种文字便如同观赏舞台上的高难度表演，端坐而仰视，看久了难免乏力。因此现代人常常感到更大量地需要亲切而随意的聊天，需要某种聊天式的文学。小说家重新重视给报刊写随笔、游记、书信乃至日记等“日常体”便是可能的一种动向。自然，这不应成为取巧和偷懒，而且并非所有的聊天都是文学。在主席台上对着话筒聊的，多是政策；在菜市场或办公室里聊的，多是新闻；惟有夜深人静之时与密

友对床长谈的内心隐秘，才可能是文学。黄茵的这一百篇里，很多篇便是这样的文学，读者不难从中读出雨的凉意和夜的静寂，读出孤灯的余辉。

我与黄茵仅仅见面两次，谢谢她寄给我这一叠初稿，使我认识了她这个人，认识了另一个世界。她笔下的平常心给了我快乐，她使文学重返平常人的努力，我很赞成，于是便说几句这样不咸不淡的话。

一九九一年七月

（此文为黄茵散文集《咸淡人生》序言）

## 说小人物<sup>①</sup>

去年海南开了一个小说讨论会，两位年轻小说家受到与会者关注和热烈讨论，张浩文便是其中之一。他陕西人氏，身材魁伟，声宏气旺，在文学理论的专业成果之外，在大啖羊肉泡馍和业余经营出租车和追赶着教训儿子之余，还出手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故乡的小说，就像他一直迷恋着的关中辣椒、风沙、秦腔，还有闹社火时的锣鼓，热烈而响亮。他的创作不能说没有毛病，综合素质还有待增强，但笔下一些描写已颇能使人神旺，多短句，用险字，色彩浓重，造型诡异，于紧要处总是能有声有色生龙活虎地入微，既有传统的古拙和简练，又有现代的武断和张狂，显示出作者对语言品质的敏感和叙述个性。

他多是写贫贱的小人物，写他们在黄土地这块广袤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3年张浩文小说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无垠的舞台上熬人生，有生存的苦斗，有心智的曲扭，还有悲情和壮怀的燃烧。如果说小说是生活的镜子，那么他这种小说似是一种透镜，穿透政策、肤色、楼房、服饰、流行语言和热门话题——这些东西都太容易变换——而直指人类千万年来的某种终极和永恒，将生命恒态赤裸裸地显示在焦点下。这种小说不是思想的剖示，不是新闻的猎奇，也不大有轻歌曼舞或马戏杂耍的愉悦。它只是拓展一种视野，一种使人们超越有限现实环境的视野。在这些远眺的作者们看来，不管活在什么时空环境中的人都还是人，都在面临着生存的天问——这是更为重要和更不应回避的现实。

小说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和形式，本身就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比如关注小人物，就一直是小说的传统之一。小说家们因此也一直顶着社会良知的桂冠。这种传统也许源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贵族叛逆者们人道主义的道德自省和道德自救——那正是现代小说的成熟期，一部部小说都弥漫着悲悯，大师们总是习惯在贫民区汲取激情。时至今日，工业与民主潮卷全球，贵族与悲悯俱往矣。散发出滋补品气味的市民社会消解了旧式的文化专制等级，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缺血症。几乎过剩的文化消费中，道德自救逐渐让位于欲望解放，对小人物的悲悯逐渐更多地置换为对大人物的仰慕——或是仰慕名伶，导泄着人们对性的欲望；或是仰慕政要巨商，导

泄着人们对权势的欲望。不难看出，这正是消闲小报的作为。小说在今天的危机，当然在于手法和技巧，在于它必须在电子产业面前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功能；但小说的危机更在于小报化社会心态的四面铁壁。从贵族社会里突围出来的小说，正艰难地移植于市民社会的冷土。

一个人都追慕大人物的时代，一个人都追慕大人物并因此对贫贱和屈辱装聋作哑的时代，大人物也就渐渐可疑，很容易成了恶心的橡皮人，不管抹上多少油彩戴了什么假发，顶多也只能成为支撑时装的商业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能导致一个优质大人物减产的时代到来。这个时候，一个农家孩子无意对形形色色的橡皮人作媚，他情愿回过头去，眷顾和表现着他的父老乡亲，眷顾和表现着他的情感家园，因此不论他手法如何变异，也无论他的变异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无疑在承传着某种真正的小说精神。应该说，他比很多畅销小说更能代表小说，是这个时代人数越来越少的小说家之一。

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要不断变化的，很多东西是永不变化的。这是我在读小说时突然想到的一句老生常谈。

一九九二年十月

（此文为张浩文小说集《狼祸》序言）

## 两岸的共同使命<sup>①</sup>

源于欧罗巴的现代化巨潮，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神奇涌现，同时也使传统的文化陷入了商品的十面埋伏之中——这在没有经过文艺复兴也没有经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广阔东方，在一个多世纪来深患文化自悲心理症的贫瘠东方，尤其是如此。金钞君临一切。西装和汽车繁殖着最强势的某种文化，覆没和改造着我们曾经熟悉的家园。

有些民族已经在文化上亡国了。像某些非洲小国，独立多年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大学，官员和教师一律持欧美的留学文凭，算得上“全盘西化”。可惜的是，这种文化上的整体换血，从没有带来过真正的昌盛发达；相反，文化上的自我毁弃和消解，只能使民族更加散弱，更加丧失生长机能，最后也一一困于经济的泥沼。这些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3年唐玲玲随笔集。

国家的精英们痛定思痛，发出“重新找回黑非洲”的呼吁，却是在一次次错过机会之后的病危时刻，指示垂亡的警灯正在频频闪亮。

东方的情况似乎好一些。日本及东亚几片沿海地域的经济繁荣，终于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面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不难看出，无论“儒家资本主义”之类概念是否准确，无论这些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成功，最基本的事实是，东方这一条文化恐龙似乎没有死亡，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脱胎换骨，在涅■中再生。应该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已经迈出的一步。对人类的精神重建作出独特贡献，作为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可以期许的未来。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经过多年的阻隔，海峡两岸的文化分流殊道，甚至在文字上都留下了诸多印痕。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来看，不仅是简繁体的不同，大陆奇特的“文革”语汇，台湾人就不大能懂；而台湾汉字中也有很多奇异面孔，让大陆读者觉得眼生，比如“作秀（show）”、“草根（grassroot）民主”，而“野心”一词受西文影响，已不怎么含有贬义，等等。但海峡两岸毕竟共同背负着两千多年的华夏历史遗产，共同承传着方块汉字里潜流着的思想、情感、气质、秉性，仍然有大海隔不断的亲近血缘。当大陆的青年纷纷要求姓“毛”并将领袖像章血淋淋别入自己胸脯的时候，台湾的一切红色则有“匪”嫌，连

公共汽车的序号因为忌“匪（八路军）”而法定地统统空缺“八路车”。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无法征服欧美的图书市场，却能在海峡两岸一次次掀起相似的销售热潮，令对立政党的子女都如痴如醉，废寝忘餐。不难看出，文化是能跨越地理障碍的，是能融贯不同政治营垒的。中国人毕竟就是中国人。海峡两岸尽管有很多差异，但在中国扬帆驶向现代化的航路上，我们搭载着同一条文化之舟，命运与共。

作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先行者之一，作为海南访台学者第一人，唐玲玲教授将自己的访台观感汇成一书，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的情况。这本书的视焦主要投射于台湾的文化界，向我们展出了另一批中国文化人的信念、风貌、趣味以及事业的实绩。虽然只是匆匆的速写和扫描，但我们仍然可从中大体感受到他们顽强的生力。他们经历了集权专制主义的重负，又正在面临金钱专制主义之下的道德恶质化和文化劣质化等等严峻挑战。如果说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比大陆早了十多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正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前卫阵地。他们的战果和伤亡，他们的进取和沉沦，他们的欣悦和痛苦，无疑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台湾问学记》的重要意义之一，恐怕就在于此。

十七天的访学毕竟时间太短，哪怕再加上十七个月，我们也很难保证考察得深透。我们只能期望海峡两

岸文化交往今后更加密切，使唐教授迈出的这一步很快被超越——我想这也是她的愿望。这种交往不是礼仪，不是旅游，也不是润滑政治分歧的某种弥补，只要我们不愿重蹈某些非洲小国文化亡国的覆辙，只要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当今世界文化演进的现实版图，我们就能知道，一切中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激励、互相借鉴、互相帮助，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就能知道，改造和复兴中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大而无当信口开河装装门面的话题。

工业文明漫流全球，在不同的地方结出不同的文化之果，在英国有绅士风度，在美国有牛仔风格，在法国则是自由女神精神……它将在屡遭文化他杀和自杀的中国生长出什么呢？我们现在还难以预测和具体规划。但我们至少知道，它不应该也不会只留下一片文化沙漠和人性的流逝——海峡两岸的人已越来越清楚和痛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最近某些台湾报刊接连刊载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言论，警惕商品社会实利思潮对人性的负面影响，力倡人文精神的重整和创造。无论这些言论是否粗浅，我以为也应该引起大陆读者的兴趣和回应。

耕耘的好时节已经开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好园丁从来不误农时。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此文为唐玲玲《台湾问学记》序言）

## 多嘴多舌的沉默<sup>①</sup>

我所说的，我并不那么相信。

甚至连刚才说的这一句话，也可以立即使我陷入踌躇和犹豫。

比方说，“我”是什么意思？物质的我为汉族男性，七十多公斤，由骨血皮肉组成，源于父母的精卵以及水、空气、阳光、粮食、猪肉、牛肉等一切“非我”的物料，“我”就由它们暂时组合并扮演着。那么心智的“我”呢，从儿时学会说第一个词开始，每个人都接受着先于他存在的文化的训练和塑造，脑袋里的概念来自父母、朋友、教师、邻居、领袖、学者、新闻编辑、广告制作者、黑压压的大众等一切“非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来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某种代理，某种容器和包装。没有任何道理把我的心智单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2年韩少功散文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独注册为“我”，并大言不惭地专权占有它。

换一个主词来看吧——“相信”是什么意思？人类几千年来“相信”的真理，总是不断被新的认识超越，暴露出不值得过分相信的褊狭和肤浅。而且“相信”意指赞同、信任、认定，是一种对真理的理智行为。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已经类似会议厅里神色庄重的讨论者，已经暗示了一种前提：人是理智的，是能够而且乐意接受真理的，是一些讲道理有礼貌也不会随地大小便的可爱的生物——我们在描述狗的时候从不用“相信”这个词，就自证了这个词的高尚性，人性。但是，“相信”在欲望面前一直是脆弱的，我们“相信”着人应该洽处自然，同时却因为贪欲一直毫不犹豫地污染和破坏着环境。我们“相信”着暴力是邪恶，同时却因为贪欲一直漠视或制造着这里那里的流血。贪欲一次次在心中炽燃，常常不被真理遏止；相反，却重冶重铸出顺心的真理，“相信”便成为这种改造工序的一系列许可证，成了一种自欺欺人，一种对人性失灭险状习以为常的掩盖。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词，无异于纵容人类对自己理智品质的夸饰，默认长期匿名而无形的普遍性虚伪。

只要稍加注意，语言就显得如此令人举步艰难。而语言所垒砌的思维大厦，如何能使人安居？任何一个词，都是某种认识的凝定，也是对现实大大简化了的命

名，就像用一纸结婚证，来象征一次婚姻。认识的主体在不断流变，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流变，它们组成并不断置换着词的隐秘含义，层层叠盖，错综复杂，暧昧不清，它们只是在某种社会读解默契之下，才被人们有限地探明。因此，结婚证不等于婚姻。语言符号总是与真实或多或少地疏离，如同禅宗宣称的：凡说出口的，不是禅。

语言同时体现着人类认识的成就和无能，语言使人们的真知与误解形影相随。如果说语言只是谎言的别称，这也是至少说对了一半的苛刻。但我们还是需要言说。包括禅宗，除了棒喝踢斩之类的公案，他们不比别人说得更少。包括量子论大师 W·海森堡，他深深苦恼于“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谈论原子的结构”，但他还得滔滔不绝说下去，用逻辑的语言来表达非逻辑，用确定的语言来表达非确定。他们为突破人类心智的大限之一——语言遮蔽——而进行殊死的搏杀。

于是，一种新的语言观出现了，一种非语言的语言正日益呈现出文化活力。言语者对自己所言时时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对语言的信用指数时时怀有深深的警惕。或是对意指对象的警惕——当他抨击“贪欲”的时候，他知道贪欲差不多就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动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神奇涌现的基本条件，而且是激发、孕育、锻造、标测善良的基本条件。或是对意指方式的警

惕——他“表现”孤独的时候，他知道孤独一经表现，就已经悄悄质变为炫示、哗众、自我赏悦，甚至是一种不甘心孤独不愿意孤独而渴求公众目光投聚的急迫展销。

语言表象所遮蔽的真实纵深，总是被不断揭发出来，令言说者大吃一惊。

人们面对圈套四伏陷阱密布的语言，当然不必要闭嘴。恰恰相反，取消了对语言神圣化的庇护和优宠，语言才获得更为健康和充实的生命。任何表述仍将是有意义的，仍将是人们重要的精神载体。新的言语者更为强调的只是：为了使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来，应该视言语过程比目的更为重要，“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换一句话说，“什么”是有的，但更多地存在于“说”的过程，“什么”就是“说”。任何名词都成了动词，任何动词都成了不及物动词——语言被悄悄地动态化了。他们几乎不再以为自己能说明什么，不承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的结论，不提供任何稳定的一点，不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而迫使自己与听众不停地驱动思维作持续的航行，一刻也无法怠惰。真诚和智慧不在港湾里，而只是远航过程中的无限风光——这就是他们想表述的“什么”所在。

对于艺术家来说，恐怕尤其是如此。科学是物人的需要，是有限之学，最终落实于对物的操作，在操作中

必须非此即彼。艺术是心人的需要，是无限之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梦幻中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科学家与艺术家都有言语的自疑，但各自的语言体系纲属表里不一样，结构功能大体上仍可二分。科学家说：我虽然不那么相信我的话，但在眼下已作限定的物界，只能相信。艺术家说：我虽然相信我的话，但面对时空无限的心界，我只能不那么相信。

对语言的清查显示出：主观已被客观浸染，客观已被主观渗透，所谓真实已无家可归，只能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流浪。

对语言的清查还显示出：善良中有罪恶的潜伏，罪恶中有善良的隐存，所谓美好亦无家可归，亦只能在地狱与天国之间流浪。

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是语言这位流浪者在永无锚地的航途中吟唱的童谣，温暖而灿烂。

至少是这一点，我仍须武断地相信。

我确立这种态度，来倾听古人和今人的言说。也希望读者以这种态度来读这一本弱点与失误断不会少的小书。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让现代人更高明一点地说：我们多嘴多舌地沉默。



## 无我之我<sup>①</sup>

一个人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一样，也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不一样，便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记得方方曾经写得很幽默，动笔就密植刻薄话俏皮话。她也能玩魔幻，跳大神似的兴云布雨以假乱真。读者鼓掌要她再来一个的时候，她却早已卸装。她似乎没有想到要按照读者和批评家的订货单，保质保量地信守什么风格，不负众望地坚持住名牌造型，永远沐浴在聚光灯下。

洞明之人永远是有啥就说啥，想啥就写啥。近几年，“新写实”小说瞩目于中国文坛，方方又被誉为这一新潮流的领航式人物之一，成了读者须重新认识的一张面孔。说实话，“新写实”的名目有点缺乏含义，这顶帽子不能套住各种各样的脑袋，即便补上“生活流”、“后现代”、“生态小说”之类的缀饰，尺寸还是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4年方方小说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过于宽大，不成其为帽子。不过，方方应该由此而感到高兴。当批评家没法从前人的帽店中挑出合适她的一顶，这证明她已经有点不伦不类。超群者不伦，独特者不类。批评家为难之日，常常是小说家成功之时——创造的性灵已高高飞扬在批评框架之外。

其实，方方的近作很容易理解，只是容易到了有点难的地步。可以想象她写时毫无竞技心态，喂过孩子洗过碗筷之后，把近旁的什么随便瞥上一眼，拿起笔就写。她就近取材，不避庸常，特别能体会小人物的物质性困窘，也不轻率许诺精神的拯救，其作品散发着俗世的体温，能使读者们联想到自己的邻居、同事、亲朋及自己，苏醒人生的绝望和希望。文学与生活已没有界限，就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能使从今往后的观众，把任何平凡琐屑之物都疑为艺术展品。她杜绝任何理性的价值判断，取消任何超理性的隐喻象征，面对沾泥带土原汁原汤的生活原态，面对亦善亦恶亦荣亦耻亦喜亦悲的混沌太极，她与读者一道，没法借助既有的观念来读解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经验，也就把理解力逼到了死角。“这有什么意义呢？”《桃花灿烂》中星子的一句话可以问倒古今哲人。好的小说总是像生活一样，具有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死里求生。

方方的近作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只能使某些

形式主义的批评家含糊其辞。她像个群众文化工作者，使用公共化的语言，平易近人直截了当的体式，既是俗事便干脆俗说。她的故事是步行，实用，耐久，便于把读者引向各种视角和各种景观，出入往返十分自由。这种叙述自然没有狐步、蹉步、太空步，没法让读者惊心动魄并盯住叙述者细看。据说现代人主张创作主体的强化，作者应该成为作品真正的主角，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最好的内容应化作形式。这些当然是十分益智的见解，被我多次热烈拥护。不过，还有另一条见解现在很少有人说，也是应该好好说的。那就是，最好的形式应该化作内容，最好的“怎么说”应该化作“说什么”，最好的作者应该在他们的叙述对象里悄悄消失，从而达到“无我”之境。无我便是大我。古典的《史记》、《荷马史诗》等等多是无我亦即大我的作品，以其天真朴素自然的气象，奠定人类心灵的基石。方方的笔端古意闪烁，心志大焉，这正是作家成熟的迹象。

无我之我，说到底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不造作，不欺世，不哗众取宠。它意味着作者不论肤浅与否，灵敏与否，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诚实的声音。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基本的语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方像其他优秀作者一样，不属于任何文

学流派，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心魂。

一九九三年一月

( 本文为为方方英文版小说集序言 )

## 南方的自由<sup>①</sup>

几年前我移居海南。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上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诱惑着我。

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上的岛。

事实上，这个海岛很快也不那么安静了，因为建立经济特区，因为一个时代的机遇，它云集商贾，吞纳资财，霓虹彻夜，高楼竞起，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生长点，聚散着现代化的热能和民族的自信。但是，作为一种代价，在很多地方，这种经济高热似乎总是以某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5年《今日名流》，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种文化的低俗化为其代价。公众的目光投向了金钱，无暇投向心灵。港式明星挂历和野鸡小报成了精神沦陷区的降旗纷纷飘扬。炒热的流行话题灼干了拜金者们的闲暇和判断力，甚至起码的正义感。很多文化同行对此不能不感到慌乱，不能不开始内心深处高精度的算计和权衡。

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辞。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些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还不需要预付悲壮。

初上岛的两年时间没有写作，为了生存自救也为了别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我不想说关于这个杂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说说我对它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忧世嫉俗者实际上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一个人

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断断续续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没有什么高深，尤其在时下的文化淡市，甚至连标题也很难招引什么读者。我完全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严肃的写作在当前差不多确实已经成了一种夕阳产业，甚至是气喘吁吁的挣扎。我也完全知道。但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一个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继续思考，继续凭一支笔对自己的愚笨作战，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

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费”，比如“闲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负责任”……这些乐事在英文中确实都与“free（自由）”同名，都分享着“自由”的含义。这个词条中恰恰没有诸如“独立思考”之类的地位。但人们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英语词的浅薄。人的自由是这些，但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入绝境，表现为对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

自由也许意味着：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如果心灵在旅途上召唤我们。

一九九三年十月

（此文为散文集《海念》的自跋）

##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sup>①</sup>

写作显然不是一种最好的消遣。我们不能否认钓鱼、跳舞、下棋、旅游、保龄球也可以娱人，而且比写作更有益于身体健康。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写作者的日子常常有些孤独，甚至把自己逼得焦灼不宁心力交瘁，苦恼的时间多于喜悦的时间。

如果把写作视为一种职业，那也没有非持守不可的理由。各行各业都可以通向成功，尤其在时下的商品消费社会里，比写作具有更高回报率的从业空间正在展开，有更多的机遇和捷径正在广阔市场里不时闪耀着诱人的光辉。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世界也需要人们做文学以外的很多事情。以我平庸的资质，也曾当过数学高才生，当过生产队长，当过杂志主编，这些都足以支撑我改变职业的自信。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6年《作家》，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

有很多作家以及很多大作家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写作是为了开心，是为了谋生，是为了出人头地，或者是因为不能干别的什么事情，如此等等。这些说法如果不是搪塞也不是戏言，如果事实果真是他们说的这样，那么这些作家在我的心目中只能被一刻也不耽误地除名。从根本上说，文学不是什么实用术，不是一件可以随时更换的大衣。把文学当成一件大衣暂时穿一穿的人，大衣下面必定没有文学，也不会有多少人气。

台湾有一位作家说，可以把人们分成男人和女人，富人与穷人，东方人和西方人，但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分法，就是把人分成诗人与非诗人。这是我十分赞同的说法。前不久，我在旅途中与一位知青时代的老朋友邂逅相逢，在一个招待所里对床夜谈。这位朋友家境清贫，事业无成，虽然爱好小说却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作品。但他关注文学的视野之广，很让我吃惊。更重要的是，他的阅读篇篇入心，文学兴趣与人生信念融为一体，与其说是读作品，不如说是总是在对自己的生命作执著的意义追究和审美追索。一切优秀的作品，我是指那些让人读了以后觉得自己不再是从前的我的作品，只能属于这样的读者。因为生计的困扰，他可能一辈子也写不了书，但比起他来，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只是一些操作感很强的卖客，文场上屡屡得手却骨血里从来没有文学，就

像在情场上屡屡得手却从来没有爱情——他们眼中的情侣永远只有大衣的味道。

在这位木讷的朋友面前，我再一次确认，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

我不想说，我往后不会干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文学所需要的足够才情和功力。我与那位知青时代的朋友一样，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了作家，当不了好作家。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职业的文学可以失败，但语言是我已经找到了的皈依，是我将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地平线。因为只有美丽的语言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旦找到它，一切便正在重新开始。

一九九四年六月

（此篇为随笔集自序）

## 在小说的后台<sup>①</sup>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在多年前出过一阵政治风头。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的。于是，贵族很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很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

同样的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旧军装往边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法文。

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吃米饭或馒头。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具体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活。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也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酒杯里的意识形态恐怕有些难于下口了。

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半，没谈问题的后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或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东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

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粗糙和低能的表现。

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一旦变成唯文本论，便文中无人，成为一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成为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这种批评当然有所长，但漠视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了批评的价值支点，其理论多少有点半身不遂，难以远行。

因此，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印象的核对。

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小说的幕后在干些什么，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或者还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这一次，编者没有忘记小说的另一重要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景观就更为完整。

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

然都是便装，都是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好说。文章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来点隐恶扬善以悦己或谏人。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用《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从小就接受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等训练，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政治经济环境等等限制，很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把文化假象当自然本质，把自己的扭曲、变态、异化当作真实的“自我”。

周作人归附了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超脱无为的表现，还是怯懦媚权的表现？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怨私愤的政治放大？抑或他只不过是出于对某个人或者某个季节的一时恼怒？抑或这些说法统统对，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构成了不同的主从和表里？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己，何况他人。有些人根据政治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把他的后期定为反动文学，显得简单而且危险。看来，知人论世有时候也可能误入迷途。

俗话说，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这个舞台还有更大的后台纵深，几乎是无限，不是轻易就能走到头的。

真实是一个越来越使人困惑的东西。

布莱希特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看，把前台后台之间的界限打破，把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放弃。皮兰德娄让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了所谓“后设小说”，或者说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入散文、电影乃至绘画，已经成为创作界的潮流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这是本世纪的一个特征。

这个自我清查运动，不断清查出虚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溃不成阵。他们闯入后台的结果，竟是真实无处可寻，忍看大活人一个个地消解，一层层地消解。最后，极端者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来拒绝理解，来迎头痛击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求。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决不苟且的严肃姿态，但它与传统中的认识自信一样，把真实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以为真实必须是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质，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其实，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那样的矿点不存在并不值得人们绝望和焦灼。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就像虚假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义举，如

同暗影总是成为光源的证明。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产阶级伪善窒息中汲起了愤怒，当他被真诚和智慧点燃，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象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着真实，就在真实之中——而不论他对文学的“真实”是多么狐疑。当然，这完全不能保证他一旦成为可供沽名和牟利的时尚之后，他在众多学舌效颦者那里，不会成为虚假透骨的演出、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

真实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的瞬间，这在布莱希特和曹雪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各种文化的角色，但未尝不可以保护一种真实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可远求，只存在于对于虚假的敏感和排拒，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征服。相对本色就是这样在相对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就是这样对相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对于作家来说，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台，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一九九四年七月

（此文为林建法所编作家编辑印象记选集序言）

## 圣战与游戏<sup>①</sup>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4年香港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

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

一九九四年十月

## 回望<sup>①</sup>

久违的朋友陈建功年初来信，从旁劝说我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主编《吾土吾根散文精品丛书》的湘鄂卷。我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不忍让朋友失望，只是勉强应承下来。

其时我的母亲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不久后住院留医，需要亲人日夜看护，使我本来就较为忙碌的日子更加紧张起来。为了尽可能不耽误此书的出版，我约请两位朋友协助：一是蒋子丹，湖南作家，负责组织湖南部分的稿件；二是方方，湖北作家，负责组织湖北部分的稿件。感谢她们热情而繁琐的工作，到四月初，这本书渐渐有了轮廓。

我们对征集到的稿件进行了比较和筛选，对个别明显受到特定历史时期里政治污染的词句给予了技术处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文学报》，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集》。

理，尽可能地兼顾了作品题材的覆盖面和作家的代表性。可以肯定，由于我们的见识有限和材料缺乏，还有一些适合编入此书的佳作遗漏在我们视野之外，伏下了来日里的遗憾。

此书齐稿之日，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情反复之后，在最终与死神的抗争中，静静地睡了过去，冷却了身上的体温和我从孩童时期就熟悉了的气息。她在海岛上火化，然后由我们子女将其骨灰送往家乡，与我父亲以及一位没有后人的姑姑合葬。我们在一片蒙蒙细雨里，在一座新坟旁，栽下了两棵松树。我的前辈在这里可以听到树林中的鸟语，可以远眺湘江的一角，还有长沙市郊的一角。

我的母亲出生在湖北，在湖南生活了大半辈子。现在，她终于返回了她从中汲取生命和梦魂的六千里大楚之地，可以安息了。

我不知道叶落归根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我只是遵从中国人的常规让母亲魂归故土。其实，在我看来，她的这种回归早就开始了。大约是四十多岁以后，她的口音越来越退回到老家话了——而她以前可以说相当不错的普通话；她的口味也越来越退回到老家的酸和辣——而她以前可以广泛适应江浙菜、北京菜乃至西餐。她似乎正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进入一种以故乡为终点的文化归途。在她晚年脑子有些糊涂的时

候，她甚至不论在海口还是在广州，总是误以为自己在湖南老家，总是说她住地的左面，有一家长沙颇有名气的酱园，卖着很好的腐乳，让我啼笑皆非。

我怀疑我老了以后也会是这样。我怀疑任何人老了以后也会是这样越来越顽强地回归自己的生命之源。

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守。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会，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

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

这本小书，便是给人们一个回望的小小窗口——尤其是给煌煌大楚的千万后裔，千万游子。作为个人，他们都行将老去。但作为一个族类，他们永远年轻于旅途。

一九九五年五月

（此文为散文集《吾土吾根散文精品丛书·湘鄂卷》序言）

## 食翁之意<sup>①</sup>

我在社会活动方面既无能力也少兴趣。很年轻的时候，当过一届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却不曾去开过一次会，当省政协常委也因为屡屡缺席而受到婉转的批评。最后，领导接受了我的辞呈，好意放我一马。没想到我南迁海南之后，大概有关方面讲究所谓“平级安排”，还是让我忝列省政协之位，参与这一项很不合适我的工作。

因此机缘，便认识了符中士先生。他是政协常委，商界代表，与我同乡。老乡见面，免不了经常凑在一起叙叙乡情。在我的印象中，常委讨论的热闹处，多与文件的审核修定有关，差不多是做一些文秘功夫的操练。而中士先生思路缜密，眼界开阔，语文经验丰富，每到这种时候总是能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见，对与会者多有启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8年符中士散文集。

发。我曾经私下鼓励他尝试写作，发展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华。但那一段时间他夹着一个大皮包忙于商务，日子里充满着合同和利润、融资谈判和贷款前景，几乎无暇他顾，不大可能认真对待我的建议。

几年之后，据说他身体不大好，也有些倦于碌碌商界的应酬和机谋，竟归隐家乡养息。一些熟悉他的人，一时都无法得知他的踪影。他自己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闭门谢客，避世闲居，不知何时竟生出了砚田耕耘的雅兴，而且一写就不可收拾，拉拉杂杂写下了几十篇，算是治病养身的副产品。

他打算把这最初的一批文章结集出版，嘱我一定要写几句类似如开场报幕的话。我翻了他寄来的几篇，发现他完全找错了人。这些文章篇篇与吃有关，而我恰恰在这方面见识最少，经验最薄，体会最粗，是个不入流的粗人。大概是当知青在乡下饿伤了的缘故，后来不管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吃起来但求一饱，速战速决，从无什么讲究。除了几样合口的家常菜，对其他美味佳肴一直找不到感觉，不怎么提得起精神。中士先生在海南的时候，多次邀我酒家畅饮，均被我力辞，如何不明白其中的底细？

当然，在他这些文章里，吃只是一个起点，美食只是作者探寻中国文化种种奥秘的入口。所谓食翁之意不在腹，在乎文化比较中西古今间也。文坛前有梁实秋，

后有汪曾祺，都做过吃的文章，从美食中品出了如丝如缕的闲适或恬静。中士先生的文章则微言大义，从餐桌通向了人心世态、国惠民忧之类的大主题，不能说不是别有雄心和锐气，自然也就别有一些艰难。就说文化吧，这是时下大家都在说却又很不容易说好和说透的题目，有识之士不可不慎，中士先生在这里的文章，不乏创识和真知，但笔下偶尔走野马，牵强和粗疏之处，值得补充值得商榷值得批评之处，恐怕也在所难免。这当然没有什么。对于思想者来说，提出问题常常比解析和回答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本身，具有别开生面之效，破除旧套之功，解析问题和回答问题已经寓于其中了。

外行人不便多言，就此打住。读者还是随同作者一道，把一盘盘一碟碟的中国文化吃起来吧。说实话，我羡慕你们。

一九九五年九月

（此文为符中士散文集《吃的自由》序言）

## 提醒读者<sup>①</sup>

随着印刷业的发达，书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书越来越多的时候，读书倒会变成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这有点像进食，经常饿着固然不好，一旦佳肴满桌豪宴频开，厌食、闹肚子、肥胖症之类健康的大敌也随之而来。现代人的无知不再表现为一无所知，恰恰相反，更多地表现为无所不知。愚昧往往不再与孤陋寡闻同义，恰恰相反，更多时候倒会呈现出博识多闻的形态。书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以为只要书读得多，人类的智商就会同步增长，这就如同以为，革命理论最多的时代革命最彻底，爱情流行歌最喧嚣的时代爱情最纯洁，本身已无多少智商可言。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被很多现代人惬意地接受和传播，本身就是愚昧的开始。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今晚报》，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知识是智慧的产物。但如果失去了对知识的警觉和怀疑，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对生活实践的独立思考和心智的创造力，知识就会成为词句的沙漠，反过来枯竭智慧。也许，这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古人说：读书知其长还须知其短，不知其短，焉知其长。看不到知识的局限性，必定与知识无缘。因此，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出自深思熟虑的挑剔和批评，正是笔者所希望的。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此文为散文集《心想》自序）

## 美丽的眼睛<sup>①</sup>

刘舰平为湖南人氏，体魄雄健，臂力超群，扳腕子一类角力游戏中很少遇到对手。尽管如此，他的朋友们还是愿意用“漂亮”甚至“妩媚”这些较为女性化的词，来描述他的面容——尤其是他的眼睛。

大约十多年前，这双美丽得几乎让人生疑的眼睛，竟然开始夜盲，继而是视野残缺，最后被确诊为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眼疾。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眼疾将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无可避免地导致患者完全失明。

一切可以尝试的救治方案都尝试过了，还在尝试下去。但是坦白地说，他的双眼里已经渐生黯淡、涣散、迟钝，就像曾经灿烂耀目的星星，正在缓缓地熄灭。他和他的亲友们仍在等待奇迹。但如果现代医学最终不能保住他残存的视力，他就将进入一片永远的黑暗——这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6年刘舰平小说集，后收入散文集《韩少功散文》。

种沉重的可能一直悬在他的头上，甚至已经超前进入了他一次次自我调侃式的心理预习。在那片黑暗里，当然还会剩下很多声音。循着这些声音，一个人可以找到它们各自的来处，一些大的或者小的、软的或者硬的、冷的或者暖的、动的或者不动的物体。世界万物将被一个最简单却是最重要的标准来区分：障碍或者不障碍的，把脚和腿撞痛的，或者不撞痛的。

对于这个人来说，脚上和腿上的痛感，将成为这个世界一切形象和一切品质的意义。

这就是盲人的世界，某一类残疾人的世界。在我看来，“残疾”的定义似乎有点含混不清。如果一个人患上胃病、关节炎、高血压，甚至割去了半个肺，拿掉了一只肾，血液里流淌着癌细胞，同样是损坏了身体的一部分或者失去了某一个器官，人们并不会将其称为残疾。可见“残疾”并不完全是一个测定健康状况的概念，至少也是一个生理学中极其特殊的概念。“残疾”指涉人的视、听、触、言、行等等能力，与佛经里“六根”与“六识”的范畴相当接近，虽然所言人体，意旨却指向心智；虽然所言个人，意涵却侧重于个人对世界的感知以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说，“残疾”与一般的疾病有别，差不多是一种以认识论和行为论为视角的生理学用语。

其实，从个人感知世界这一方面来说，有谁可以逃

脱生理局限呢？有谁可以无所不能呢？我们无论有多么健康，也缺乏狗的嗅觉，鸟的视觉，某些鱼类的听觉。我们听不见超声波，也看不见红外线，声谱上和光谱上大部分活跃而重要的信号，一直隐匿在我们人的感官之外。在生物界更多灵敏的活物看来，整个人类庶几乎都是“残疾”的。直到最近的一两个世纪，我们依靠望远镜才得以遥望世界，依靠航天机才得以俯瞰世界，依靠核反应堆和激光仪才得以洞察世界，在拥有更高科学技术的人们看来，前人可怜得连一张高空航拍照片都不曾领略，对世界的了解是何其狭窄和粗陋，这种状态与健康人眼中的“夜盲”或者“视野残缺”一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距离。

局限总是相对而言。人不是神。人一直被局限所困，还将继续被局限所困——即便正常人和所谓超常异能者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循着介入世界的无限欲望，以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生理局限的过程，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人们靠科学拓展着对物界的感知，同时也用艺术拓展着对心界的感知，比如从文学史上最初始的一个比喻开始，寻找声音的色彩，或者色彩的气味，气味的重量，重量的温度，温度的声音，就像一个盲人要从一块石头上摸出触觉以外的东西，摸出世界的丰富真相。这几乎就是文学的全部所为。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文学最根本的职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

学是一种经常无视边界和越过边界的感知力，承担着对常规感知的瓦解，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来自他们的惊讶和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

于是把人们从盲视的状态中导出，从感知的黑夜里导出。

舰平起步于诗歌，后来在小说方面表现不俗，近年来写散文更有大的气象，笔下常有卓识和真情，可见他的眼疾并不妨碍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他最近刚经历了一次眼科的大手术。不管这次手术的效果怎么样，他手头一本接一本的新作，已经标定出他越来越宽阔的视野。世界上的任何黑暗，也不能阻挡他的文字与其他众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一道，给人们的眼里注入曙光。

一九九六年七月

（此文为刘舰平小说集序言）

## 有生命的萝卜<sup>①</sup>

我与张柠还没有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两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涉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汲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语言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和机敏。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6年张柠评论集，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在大胆运用各种方法的同时，他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二十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生产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是其中的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

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应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着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和全部丰富性。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反智主义的……严

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其实，优秀的批评何尝不也是如此？  
没见过面的张柠也许能同意我这一点感想。

一九九六年九月

（此文为张柠评论集《叙事的智慧》序言）

## 序《黑狼笔记》<sup>①</sup>

文学是纸上的梦。这些梦可以表现得条理清晰，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可以表现得驳杂无序，如尤奈斯库的作品；可以是对美好愿望的沉醉，如沈从文的《边城》；也可以是对严酷现实的呕吐，如卡夫卡的《城堡》。

梦当然有高下之分。比如说吧，同是做人生的美梦，沈从文梦得凝重而清雅一些，而琼瑶的俊男美女花前月下，便梦得轻浮而俗艳一些——对后一类作品，人们称其为“中学生的白日梦”，视作梦的次品而已。

在另一方面，既然文学是纸上的梦，那么梦当然也就是无墨的文学，至少也是文学的重要基因。这就是说，无论年龄或老或幼，无论知识孰多孰寡，每一个人其实都从来不会缺少文学创作活动，作家与非作家之间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书屋》。

其实并没有万里之遥。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呵欠之后，人人都可能有些昏昏然的文学勾当，都可能进入半个沈从文或者半个琼瑶的身份。

这种枕上的全民文学活动，在很久以前只是被文士们作技术性的局部利用，比如成为贾宝玉对太虚幻境的一段魂游，成为蒲松龄笔下诸多妖形少女。直到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被广泛接受，梦与文学的关系才更加密切，梦的资源在文学家们那里才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开发。首先，较之显意识的浅梦，潜意识的深梦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破译对象。其次，作为对现实理性世界的对抗和超越，梦的非现实和非理性奇境终于登堂入室，喧宾夺主，逐渐移为很多作家的心智主体，成为他们构建世界的框架、动力、底色、兴奋点以及语法总则。一部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史，看来不过是把人类的梦越做越奇了，也越做越深了。

很久以来，我对做梦也很有兴趣，甚至自己也做过一些梦后的追记。而眼前这本《黑狼笔记》的作者，集三百余梦于一书，对梦的研究，当然比我要做得更加认真，更加深入，也更加富有成果。这本书是心理暗区的袒露，也是公共社会生活的折射和倒影；是现实世界的破碎，也是碎片在个人精神深处的重新熔炼与重新链接。这样的记录与分析有什么意义吗？我不能说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我读到它的时候会常常想起残雪的

文学，卡夫卡的文学，而那些经典性的篇章已经拓展了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我也不能说它是一部心理科学作品——因为“心理”是否能够“科学”起来，在我看来不是没有问题的：离开了精密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这样一种纯属个人性的感受和表达，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学科的线索和素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可信而且有趣的读物，是一个人对自己求得深度认识的可贵尝试。当然，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任何深度认识都不可能抵达所谓纯粹和绝对自我，包括我们的梦，也难免时之别和族群之异，显示出诸多梦象与梦理的生成，可能都有前人和他人的文本渗透其中。而我们对梦的破译，更可能受制于我们既有的知识准备，特别可能受制于本世纪以来从弗洛伊德开始的意识结构理论。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这本书的释梦部分虽然益智，但有点过于“弗洛伊德化”，个别地方甚至稍有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嫌。我相信，由义生象，由象生义，在心理转换过程中都存在着无限可能和无限偶然，是一个多元和多向的开放空间，任何一一对应的关系勘定，即便有很多道理，也仍然会留下粗糙和局限。读者不妨把这些解释当作析梦的多种角度之一，当作多种有益的比照和参考之一。

从江湖术士的传统释梦，到各种文学和心理学的现代释梦，我们的知识越来越接近各种心象的谜底，当

然，同时也可能正在越来越远离这样的谜底——那掠过心头的一轮海中明月，我们的文字能最终将其打捞出来吗？这是一个疑问。

我们这些捞月者，无法最终捞到月亮，却可能摸索到心智的美玉、坚石，还有色泽缤纷的彩贝。这至少是一种希望。

一九九七年六月

## 与遗忘抗争<sup>①</sup>

与廖宗亮有好些年没见面了。最近接到他的信，很高兴为他这一本作品集写序。

我翻阅他的部分书稿清样，发现其中有一篇竟是写我的，写某年寒冬我曾经为他新生的孩子取名。我十分吃惊，因为对这件事已毫无印象。

我能够记得廖宗亮黑黑脸庞上的笑容，记得他当年纯厚的惊讶或焦急之貌，当然还记得我们曾一起渡过汨罗江，沿着堤岸看草地上的牛和飞鸟，坐在他乡村小学的操场里看星斗与流萤，凑在他昏黄的油灯下推敲诗歌和剧本……问题是，宗亮是否还能记得起这些情景？是不是他也会对江边的某一头牛怎么也想不起来？

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我们的往事总是在遗忘中沉埋和流散，总是被时间慢性谋杀，于是身后常常只留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9年廖宗亮散文集。

下一片空白。贵贱沉浮，冷暖忧乐，在这一片空白中当然已经都无从区别，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种向身后无限倾泻着空白的人生，与猪狗的状态，与疯傻者的状态，其实并无二致。这种丧失记忆的状态如果不产生精神迷失乃至神经错乱，倒是生理学上的一件咄咄怪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对遗忘的抗争，是对往事的救赎，甚至是一种取消时间的胆大妄为——让难忘的一切转化为稿纸上的现时性事件，甚至在未来的书架上与我们一次次重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才能够获得记忆的烛照，才能够获得文明史的守护和引导。

宗亮在写作中珍藏、清理以及复活着他的记忆：关于阴暗岁月里铭心的耻辱，关于清贫日子里访友的欢欣，关于沉醉高山流水时的物我两忘，关于观察一虫一草时的偶有所思……毫无疑问，他的笔迹实际上是在珍藏、清理以及复活着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审美趣味，是在艰难然而小心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让自己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现实中再次寻求和确证人生的意义之光。在这里，我不能说他的第一本集子已经完成了这一点，也不能说他在体验、知识以及写作技能等等方面的局限不再构成他的障碍；恰恰相反，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着漫漫长途，作为业余作家的廖宗亮当然更是这样。但写作并不是一种给历史增添丰碑的文物预制活动，甚

至也不是一种意在赢得喝彩的竞技表演活动，从最本质的层面来说，写作是个人与自己的对话，是对自己记忆的咀嚼和消化从而养育自己的未来，与他人或者后人并无什么关系。

这本集子是一把闪光的记忆碎片，属于宗亮自己。作为远方的朋友，我被他的记忆所打动，也为他记忆的富有而深感欣慰。

一九九九年六月

（此文为廖宗亮散文集《走出青青山》序言）

## 序《惶然录》<sup>①</sup>

决定翻译这本书，是因为两年前去法国和荷兰，发现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同行在谈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这个人，谈论这个欧洲文学界重要的新发现。我没读过此人的书，常常闲在一边插不上话，不免有些快快。这样的情况遇得多了，自然生出一分好奇心，于是去书店一举买下他的三本著作，其中就有这本《惶然录》。

佩索阿是葡萄牙人，享年四十七岁。生前默默无闻，仅出版过一本书，一九三五年去世以后始有诗名。这本书收集了他晚期的随笔作品，都是一些“仿日记”的片断体，其中大部分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得以用葡萄牙文发表，进入大语种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如最早的英文版直至一九九一年才与读者见面。原作者曾为这本

---

<sup>①</sup> 最初于1999年发表于翻译散文集《惶然录》，后载同年《文汇报》。

书杜撰了一个名叫“伯纳多·索阿雷斯”的作者，与自己本名“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读音相近，并在卷首写了一篇介绍这位虚拟作者的短文，似乎索阿雷斯实有其人。

这当然不是有些先锋作家们爱玩的“间离化”小噱头，倒是切合了原作者一贯的思想和感觉。他在这本书里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者又是自己的异者，如此等等，那么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个“索阿雷斯”，以他者的身份和视角来检视自己的写作，在这本书里寻求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对抗，就不难被人们理解了。

两个“索阿（SOA）”之间的一次长谈就是这样展开的。他（们）广泛关注着那个时代的生命存在问题，也是关注着人类至今无法回避也无法终结的诸多困惑。读者也许不难看出，作者在随笔中的立场有变化。有时候是一个精神化的人，把世界仅仅提纯为一种美丽的梦幻；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物质化的人，连眼中的任何情人也只剩下无内涵的视觉性外表。有时候是一位个人化的人，对任何人际交往和群体行动都满腹狐疑；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人，连一只一晃而过的衣领都向他展示出全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有时候是一个贵族化的人，时常流露出对高雅上流社会乃至显赫王宫的神往；

有时候则成为了一个平民化的人，任何一个小人物的离别或死去都能让他深深地惊恐和悲伤。有时候是一个科学化的人，甚至梦想着要发现有关心灵的化学反应公式；有时候则成了一个信仰化的人，一次次冒犯科学而对上帝在当代的废弃感到忧心忡忡……在这里，两个“索阿”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终极结论，只是一次次把自己逼向终极性绝境，以亲证人类心灵自我粉碎和自我重建的一个个可能性。

如果说这本书不过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当然是一种无谓的大惊小怪。优秀的作家常常像一些高级的笨伯，一些非凡的痴人。较之于执著定规，他们的自相矛盾常常是智者的犹疑；较之于滔滔确论，他们的不知所云常常是诚者的审慎。其惊心动魄的自我紧张和对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得到的内心奇观，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身为公司小职员 of 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乏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之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过。但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诘问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这是变中有恒，异中有同，是自相矛盾中的坚定，是不知所云中的明确。正是这一种精神气质，正是这种一个人面向全

世界的顽强突围，使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们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即便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即便他也有顾此失彼或以偏概全，但他不无苦行意味的思想风格与对世界任何一丝动静的心血倾注，与时下商业消费主义潮流里诸多显赫而热闹的“先锋”和“前卫”，还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惶然录》是佩索阿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曾经长时间散佚的作品，后来由众多佩索阿的研究专家们收集整理而成。在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里，除圆括号中的楷体文字为译者注解以外，圆括号里的宋体文字，以及方括号里的空缺及其造成的文理中断，均为原作的原貌。而各个章节的小标题，除一部分来源于原作，其余则为译者代拟，以求体例的统一以及读者的目录查检。考虑到原著的某些片断之间内容上稍有交叉和重复之处，这个中文译本对原作稍稍作了一些选择，所选章节约为全书的五分之四——这是考虑到大多数读者也许同我一样，是对佩索阿感兴趣，而不是对有关他的版本研究更有兴趣。在此一并说明。

最后，我要说的是，翻译非我所长，有时候译一点东西，纯粹是读书的副业，是拾译家的遗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分享我阅读的快乐，也让身边的朋友能与我

交换读后的心得，如此而已。故这个初版译本因译者功力所限，肯定也有错漏——但愿今后有更好的译者来做这件事，来做好这件事。数年前，我与韩刚女士合作翻译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也表达过同样的期望，可惜终无合适的译家响应。同样可惜的是，那本书初版后不久，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于是意在修补某些错译和错印（包括恢复当初某些政治性删节部分）的修订本因版权障碍一拖七八年，至今无法在中国大陆面世，仅有中国台湾版进入部分海外市场，真是让人干着急。这使我觉得对很多读者还有一大笔欠债。我希望，这一次的《惶然录》在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帮助下，译本的逐步完善不会再遇到什么问题。

一九九八年十月

（本文为《惶然录》译序）

## 人生的失约者<sup>①</sup>

所谓七七届是“文化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生第一届，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同学们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考来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或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以及军营的大哥大嫂或者老伯老婶，人人都有人生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对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一定是坏事。先读了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届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

我与本书的作者杨晓萍就是这一届的同学，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分配在同一个班而且是同一个组。岳麓山下，枫林似火，四年的同窗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恍若一梦。印象里，她在组里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也弱，却是一种热情开朗和急公好义的高能物质，声音很占地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9年杨晓萍散文集。

方，公共事务中多有她的存在。她发动群众扶贫济困，主持公道惩恶纠顽，自然也少不了登台献艺载歌载舞，有次跳的一个仿木偶舞，至今还给我很深的印象。

当时全组的同学在我家临别聚会，约定五年后的同月同日再来我家相见。说实话，这一毕业前的约定并没有被所有的人当真，或者很快被多数人在忙碌的日子里忘却，或者对于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来说，大概也确实难以实行。但五年后的敲门声还是响起来了，不是邮递员上门，也不是亲戚来访，而是一张风尘仆仆的笑脸出现在门口，让我在久违的大学生活面前发呆。说实话，我也把这件事忘了。

只有杨晓萍没有忘。只有她一个人来了，越过了漫长的时光，越过了无数的山脉和河流，从遥远南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赶赴一个同学们差不多都忘却了的约定。她孤零零离开我家的时候，脚踏几缕斜阳，想必心中一片黯然。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那么我想说：这就是文学。文学不是大学里的教科书和繁多考题，不是什么知识和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间的温暖，是遥远的惦念，是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惊讶和感叹，是脚下寂寞的小道和众人都忘却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消费化、功利化、世俗化的时代，这样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罕见，就像一个孩子的诺言可以被成

年人的生计很快地淹没。

五年之后又是五年，我因工作需要移居海南，七七届的同学都不常见面了。即算碰上有些热热闹闹的大型重聚活动，那些名录里关于官职或学位的显目标注，那些从来都属于资助者或者成功者的讲台，总使我找不到多少同学的感觉，更找不到多少文学的感觉。我常常在这些中文系毕业生中搜寻着缺席的人影，包括杨晓萍。幸好，最近接到了她的电话，又读到了她的几篇文章，算是知道了一点她在赴约以后的生活。当年我目送她背影远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中是能够生长出文学来的，是能够生长出诚挚和智慧的，这甚至不需要用什么著作出版来加以证明。我甚至想说，当著作的出版更多受到市场或权力的制约，更多关涉到稿酬、名声、职称甚至官位，一句话，当文学越来越像一门职业和产业的时候，书本里的文学倒可能流失一尽。这值得一切写作者悉心警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杨晓萍的新作得以出版而感到高兴。我希望我的同学们都能读到这本书。我们这些失约者，也许可以通过这本书把她多年前那次扑空的来访永远接纳在我们深夜的灯下，接纳在我们的心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此文为杨晓萍散文集序言）

## 体裁的遗产<sup>①</sup>

在中国的历史上，作家们曾经是大众娱乐的供给者，因此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受到过道德家及其他精英人士的歧视。

先是有诗词歧视。古希腊人柏拉图曾经宣称，哲学与诗歌之间永远有“旧仇宿怨”，这正是中国道家们“诗词害道”说的意思。宋代程颐指诗歌为“闲言语”，朱熹甚至发誓“决不作诗”，连大诗人陆游也申明“文词终与道相妨”，对自己写诗常加忏悔。

然后有戏曲歧视。中国诗歌在唐宋以后总算获得了正统地位，歧视对象便轮到了戏曲。元代的戏曲最为繁荣，但被当时最权威的典籍文库《四库》排斥在外，拒不述录。《西厢记》一类作品被儒士们视为“淫词艳曲”，连暗中神往的林黛玉一开始也要假惺惺地斥之为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2000年《解放日报》。

“混账话”，以示自己一身清白。这情形，如同当今优等女生为讨得教师和父母的欢心，便夸耀自己一心热爱数学和钢琴，不可招供玩了“电游”。

小说歧视的故事当然更长。清末王国维一改学界偏见，著戏曲研究多种，使戏曲终有高尚名分。于是京戏遂为“国戏”，政要巨商硕儒纷纷以充当梨园票友和准票友为雅事。新文化主将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也多涉笔戏剧，让进步和革命的男女们把剧院入得更加放心。我当时随长辈去看戏，就有赴博物馆或科技馆以继承严肃的文明传统之感。比较起来，当时的“小”说虽也在政策宽大之列，但仍有“小”的卑琐出身而无“国说”之尊，仍让很多人暗暗存疑。比如“爱情”、“接吻”这一类让人心惊肉跳的直白字眼惟小说里可觅，于是孩子们在书包里藏一本这样的野书，大有前面所说陆游和林黛玉的惴惴不安，算不上正大光明之举。

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歧视基本上已得解除。但是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诸多体裁所受道德歧视的一步一步减压，其实也是这些体裁一步步告别盛期的过程，是大众的感官满足和欲望宣泄在这些体裁里一步步潮退的过程。这真是得中有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文学本是俗举，以近俗和容俗为兴盛发达之本。然山外有山，俗外有俗，小说再怎么俗，一晃眼就已经俗不过

商业化电子视听产品了。不久以前，我到一個街頭影視放映廳去逛，發現一大群青年人正在拍椅子起哄，要求老板把王朔的一个作品换成香港那种枕头加拳头的“猛片”。我记得王朔多年前还被批评家们指认为中国“俗”主，可是仅仅时隔数年，他在这些起哄的观众眼里已经太□嗦了，太正经了，太高雅了，太高道统了，太不怎么“猛”了，必须在他们的起哄声中退场。可以想象，其他那些满篇字符黑压压以致累人不浅的小说（包括据此改编出来的一些较有文学性的影视），更是热销地位渐失，娱乐功能锐减，不再成为当下的大众文化主潮，在很多人那里差不多已成为无韵之宋词和无乐之元曲，有了些青铜色彩和文物意味。古代道家们倘若活到今天，面对声色迸放的“电游”、MTV、动作片和色情片，恐怕是宁愿要子女们正襟危坐大读小说的。

小说不大能追得上世俗化的更新换代，小说即便可以浓妆艳抹，也渐多相对沉静和相对端庄的面容，这是小说的不幸，还是小说的有幸？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小说当然不会消失，盛期已过的诗词和戏曲也依然有用武之地，足以使我们宽心。各种文学体裁也没有表现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僵硬定位，这使小说既可以与诗词和戏曲抢题材，也完全可以与电子视听产品争趣味，还任由人们折腾。但大体而言，小说的功能弹性，并不能取消体裁特点对创作者的无形制约。这个形式选择内容的道

理，只要想一想用七律来写时装广告的别扭，用京剧来唱星球大战的荒唐，用胡琴来拉爵士和摇滚的力不从心，大概就不难体会。这就是说，小说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小说可以多变却无法万能。每一种体裁都有自身的所长也有所短，都有审美能量的特定蕴积，因此便有这种能量的喷发或衰竭之时，非人力所能强制。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和人性状态的流变，随着一些新兴媒介和新兴手段不可阻挡地出现，每一种体裁都可能出现悄悄的角色位移，比如从青春移为成熟，从叛逆移为守护，或者从中心移向边缘。

小说家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远去，小说的“边缘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业内话题，这当然与小说的刺激手段和娱乐功能正在被电子视听产品大量夺走有关，与全人类的感官开发和欲望升级正在加速度向前推进有关。可以设想，也许要不了多久，满足人类体感触觉的新型大众文化产品以及直接植入大脑和肉体的娱乐“猛（芯）片”都能轻易地跨越技术障碍，也会被商家们一一推向市场，而仅仅止于视听的电子消费将不足为奇，甚至很快会沦为半夕阳产业。这难道不是已见端倪的前景么？老体裁总是要遇到新世俗，炫目的商业化现代正在使一切道德规则步步退守，正在使一切文化成果迅速过时和出局，正在使人们被自己的欲望驱赶得气喘吁吁而不知所终。这是一个小说曾经为之前驱和呼唤的

时代，也是一个小说正在因之而滑入寞落和困顿的时代。在“猛片”纷至以及更“猛”的一切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的小说能否避免昨天宋词和元曲的命运？或者问题应该是这样：面对这种可能的命运，小说还能够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此文为西山编新生代小说选本序言）

## 文无恒范

作家是创造者，总是对一种民族的语言提供新的财富，增添新的活力，探索新的可能。因此不难理解，任何一个语种的词典编辑工作，历来都偏爱作家的语言成果，都以作家的写作作为跟踪和总结的主要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及时了解作家们的当代写作，从这种前沿性的写作中获取鲜活经验，增强自己在语言把握、结构营造、意旨提炼、情感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确有必要。湖南少儿出版社编辑这本《当代作家短文示范精品》，为小读者们在师从作家方面拓展更广阔的视野，想必是丰富广大学生课外读物的善举。

当然，写作并无绝对真理，再优秀的作家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高峰，再精美的文章也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极限。人皆有短长，文皆有得失，因此小读者面对作家们的文字，大可不必顶礼膜拜，更不必亦步亦趋，而应养成

一种独立分析的习惯,好的就取而学之,不好的就弃而戒之,使自己对前人的写作有一种多角度和立体化的把握。这样做并不是要对作家们吹毛求疵,更不是要与前人们较较劲从而虚构自我的优越。正如古人说:不知其短,焉知其长。知其短是知其长的必要条件,正如暗是明的必要条件。发现作家们笔下的不足,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领会和学习他们的优点,这也是对作家们最真实的尊敬。

因此,我经常劝一些小读者,一方面要悉心揣摩作家们的写作经验,另一方面又要敏锐发现作家们笔下一切可以增删可以修改的地方,甚至不妨经常当一当小老师或者小编辑,试着动笔改一改作家们的文章,能改一句就改一句,能改一段就改一段,看能不能改得更意思和更有味道。这种修改其实可以成为作文训练中一个重要项目,即便改糟了也不要紧,改糟了同样能得到宝贵心得。因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首先是为了增强自己的鉴赏能力,而这种鉴赏只是在比较、选择、尝试、验证、推敲、斟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那种不别精粗和不分高下的囫囵吞枣,那种见名人就全面崇拜和全面模仿的鹦鹉学舌,只能与有效的学习背道而驰。

可惜的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中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就是有些指导者常常把范文奉为圣经,讲优点多,讲缺点少,强制学生盲目叫好有余,启发学生独立解析不足。这种把范文抬上天一般的教学,结果总是把范文

讲得枯燥乏味，像一道使人两眼昏眩手足无措的强光，掩盖了范文的真实面目，也扼杀了学生们对好作品可能的亲近和热爱。这其实也相当于鲁迅先生说过的“捧杀”：似乎把范文捧上了天，其实是把它活活地碎尸万段，使人们望而生厌一哄而散。我当学生的时候碰到过一些很好的语文老师，但也碰到过另外一些老师，他们常常使我觉得没有被讲析过的课文更有意思，那大概就是教学方法失当的证明之一。

基于这一经验，我以为入选在这里的文章各有优长，称之为“范文”未尝不可。但在文学和语言的领域里，典范并非规范，而只是激发更多创造性表达的一种引导，只是创造长程中一个新的起点，若误解为“规范”便很可能引来盲从，人们应有所注意。我们吃牛肉是为了长人肉，吃猪肉也是为了长人肉，因此赏析范文并不是要我们步步从范并且向什么标准范本看齐。恰恰相反，在取法各家的基础上独出心裁从而自得风范，才是我们学习的正常过程。

文有法，却无定法；文有范，却无恒范。这是我们读各种所谓范文时务必胸中有数的大前提。小读者们，这两句话可能不大好懂，却是值得我们背诵下来并且永远牢记在心的。



## 访谈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鸟的传人<sup>①</sup>

### 问题小说

施：“文革”改变了你一生，你本来志在数理化。

韩：“文革”开始，我十三岁。父亲从不主张我搞文学，认为危险，要我念数学。后来下放到农村当知青，数理化一点也不管用，还是在宣传墙报，写写材料、诗歌，自得其乐。七四年以后稍微松动，可私下读到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之前，看得到的只有马列、毛泽东文选，还有鲁迅一本薄薄的杂文，与梁实秋、林语堂辩论笔战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

第一篇作品就是这时写的。七七年以前，思想非常僵化。为了保住这枝笔，只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挂钩，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施叔青访谈集，后收入随笔集《精神的白天与黑夜》。

不得不妥协。

施：你自承七八、七九的作品是你“激愤不平之鸣”，已经摆脱“文革”时违心的歌功颂德。

韩：我当知青时的汨罗县，农村一年比一年贫困，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大队，有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人民币八分钱，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那时再违背良心讲假话，那就很卑鄙。我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为农民说话。这时又读了些十九世纪批判性很浓的翻译作品，更刺激了我为民请命的意愿。

施：当了六年知青，接触到农民，使你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的与农民有缘”。可否谈谈对农民的看法？

韩：农民有可怜的一面，是善良的，也有他们的缺点，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但苛求农民是不应该的，你可以跑，他们祖祖代代在那儿，跑不了。我也不很恨他们，我在农村办农民夜校，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成效很小。

施：《回声》里的知青路大为就是你自己吧？

韩：有一点影子。这篇小说把“文革”的矛盾做一些剖析，一方面“文革”是最专制的，一方面又最

无政府，很乱，谁都有枪。当初我也很醉心政治，后来有了变化。八一年一次大学学潮，年轻人在学潮中争权夺利，民主队列内部迅速产生专制，使我对自己的政治兴趣有些新的反省。好些人红卫兵的政治梦还没做完，还以为革命可解决一切问题。

施：七九年四月号《人民文学》登了你早期精彩之作《月兰》，引起争论，不少人说这篇小说反动；台湾电台广播了，你接到几百封农民来信，因你仗义直言农村的贫困，月兰这农村妇女难为无米之炊的惨状，你写来凄惋动人。

韩：我只是写出真实情况，月兰真有其人。《西望茅草地》的农场场长张种田也是真实的。农场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山沟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革命造就的权威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很尴尬。

施：张种田这人物塑造的成功，在于你没把他平面、简单化，不像早期的伤痕文学一样，你写出他个性的复杂，又可悲又可恨。

韩：后来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在人物复杂性的探求上比较成功，也比较早，因此我对它有所珍惜。另一方面，《西望茅草地》毛病也挺多：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青年导演吴子牛想把它拍成电影，剧本送到农垦部，领导看了。认为涉嫌丑化老干部形象，结果没通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过。这是八二年的事，当时很多老干部复出。

施：剧本还得先给农垦部审查？

韩：我写农场，剧本必须先通过农垦部政治审查。现在不需要了。这篇小说八〇年得奖，争议也很大，当时《人民文学》编辑们还有“誓死捍卫《西望茅草地》”的呼声。

施：早期由于题材限制，用现实写实主义的写法，配合你当时的文学观？

韩：那时以为文学是为政治服务，很功利、实用的创作动机，思维方式非常机械理性。

施：是否因你出道太早，使早期作品带有老右作家的习气，像个马列主义的小老头子？

韩：当时不只我一个，贾平凹、张抗抗、陈建功、刘心武……都在写问题小说，我算是很正常的。这些文学作品很粗糙，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并不使我后悔。有时候，作家也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施：由于什么样的契机，改变了你的创作理念？

韩：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认识。加上西方翻译作品的刺激，眼光视觉大为开放，我对新的小说形态希望有所试验，写出

来会是什么样子，则始料不及。

## 楚文化

施：八三、八四年，知青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自己的文化背景：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搜寻陕西古老秦汉文化的色彩，李杭育的葛川江吴越风情小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开始一片寻根声。你发表于八五年的《文学的“根”》，是最早自觉地阐述这种寻根意向的文章。

韩：我曾在汨罗江边插队，发现当地人有些风俗，特别是方言，还能与楚辞挂上钩的，比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极吻合。我想很多知青作家都积累了这一类的文化素材，这与他们的下乡经历有关系。

施：听说“寻根”是你和叶蔚林一些湖南作家聊天聊出来的，能否谈谈酝酿的过程、当时的时间空间，以及你的心态？

韩：除了我们省的作家，外省的李陀、陈建功，还有一些搞理论的，当时都有同样的感觉，怀疑“问题小说”写到那种程度以后，再往下怎么写？很自然，大家也都会谈到，文学中政治的人怎样变成文化的人。当时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关注，比如诗歌，

比如音乐。湖南作曲家谭盾的音乐，技巧是现代的，表现的气氛、精神又是很东方的，有种命运神秘感、历史的沧桑感。

施：有一种看法，寻根热的崛起，是受了美国黑人作家《根》这部作品，以及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

韩：《根》我一直没看。所谓寻根文学出现之前，马尔克斯已经得奖，但还未译成中文，仅有参考消息上一则介绍《百年孤独》的文字，还有他和西德记者谈文学观念的文章。在拉美文学之前，我就想过东方的川端康成、泰戈尔，美国的黑色幽默，体会到它有一定的文化根基。当时中国青年面临一个向西方文学吸收的问题，大部分是简单的复制，就引进新观念、技巧来说，自有它的意义：可以做为一种补课。但复制与引进是创造的条件，却不能代替创造。

施：广义的来说，确实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引入，才触发了大陆作家的寻根热？

韩：可以这样说。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迟早要成为作家们的焦点之一。文化一定要有参照、对比才能显现，引进外面的东西才有所比较。八一、八二年王蒙写意识流，北岛的《波动》更早，八〇年已经印在油印册子上了。但即便没有西方的意识流，对潜意识的开掘也迟早会引起中国作家们的

兴趣。有一段时间，作者的着眼点是什么是国内没有的，我就写。随着时代不断开放，作者们眼界更宽，才考虑到什么东西是世界上没有的，我才写。

施：身为楚人，你重新审视你文学的根，它是深植于楚地的，对楚文化历史的回顾是你回归的第一步吧？

韩：湖南民性强悍，历史上来说是失败的民族，上古传说黄帝战胜炎帝，炎帝逃到湘西、黔东。楚文化曾被孔孟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到排斥，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主要藏于民间。湘西的苗、侗、瑶、土家族还保存了楚文化，那里的人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能歌善舞，唤鬼呼神，我在文章里说过，人们至今还能从民间活动中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楚人崇拜鸟，是鸟的传人，和黄河流域的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

施：据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他们的祖先——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向西南迁移，楚文化流入湘西是有根据的。礼失求诸野，反而少数民族还遗留了楚文化的祭祀、风俗信仰。

韩：“少数民族”在孙中山的国民党时期才只有五个，四九年以后，分出了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像我们湖南人，古时为“蛮”，也是少数民族。土家族是五十年代才得到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整个历史的记忆就是靠舞蹈来表现，可跳上几天几夜，从开天

辟地到大迁徙、战胜野兽、生儿育女……侗族在五十年代以前只是苗族的一部分，至今保留了生殖器的崇拜。他们的文化特征包含一种野性的美，又有一种神性的美、神圣的气氛。

施：你想找寻一种原始的粗犷之美？

韩：我以为，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值得作家深思。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时代，直觉或者说是非理性的思维，被忙碌的人类排斥了，进入潜意识。艺术与潜意识密不可分。文学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施：你以湘西为背景，写了一系列颇有风土色彩的作品，你是如何将楚地文化的因子融入你的小说？

韩：八五年的作品，表面上看来，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不过，写楚地民俗风情、楚人特殊情态，这只是一种表层外壳。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找寻楚文学的精神，而不是将其仅仅当成写作的对象、材料，只限于外在的描绘。

## 寻根文学

施：发出寻根口号的第一篇小说，八五年写的《归去来》，小说的语言、气氛与以前批判现实的问题小说完完全全两样。你是如何走入《归去来》的神秘、

犹豫气氛的？

韩：也说不太清楚，去过湘西几次，读了庄子、禅宗的书，还看了外国现代派的作品，这就是写作前全部的准备。《归去来》写人的相对性，到底黄治先是我、还是别人，像庄周梦蝶，感到自我的丧失、自我的怀疑，这些意识像雾一样迷蒙，比较符合我当时创作的理想。当然，有些评论家说情节太弱，只有背景细节的点缀，和主题没有关系，我觉得主题不是那么狭窄，氛围情调也是传达主题的。《归去来》是否有楚文化的因子，这很难说，楚文化和汉文明也不能完全割断，几千年来早已经混合了。

施：你提到庄周梦蝶的启发，有篇评论却认为《归去来》对自我的游离，是在大陆开“魔幻主义的先河”；究竟得自庄周或马尔克斯的营养，是土是洋？

韩：如果说神话是拉美文学的专利品，我不同意，中国也有很多神话，迷蒙幻觉的形态遍地皆是，我无非在作品当中吸收了神幻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有个乡下人去过一个地方，他觉得特别熟悉，好像上辈子去过似的。我常常到一个地方，也觉得熟悉，好像来过似的。这些感觉也是来自拉美？也是“洋”？西医胃病理论、心脏病理论是“洋货”，但不能说中国人以前就没有胃病和心脏病。

施：《归去来》注重氛围的营造，感性浓，比起理

性很强的《爸爸爸》，极为不同。后者像是以文学形式来衍义一种哲学思想或是文化观。你自己说《爸爸爸》的主题是要“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弱”，构思过程中是否主题先行，然后以题材、细节套进去？

韩：我的创作两种情况都有，一种先有意念主题，为了表现它，再找适当的材料、舞台。另一种比较直觉，说不清楚的、零碎凑起来的。我自觉理性在很多时候帮倒忙，但也不否认有时候从理性思维中受益。《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下乡时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杀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如“干部”写成“官”等。小说里的裁缝和儿子，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

施：《爸爸爸》主题的多义性，比起你早期《月兰》一类单义的小说，其深刻、多面性相差很大。“文革”时期的主题先行、主题鲜明、人物单面，其实是很违反真实人性的。刚才你提到构思过程有理性的干预，动笔创作的时候呢？是一种含混的说不清的情绪，

还是步步为营、理性的设计不时涌现？

韩：我以前是写问题小说出身的，不能完全排斥理性，既然理性存在，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决的地步，迫使理性停止功能。写着写着，发现我的理性思路，常被某种气氛所淹没，被某种意象所摆脱，被某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所背叛。我说过，作家对自己小说材料的掌握认识，应该说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如果了解得清清楚楚，那不是一种艺术，在创作中，同时要感到一种艰难，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他认识这种生活，同时又没认识这种生活。

施：你好像不耐烦重复自己，每一篇作品都希望有新的突破，可以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韩：有些作家用一种模式一股劲写下去，我不行，老觉心慌。我每写一篇，希望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惊讶。但这种新的尝试也不一定比以前的更好，实际上很难，往往力不从心。但我愿意新的失败，不愿意旧的成功。

施：你谈到语言陌生化，以达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题材是否决定所用的语言？

韩：题材与语言有关系，但语体意识很强的作家，可用一种语言来处理任何题材，像法国新小说派。有的则是写农村一套笔墨、写都市又是另一套。我很羡慕语体意识强的作家，语言形式本身是内容，语言就是足够

的信息，但我反对过分雕琢，反对太强调文字打磨。其实，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形式的追求消失了，入了化境。

## 作家的素质危机

施：吴亮认为在你的感性世界里，作品中可看出恋母、恋妹情结，如《空城》等，但《女女女》对么姑的否定，使你超越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情结。

韩：我毫无自觉。

施：《爸爸爸》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以一个部落来象征，气魄磅礴，凝视整个民族的文化；《女女女》焦点凝聚在一个女人么姑身上，是否有意识地从整体缩小到个人？

韩：我没有设计过。写《爸爸爸》时，要在《女女女》表现的感受、情绪都已存在，只是没找到一个借口，后来觉得可以通过她来表达，就写了。

施：大陆作家以精神病为题材的作品不多，在那极端压抑的社会，不发神经病才令人不可思议，你的《老梦》、《蓝盖子》两篇作品都触到神经末梢，读来令人发抖。

韩：精神病是个很好的窗口，可透视人的内心深处，常人掩盖的部分被打开了，可看到很多东西。但

《老梦》没写好，我并不满意。

施：近作《故人》，衣锦荣归的华桥，回来要求看他以前的仇人，好像你又走向批判的路子。

韩：我写的是人的复仇心理。一个人从海外回来，和仇人相见，没有任何动作，也不说话，就是看一眼。刚写完的《谋杀》有梦幻色彩。一个女人去参加不知是谁的追悼会，住旅馆，感觉有人跟踪她……我想表现中国人被窥伺、监视的不安心理，总觉得周围的人要谋害他。为什么会产生幻觉？有很深的社会根源。《谋杀》里，我把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强化成血腥，真正见血。

施：你自称中篇《火宅》（后改名为《暂行条例》，下同）为改革文学，风格的确与寻根这一类作品迥异，以你写《月兰》时期颇有微辞的现代主义手法，特别是荒诞、荒谬感来反映大陆的官场。

韩：我最早接触文学，是鲁迅、托尔斯泰那一类，后来读外国现代派小说，但也不是都喜欢。法国新小说的西蒙，我就看不下去，太晦涩难读了。我觉得实验性的小说最好是短篇，顶多中篇，长篇则完全没有必要，作家想耍玩的那套观念技法，前面十几页就完全表现了，没必要写那么长一本书来重复。卡夫卡的两个长篇我是跳着看的。倒是爱读一些尤奈斯库的荒诞派的剧本。

写《火宅》的动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采取离奇、荒诞的方式，在假定的大前提下让所有的故事发生，但假中有真，《火宅》在本质上是写实主义的作品。

施：刘晓波批评“寻根派”，主张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是理性本位，必顺彻底抛弃，你当然不同意他……

韩：理性本位充其量只适于儒家。老庄和禅学则是非理性的。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以美学来代替宗教。我在文章中说过庄禅哲学的相对、直学、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财富，可惜所知者不多。我们要做的，是研究这种智慧何以在近代中国变成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庄子如何变成鲁迅笔下的阿 Q，但你不必要因阿 Q 而连庄子、连中国的一切都自惭形秽。

施：比较起来，中国作家似乎没写出重要的大作品，像“文革”那么大的劫难，反映这人类悲剧的作品，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韩：中国作家写不出大作品，不是政治环境的束缚，主要是作家本人素质还存在很多问题。“文革”时右派作家受了苦，其中一部分至今停留在表面的控诉批判，超越不了伤痕，如张承志所说的一动笔就“抹鼻涕”。其实知识分子在“文革”时相互揭发打小报告，比工农兵还厉害，如果他们真像某些作家塑造的那么先知先觉、忧国忧民的话，就不会有“文革”了。我们

这一代知青作家也有危机，主要是年青的时候学养不够，心灵受到扭曲，很多毛病与上一代作家是一样的。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大体上来说是两部分：一是苏俄文学；二是中国的戏剧与通俗文学。我们的思维视野和文学创造力因此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相信中国的当代文学能长出大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几代作家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近翻译了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一部小说。东欧体制与中国类似，有共同的问题，但昆德拉不停留在表面的伤痕，而站在更高的层次对人性作无情的剖析，对迫害者与被迫害者都能够找出共通的心理阴暗，抓到了人类普遍的问题。我希望这本书对中国的作家能有所启发。

## 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sup>①</sup>

——与荷兰学者雷马克谈话要点

### 九十年代的价值取向分化

雷：中国真是变化很快，我的一些同行说，即便每年去走一走都会有陌生感。你能不能谈一谈文学方面的新的情况？

韩：中国文学界正在经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是一个高潮期，作家们积压多年的材料、感受、情绪是“井喷”状态，突然涌入国门的西方文学，也对作家们的表达形成了刺激，提供了观念和技术的参照依托。那时候作家们的价值观基本统一，精神上处于自足状态，没有任何内在的危机。批评家谈这个派或那个派，大多是拿地域特点、拿手法技巧

做做文章。其实那时候有什么派呵？只有一个派：反“左”的派。大家刚从“文革”的恐怖里走出来，结成了一个批“左”的广泛同盟。民主、科学、改革是共同的旗帜。

雷：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争论，比方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包括你这次在荷兰出版的《爸爸爸》等，当时也遭到批评。

韩：争论主要来自知识资源方面的差别，比方中年代更熟悉苏俄文学，青年代更熟悉欧美现代派文学，于是也会形成冲撞。但苏俄也好，欧美也好，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当时大多在一种批“左”的语境里得到理解和运用，成了批“左”的不同角度而已。争论一般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展开，没有人生价值取向的纵深分化。

雷：用这种批“左”的广泛同盟，来处理当前世界以及中国的复杂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恐怕还是不够的。

韩：是的。到了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东亚经济崛起，全球资本主义垄断一体化和民族主义凸现，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左”字涵盖得了的；另一方面，批“左”到了不仅仅是批坏人、批别人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市场经济的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一些曾经被很多人笃信不疑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动摇。一个农民，在要求责

任田的时候，他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尊严，这很好办；但现在他的女儿可能为了钱去陪老板睡觉，是要利益还是要尊严？一个教师，在要求平反的时候，他的利益就是他的道义，这也很好办；但现在为了评上职称，他可能要拍马屁，甚至与坏人同流合污，也就是说，为了利益可能需要出卖道义。尊严与道义，是八十年代中国人批“左”的旗帜，也是批“左”的胜利成果，现在一念之间就可能在某些人那里荡然无存。“利”和“义”在某些时候不再统一，世俗欲望和精神理想开始出现分裂，这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问题背景。这就带来困惑和艰难的选择。这时候怎么批“左”？也许有的人认为，尊严和道义也是“左”，只有钱不是“左”。

### 你完全可以不当作家

雷：是不是市场经济对作家们形成了特别大的压力？

韩：中国没有搞“休克疗法”，过渡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应该说大部分中国人正在从市场经济中获益。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钱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不应该成为问题。法国的勃勒东很富有，你们荷兰的凡·高很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有独立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从来不是最富有的阶层，这

是常识。

雷：中国的作家是不是都拿着国家工资？都是“干部作家”？

韩：有很多作家并不拿国家工资，比如王朔，比如张承志，这样的“自由撰稿人”越来越多。但我不愿意夸大收入来源和收入差别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王朔与张承志，都在体制外吧，但文学倾向的差别很大。谋生是人权，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文学是另外一回事。文学是审美，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我不大喜欢一些作家在市场经济中过多的抱怨和失落感。你完全可以不当作家，觉得吃亏，马上就改行，抱怨什么呢？曾经有个青年人问我：“一个作家没有钱可以写作吗？”我就反问：“什么叫有钱？十块钱是不是钱？是不是有了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才叫有钱？”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快，暴富者多，就把大家的胃口都吊得很高。也许太高了一些。

## 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化危机

雷：经济优先是现在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不少文化人也在“下海”，很多作家和出版家也在商业化。包括东欧作家，在经济改革中也在分流，有的人从

政，有的成了书商，出版黄色杂志。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韩：中国与东欧的情况还有些区别。东欧的事情一旦没办好，东欧人只是骂政府，骂体制，认为是政治问题，大体上没有文化自卑情结。因为他们主要是东正教文化传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大范围之内，他们不觉得这个传统很丢人。“欧洲”永远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名词。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自晚清以来不但存在着政治问题，还多出来一条：就是深刻的文化危机。相当多的人认为比起西方来，自己的文明传统很糟糕，必须彻底抛弃。但中国人真正接受西方文明其实并不容易。打打保龄球，看看美国电影，还可以。你真要他们在自己当头头的机关里或者公司里搞点民主，很多人就不行了，还是习惯当土皇帝。我见到过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但没有几个学好了一门西方语言的，总是让我惊讶不解。他们一到西方就左不习惯右不习惯，还是几个中国老乡成天扎堆，包饺子，西化什么呀？很显然，自己的不要了，人家的又没学会，或者学不会，于是就出现文化空白。因此，同是面临着精神重建问题，但中国知识分子比起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同行来说，在相当时间内更缺乏文化资源，文化处境也更为复杂。

雷：我听一些从中国来说，现在的中国人只谈

钱了，中国的作家全部商业化了，但我看了你担任社长的《天涯》杂志，却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我很喜欢这本杂志，虽然不一定赞同其中所有的观点。我想知道，这样高品味的文学杂志在中国还有多少？还能存在多久？

韩：中国的很多报刊正在市场压力下消闲化、娱乐化，应该说这是事实，也是社会上某些读者层的合理需要。但是说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现在只认钱，当然是胡说。《天涯》并不是办得最好的。以我非常狭窄的阅读范围来看，《读书》、《收获》、《花城》等期刊也办得很不错。我看它们都能办得下去。不光是知识分子读这些刊物。《天涯》的邮购者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普通工人、农民、农村信用社的什么人，他们经常对刊物提出非常到位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中国比有些小语种国家的条件好。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回旋余地大。这也是大语种应该更多承担文明义务的理由之一。我看联合国应该订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没搞好，首先给大语种国家罚款。

雷：《天涯》杂志上也有文章涉及到去年以来的“人文精神”论争，这场论争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作家一次大的分化？

韩：我一直担心中国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分化。分化了才有差别，才有多样，才有交流和对抗。这可以

逼迫大家接受挑战，逼迫大家都成熟和强大起来。中国晚清以来的文化虚弱，不是因为对抗太多，恰恰相反，是因为对抗太少。争论通常只是闹哄哄的“表态运动”，表态之下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政治陷害和诱捕，就是人身攻击诛心之论，就是造谣、歪曲、矮化对手、猛攻假想敌一类的胡搅蛮缠，这就争论不下去了，连基本的礼貌也不会有了。这就是痞子打球，越打越没有水平。我希望高水平的多元化，不希望低水平的多元化。低水平的多元化，或者说恶质的多元化，实际上就是提供了重返一元化独断论的前提和条件。

### 边缘化：冒充大问题的小问题

雷：很多中国作家都在谈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韩：通俗文化成了文化市场的主流，加上电子传媒推广，演员和歌星总比作家的模样好看吧？所以就更抢镜头。这是问题的主要背景。“边缘化”可以是知识分子的某种真实感受。但这个问题不要谈过头。如果从政治、经济的大格局来看，我看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怎么“中心”过。古今中外的权势者哪个在乎“书生之见”？即便是知识分子大量当官，也不意味着社会全盘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价值观念体系。哈维尔是剧作家，当了

总统 捷克的知识分子就“中心”了？有些中国作家自我感觉太好，以为自己从政至少可以当副总理，从商就可以成为香港的李嘉诚，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无知。由此产生的“中心”感，只是幻觉。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的“中心”地位，恐怕从来没有动摇过。总不可能把政治家拉来教油画，让画家当学生吧？也不会统统让商人来当哲学教授，哲学家只当助教吧？

文化从来不能代替政治或者经济，但文化一天也没停止对社会发生作用。所以我说，“边缘化”是一个冒充大问题的小问题。这只是一个评价知识的商业价值的概念，不是一个评价知识的概念。是一个评价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概念，不是一个评价知识分子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概念。我喜欢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关心自己声音的响亮度，只是关心自己发出何种声音，甚至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身份感，当然也就无所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多少人看着自己。

雷：提出“边缘化”问题的动机中，是不是有回避政治的因素？

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革”的政治恐怖，使很多中国作家在八十年代特别愿意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艺术的独立性，要同政治闹“离婚”，各过各的日子。这同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错位。他们在那个时候倒是一个劲地要同政治

“复婚”，比如美国学者动不动就讲“政治正确”。后现代主义一来，什么都成了政治，任何语言和概念都成了意识形态。当然，不同点在于，西方讲的是广义政治，不光是阶级斗争，也包括了民族的、文化的、性别的冲突，还包括同性恋一类少数群体的问题。

### 知识控制：大利益还是小利益

雷：后现代理论在中国这样风行，我感到很惊讶，也很有趣。据说福柯也成了中国一个热门人物，我也很惊讶。

韩：我基本上没有读过福柯的书，对他不能有什么评价。据我所知，有些专家眼下主要是运用他关于知识与权利关系的一些观点。认为知识不是中性的，客观的，都隐藏着权利关系和利益要求。这与中国传统学者把知识看成是“天下之公器”，很不一样。这似乎也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就是最强调物质利益的，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想，人们在批判强权控制之后，进一步清算知识控制，其实也是反抗另一种更隐形的强权控制，在这个时候想到福柯或马克思是很自然的。这算是“知识消毒”或“语言消毒”运动吧。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当然，中国也是一个有实利主义传统的国家，有特殊的

语境。“利益动机论”可能会演变成“唯利益论”，那么各种文化都只不过是庸俗化的争权夺利，用一个批评家的话来说：这个或那个思潮，都只是在“瓜分文化市场的资本”。照这样说，还有什么精神尺度可言？一切学问都成了利益扩张的巧伪之辞，真理这个概念也可以放弃了。

雷：说知识中隐藏着权利因素，当然不能说所有知识就是利益，就是意识形态。不能这样简单化。

韩：中国古代有个苏东坡，是封建官僚。他的诗感动了我，而我根本不是封建官僚。这就证明他的诗歌对封建官僚的利益立场有超越，意识形态已经稀释了，作用相当有限。我赞成用“女权”一类权利关系理论把苏东坡也查一查，但如果把他查得同最末流的诗人没有差别了，这种文化批评与艺术有多大关系？反对普遍主义，当然一开始也有将其“普遍”误用的危险。知识与利益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知识中的利益因素的沉淀、扩散、转移等等，需要针对具体对象作非常细致的辨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谈利益就要注意层次，有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民族国家利益，还有全人类甚至全生物界利益。大利益和小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大利益就是“义”，就是精神。把精神描绘成排斥一切合理利欲的反世俗宗教狂热，是有些人常用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中国好几次民意测验，证明民众最关心的是三大

问题：腐败，社会治安，通货膨胀。这就是人民的“大利益”。有些知识分子从来不去焦虑和深究这些问题，只是成天苦恼自己的一得一失。这是哪一种品级的“世俗关怀？”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开阔的胸怀？不可能有更多与私利无关的兴奋点？这样的人最乐意把福柯理解成“唯利益论”和“唯个人利益论”。

### 理论家应该对现实瞪大眼睛

雷：我发现你们《天涯》上的理论文章大多比较亲切，比较生动，是一种散文体，这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文体传统？

韩：中国古人写理论，大多讲究文采，这算不算中国特有的传统？不一定。《天涯》是一个文学杂志，所以比较喜欢作家型的学者，编辑和特邀编辑们都提倡中国古人说的“文章”，但它无意也根本不可能取代另外一些类型的理论刊物。在另一方面，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以为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光是文体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实践品格问题，是学问是否通透的问题。我相信理论有时候无法避免艰涩，我只是怀疑那些只能写艰涩文章的人，据我看，好学问家都不是这样的。

雷：你觉得现在有哪些中国的理论家值得特别的注意？

韩：我不是理论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个人印象是：八十年代的“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传统题材的学问，现在不大好做了，很多人也做不动了。目前似乎有两种人还可以把文章做下去。一种是外语好的人。因为中国加入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以后，译介外国理论不那么容易了。这样，多一两门外语的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进程，至少有话题方面的进口权。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洋博士”近年来已经逐渐表现出这方面的优势。第二种是我更看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的学者，能够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的学者。这些人不会说“我是搞海德格尔的”或者“我是搞康德的”一类废话，而是对现实的各种动向瞪大了眼睛。这些人的文章拿来一嗅，就可以嗅出不是从书本上东拼西凑来的，而是从作者的亲历性实践中来的。有激情，有生存感受，有现实依据，而且往往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一句话，是活的理论，有灵魂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他人学理的援引，也往往有选择，有辨析，有超越，不会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只要是名人就统统热爱，不管是什么油彩，都往自己脸上抹。当然，一个人如果兼有上述两种角色，就更好。

雷：谢谢你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

一九九六年五月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精神的白天与夜晚<sup>①</sup>

——与王雪瑛的对话

王：《马桥词典》最早刊于《小说界》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最近由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当更多的读者在阅读它时，《马桥词典》对你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过去时，现在你对这部一年前完成的作品如何评价呢？你觉得《马桥词典》是找到了一种个人记叙历史的最佳形式，或者是保留了一种对历史充满个性的表达？

韩：我们置身于信息时代，先进快捷的电子声像手段可以随时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或风土人情。小说的部分功能已由新闻作品所替代。与变化很大的生存环境相比，小说的形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小说的叙述方式还处于惯性状态，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往往放不进去。我在写小说时，常常会感到小说的模式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海上文坛》，后收入随笔集《精神的白天与黑夜》。

在推着我走，于是在写《马桥词典》时，我有一种改变小说形式的冲动，把小说的因素与非小说的因素重组，这样写起来很有快感。

王：你在叙事、刻画人物的同时，插入考证、分析、议论，满足了你广泛的学术兴趣。

韩：新的形式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可以让本来没有联系的东西产生联系，让本来不能中断的内容暂时中断，我还可以在“特写”、“中景”、“远景”这三种描摹状态中迅速地转换，某些在记忆的黑暗中沉睡的内容，被新的形式唤醒了、照亮了。当然《马桥词典》只是许多小说形式中的一种，这种新的形式也会形成新的遮蔽和束缚。

王：有位批评家认为你是一个批判型的作家，你同意吗？我也觉得你更多的时候是出击而不是坚守，你常常在否定之中确立自我。

韩：在现代社会，不要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许多事情也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信息时代容易形成时尚，而许多人对时尚有一种误解，以为谁有个性，谁就是时髦，谁跟得上时尚，谁就是有个性。其实追求时尚只是一种从众行为，个性和时尚永远是对抗的。作为一个用语言来写作的作家，我对自己所言时时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不承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结论，不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

王：你怎么看作家的经历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专业作家这种形式对作家的创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韩：作家的天赋在于想象和虚构，但是作家同样要依托自己的经验来进行想象和虚构，强调主体决定一切是片面而不现实的。主体从何而来？主体要受到环境和自身经验的制约。专业作家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创作不是煎烧饼，可以煎它一辈子。文学是雨夜灯下心与心的交谈，倾听与诉说，是彼此对心灵的关切，文学创作的动能是情感，而情感是不能职业化的。

王：你会不会创作一部表现当今生活的长篇小说？

韩：以后会写的。作家在写作时，对生活要有一个酝酿和沉淀的过程，要写一部反映当今生活的长篇，就要对当下生活的经历与体验，有一段时间距离的观照，要找到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很喜欢《铁皮鼓》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它的优秀在于它把内容变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目前一些以当代生活为背景的长篇之所以平庸，在于对当代生活是一种照相式的反映，没有找到把材料提炼成一种超越材料的审美形式。

王：九十年代文坛上崛起了一批新生代作家如韩东、毕飞宇、朱文、邱华栋等，他们更关注自我完成与自我阅读，放逐某种既定的价值规范，努力以新的边缘视角来显示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你对他们的创作如何评价？

韩：韩东有才华，有足够的审美敏感和对人性的同情，创作上似乎有一种平面化的倾向，破坏了传统读者的认识聚焦模式，我怀疑这种倾向也是这一代作者生存状态非常真实和恰切的呈现。但我并不赞成有些批评家对平面化写作的号召和鼓动，那基本上是一些外行话。真正的小说家都明白小说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也明白艺术的提炼与节制。事实上，韩东发表在《天涯》上的《同马龙一起旅行》和《曹旭来了，又走了》就表现了非平面化的一面，有深度的发现。就像王朔的《过把瘾就死》与《我是你爸爸》，因为有人生体验的较大含量，就有了丰富和沉重，不像他的其他一些作品，过于依赖俏皮话和玩世心态。一味鼓吹平面化，一味鼓吹“感情零度”、“价值缺席”，很可能会助长空言欺世的文风与学风。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有打破传统审美模式之功，但取消具象，抽空情感，也面临着新的概念化和图解化的危险，面临着反艺术的陷阱。这已在西方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思。至于你说到的朱文、邱华栋，我还没有完整的印象和成熟的感受，也就暂时没有评价的资格。我想我应该还多看一些。

王：地域和地域文化总会在作家的作品里留下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印记，如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你如何看地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从湖南到海南近十年了，这两地对你的创作产生怎样的

影响呢？当初海南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你定居天涯？

韩：海南有清洁的空气和水，有较多的绿色和较少的人口，这是九年前我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主要原因。这个安排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定居海南，也许并不是一个最有利于我写作文学作品的选择。光是学海南话，对我来说就有极大的困难。但我并不想总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决定一切，包括选择居住地。

海南与湖南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也有文化的共同性。我相信在通讯和交通不够发达的以前，地域是文化多种因素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这样我们才会有海南和湖南的差别，还有中国与法国的差别等等。现代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使地域界限变得模糊，而时代界限正在凸现，比如“代沟”在音乐、服装、语言等方面正在成为问题。一个作家总是定位于空间/时间的文化坐标里，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当然，作家们并不一样，人生经历和感受兴奋点各各相异，有的对文化地域性较为敏感，像你刚才提到的作家；但也有些人对文化的时代性或其他什么性更敏感，比如卡夫卡。所以，我对地域与作家关系这个问题从来慎谈。

王：有的作家把写散文当成是写作小说之余的休闲，我觉得你的散文不是休闲，而是我思故我在，以思维的轨迹确立自我精神的疆域，那么你觉得写散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和小说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韩：我曾经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这是个通俗的说法，其意思很明显：小说与散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紧张的关系，tention 的关系。有时候，它们甚至互相怀疑和互相消解。大体上说，散文是我的思考，是理性的认识活动；而小说是我的感受，是感性的审美活动。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散文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比如思想的深度，常常在小说那里变得不怎么重要。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思考还是感受，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常常需要另一种精神活动来给予怀疑和消解。就像我们一个人既需要白天，也需要夜晚。

王：你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的作家，你对九十年代学界兴起的国学热怎么看？你的《马桥词典》是不是你九十年代的一次“文化寻根”行动？在今后你的小说创作中是不是形式会变，而“文化寻根”的情结不变？

韩：我不了解所谓国学热的情况，对这一方面知识很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也从不使用“文化寻根”这样的文学概念。我确实在八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涵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

么用处了。在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了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

我并不赞成文化的民族主义。创造者总是有个性的，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个性，一个民族会有一个民族的个性，但创造者不会排外，总是善于学习和吸纳，他们的个性是在对外的学习和吸纳中形成的。守成者当然也会有个性，但这种个性如果依赖封闭，它可以进博物馆，可以吸引很多参观者，却不会有生命。

王：九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正处在世纪末的时空中，你觉得九十年代的文坛与八十年代的文坛有什么不同？在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有没有世纪末心态，或者说世纪末情绪？你对“世纪末心态”或“世纪末思潮”这样的提法如何评价？

韩：比较八十年代的文坛，九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有这样两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八十年代结束“文革”，吸收古代文化资源和外国文化资源的“补课性”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以借鉴中外遗产为主要文化动力的状态已经结束，九十年代对中国文化人的原创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全球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挂帅”，东、西方的理想主义都受到

形式不同的重大挫折，精神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新的现实难题。

所谓“世纪末情绪”是不是与上述第二个背景有关？出于专业的考虑，我倒是觉得精神危机的时代倒是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造空间。戏仿庄子的话来说：“治世（国）去之，乱世（国）就之”。越是精神出了问题，才越需要你们这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才越可能出现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是创造的母胎，灰色的“世纪末情绪”刚好可能成为人类又一个精神高峰的前提。但这种预测就此打住，我说过我不愿意当算命先生。

一九九七年一月

## 世俗化及其他<sup>①</sup>

——与萧元的对话

### 关于“世俗化”

萧：“腐败不可避免”论在一部分作家、评论家中很有市场，有的人甚至认为一定程度的腐败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因此是必要的。还有的人认为，即使是在西方，对“世俗化”的批判也是西方社会“世俗化”与现代化进程“业已经过四百余年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而中国“世俗化才十多年的历史，过分强调它的消极面是不公正的”。这种宏论若不是装痴卖傻，就是极度的无知。“世俗化”或“世俗精神”，本是一个模糊可疑的概念，“世俗”一词除了它与宗教相对立的含义，一般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姑且不论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书屋》。

用“世俗化”一词指称“大众文化”的概念失误，又姑且不论“不顾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语境”，用所谓“西方社会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来证明中国“世俗化才十多年的历史”的合理性，其以西证中的简单做法在方法论上是否合理，仅就所谓“针对着世俗化的文化批判话语”是在四百余年之后才出现一说来看，也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不仅仅只有所谓“话语/权力”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如果说“世俗化”或“世俗精神”的含义模糊可疑，那么伴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而起的反现代化思潮（这决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对功利个人主义，对庸俗的商业化人生，对一切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现代化”弊病的批判，几百年来不绝于耳，我们果真能够充耳不闻么？要是对中国社会才十多年历史的“世俗化”消极面放任自流，今天谈精神文明建设岂不是成了多此一举。

韩：针对神权的“世俗化”，是结束一种压抑人性的权利关系，而趋炎附势、嫖娼卖淫、恃强凌弱、坑蒙拐骗、贪赃枉法、车匪路霸一类现象如果都在“世俗化”的口号下得到宽容甚至暗暗追慕，如果知识群体的基本精神尺度都被“世俗化”视为大敌，那么这种“世俗化”恰恰是在建立一种压抑人性的权利关系。谁可以从中获益呢？当然只是少数人。掠夺者的“世俗化”和劳动者的“世俗化”，不是一回事。在法律的尺

度下谈“世俗化”，和在审美尺度下谈“世俗化”，也不是一回事。关切劳动者的世俗生存，恰恰是道义的应有之义，是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的重要价值支点。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这样的“世俗化”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把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视为宗教狂热，视为“左”。也许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从匆忙纷乱的利益追逐之中，渐渐获得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这种恶质的“世俗化”恰恰具有“反天下之心”。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世俗生存恰恰需要在一种社会的精神尺度制约之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 关于理论的实践品格

萧：你在与荷兰籍汉学家雷马克的对话中，提出来“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能将这一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吗？因为据我所知，中国文化从来强调实践、强调知行合一，中国是一个实用理性极为发达的国家，古代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重践履（尽管更侧重于道德方面）而轻思辨的倾向，而自晚清以来，更有将理论庸俗化，急功近利，片面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最终完全丧失了理论的惨痛教训。你曾有“文化空白”

一说，而我尤为深切地感受到了“理论的空白”。现在的理论家“失语”，不光只是由于浮躁，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病症。

韩：理论是“问题”的产物，都应该面对“问题”，即面对社会和人生的问题，面对本土和本人的问题，否则再精美和再高深的学理，都可能成为热热闹闹的文化时装表演，成为一种时下常见的夸夸其谈或者职称参评材料。我的“实践品格”一说，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你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轻思辨而重术用的倾向，理论经常庸俗化和功利化的现象，也许刚好是我们应该面对、深究并且相对解决的“问题”之一。把学问变成夸夸其谈或者职称参评材料，也恰恰是这种庸俗化和功利化的一种现代形式。我同意你的说法，一般来说，中国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也缺乏成熟的形而上学术传统，所以是一个讲求实利和实惠的民族。中国古人有“四大发明”但没有成熟的数理逻辑，就是例证之一。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说一说，或者拼凑几本教授著作，就完成了的。这需要一大批人有超越俗用实利的眼界和勇气，真正践履自己对真理的热爱、向往以及追求，将其化作自己的生命，化作自己的某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我们常常并不缺少想法，要命的是我们常常不愿意，也不敢把这些想法变成活法，也就是说，不敢把这些想法付诸生命的实践。

## 关于全球文化一体化

萧：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言必称“文化”的时代，也许不久连吃饭也不要叫做吃饭，而要叫做“吃文化”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倾向似乎也正在增强，完全相同的时装、娱乐和音乐甚至包括饮食（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的世界市场，已初步形成。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是在今后的五十年里，由于信息的环球性传播，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单一性，很多文化和哲学将消失。现在的国际互连网络、直播卫星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价值。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有人文知识分子也有科学家，意识到这种历史进步的二律背反，已在大声呼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像我们今天保护环境、保护全球生态平衡一样。在我看到的同一个资料中，对未来文化的前景也作出了乐观的估计，说有可能出现全球文化的再生现象，到那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有可能变得比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重要，当然，那时世界上许多地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很贫穷，贫富悬殊仍像今天一样巨大并得不到根本解决。

韩：文化这个题目太大，谈起来很危险。文化的全球一体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也需要细心的界定。有一些文化是有普适性的，比方物理、化学、数学以及其他各种科学等等。电话比信使更有效率，飞机比牛车更有效率，以我狭窄的见识，我看不出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电话和飞机的全球性征服。或许这就叫全球一体化？但有些文化因素是不一定有普适性的。比方说：可口可乐就一定比盖碗茶更“进步”？以我狭窄的见识，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盖碗茶等同于低劣文化或者没落文化。当然，那些可口可乐一类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正在努力通过广告、影视等传媒给全世界的人们构造一种文化观念：只有可口可乐这一类产品才与“进步的”、“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相联系。这当然是一种虚构。这种可口可乐牌的全球文化“一体化”可以有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利扩张，但最终不可能使人们在文化上完全整齐划一。就像生物界必须有物种的多样化原则，人类在文化上的多样化，是继续生长的必要前提。这种多样化当然体现为不同个人之间的差异。但若就群类差异而论，这种差异在以前也许更多体现在不同种族和地域之间，而往后可能更多体现在不同代龄、不同行业之间——比方说体现在“网民”和非“网民”之间。尽管如此，我们能不能把那时候的文化叫做“全球一体化”呢？“一体化”

这个词是否准确和合适，我表示怀疑。

## 关于民族文化

萧：你在十多年前即发起“文化寻根”，身体力行，近十多年来仍一直守护着自己顽强的表达。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你是否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文学的根”，即新的民族文化的生长点，还是仍在继续寻找，或者仍处于新的、不断的“迷失”之中——迷失在寻求之路。有这样一种诘难，即先提出一个假设的“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本体”和“纯而又纯的国学”，不等你对这个假设进行审视和界定，也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本体”及其他，然后便推导出“当你使用白话文去写作的时候，你已经不可能有那个纯净的国学的文化和自我了”。这是不是在说，你我只要仍在用白话文写作，就已经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中国人，而我们的写作统统都成了曾经受到你严厉斥责的“汉奸文学”？据说“我们文化的命运”已沦落到如此地步：“现在中国的文化完全失掉了自己的合法性。”“我们的文化并不仅是被动地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渗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重新指认，被命名，甚至它是在主动渴求被命名。对西方文化霸权积极而自觉认同。”中国知

识分子的命运同样如此：“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获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指认和命名”，而这还是“最好的出路”。难怪你虽然指出下跪的姿态很刺目，并认为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可还是有不少的“破落者”，不少“经济和精神双重困窘的族类”，争先恐后地跪在那里哀哀乞求。

韩：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与我有一点关系，但我从来不用这个口号。我已经多次说过，“寻根”只是我考虑的问题之一，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任何一个简单化的概念，即便有些道理，也不过是一些思维的“方便”，是应该“随说随归”的，一旦僵固下来就可能形成遮蔽，就可能危害思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能有“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本体”。不，至少在有了丝绸之路以后，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个民族的文化已经明显地不“纯”了，已经被“胡文化”和“洋文化”好好杂交过了，这正像英国、法国、美国的文化也被一些异质文化杂交过一样。但从来不纯的中国文化，与从来不纯的英国文化，还是有差别的，这是事实，不是什么杜撰。关注和研究这些差异性或者独特性，也不是出于一种对古人的特别好奇和责任感，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深深渗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人性之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当

前。一个住在中国的作家，不能去写英国人，只能写中国人，他为什么不应该关注中国人的文化呢？作为这个世界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中国文化曾经滋养过很多西方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倒应该放弃或拒绝这种资源？如果放弃或拒绝了这种资源，一个中国人是否有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的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在将来会表现为一种更加不纯的状态，将伴随着一个更加对外开放和汲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将来不管有多少杂而又杂的文化品种，它们仍然不可能是一回事，它们仍然有无穷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要求我们去了解。

## 关于怀疑论

萧：你在“寻根文学”时期，即十多年以前对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批判、对历史中的落后因子和非理性的批判，现在似乎更多地转化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商品大潮中的精神叛卖者的批判。近年来，你一直对所谓中国式的“后现代”策略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去年六月，对“怎么都行”的中国式“后现代理论”及其“世俗关怀”，对这种“理论”竭力鼓吹的“唯利益论”和“唯个人利益论”，包括他们对福柯的歪曲，都作了严厉批评。以前你似乎是一个宗教上的怀疑论者，仅仅

对禅宗还保留着几许好感，有的论者因此而把你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来描述。我认为这其实只说对了一部分。我知道，你还是确信世间的某些价值、追求和人格具有恒久魅力的，那些曾经激励过，至今仍在激励着你的人，有一个长长的名单……

韩：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都是可以怀疑的。二十世纪各种怀疑主义的文化思潮，把决定论的世界模式冲击得摇摇欲坠分崩离析，这是一次严格的文化检疫运动，也确实是一次彻底的读神和毁神。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决定论，就失去了价值标准，失去了精神秩序，人性就有动物化的可能。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当然不赞成动物化，不赞成“怎样都行”，但摆脱这种最虚无同时又是最实利的生存状态，我以为出路不是重新回到神学——无论是旧神学还是新神学，无论我们把领袖还是人民当作神，把家园还是艺术当作神，因为任何神学终归是脆弱而虚伪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重建真理和理想，不是要重返一些独断的结论。一些临时的决定论，或者局部的决定论，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正像港口对于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港口并不是航行。当港口并不能成为圣地的时候，当港口仅仅只是一个航行过程的支助和凭借的时候，航程上的无限风光仍然令我们神往，仍然与“怎样都行”有绝对的价值区别。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叫做“过程价值论”。

真理和理想正是体现在这种心智求索的过程当中，而不是某个目的性的结论里。我在《完美的假定》一文里说过一段话：“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在这里，我已经不大在乎任何结论的可靠性。但你也可以看出，在这里，我对过程的价值呈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甚至是有绝对信仰的。也许这是一种不成信仰的信仰。

## 关于方言

萧：《马桥词典》以方言土语入典，通过对方言土语的文化发掘展示一个地域的文明演变过程，其开创性和艺术探索之功不可抹煞，可以说是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词典这一小说体裁的表现力。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加，区域化、民族化的趋势也成正比例增强。你在近年来却似乎对民族感的日渐淡化、蜕变和消失感到忧虑。其实民族性或民族感包括语言，从来都在不断地蜕变和演化。比如我们这一代长沙人所说的长沙方言，与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所说的长沙方言，就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谁能知道在古老的长沙郡乃至长沙国时代，当时的长沙人操什么样的方言呢？书面的语言尚可以从残留下来的帛书或简书上看到一二，可当时的口语化石又从何去发掘、寻找？还不是丢掉了就丢掉了，消失了就

消失了。由此看来，你把语言作为一种“保持着区位的恒定”、“不会溃散和动摇”的“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恐怕也是靠不住的。“文化寻根”及对方言土语的浓厚兴趣，我认为只是你个人的一种文学、美学趣味和主张，似乎也并不具有普适性。

韩：方言往往是语言的具体存在方式，就像白菜和萝卜是蔬菜的具体存在方式。我们什么时候吃过一种抽象的“蔬菜”？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离开方言来研究“语言”？当然，像你说的，在现代交通和通讯条件日渐发达的情况之下，方言的特征也正在被磨损和侵蚀，不可能永世长存。我在《世界》一文中对方言特征恒久性的描述，也只是相对而言。相对服装、建筑、制度、观念等等易变的文化因素来说，方言当然是顽强和稳固得多了。正因为如此，方言有时候就像文化的“活化石”，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可以从中破译很多文化遗传密码，获取一些人性的历史知识。做这种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文化的交流和融会。我早就说过，我反对民族文化的守成姿态。乡土也好，传统也好，民间文化也好，任何基于守成原则的相关研究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文化“辫子军”；而只有把它们当作一种创造的资源时，它们才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必须慎用。是守成的民族主义呢，还是创造的民族主义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它必然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是鲜活而不是僵死的，最终，它必然是国际主义的但又同时具有鲜明族类个性的。

## 关于《马桥词典》的争议风波

萧：十多年以前，你在写《文学的“根”》、《也说美不可译》等文时，就对语言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趣进行了发掘，并对“方言词”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还写了《词语新解》、《词的对义》等文章，在其他一些随笔中也对语言问题作了多方探讨。在你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后，又专门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这一切都表明了你对语言非同一般的、持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因此你终于采用词典的体裁来进行你的长篇处女作的尝试、试验和创新，我认为这是你创作发展的必然。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美的选择、文化的选择。你很早就反对“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因此而有“文化寻根”的主张和持之以恒的艺术实践。当我听说有人横空出世地指责你“拙劣的模仿”、“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完全照搬”亦即完全抄袭外国翻译作品时，不禁哑然失笑。

韩：以事实编造和人身攻击来代替学理论争，是

“话语权争夺”的恶性爆发，是一次让人失望的学术失足和学术自杀。如果整个文学批评生态因此而发生倾斜和失衡，那么受害者不光是这次事故的肇事者本人，也是大家。本人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遇上真正高质量的批评对手，我们的思想也可能会变得粗糙和平庸，这不是什么好事。这只能说明，由于我们缺少必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秩序，我们离文化多样化的格局、离真正的文化成熟，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九九七年三月

## 雎：■另一个中国<sup>①</sup>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 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 NOYA（雎亚）。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文化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写和重构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乃至文学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致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投入中、西文化比较等一类时髦话题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雎。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林河专著。

雉，音 nuò，或 nò，从位，意为神鸟，后引申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雉戏、雉祭等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的雉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雉文化这个更大的结构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而就中国文明之源作出了新的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之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乎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距今八百万年以前的古猿人化石，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他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凤文化（雉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氏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也更重要的文化

主体，只是到了周代以后，礼制确立，神权旁落，“雉”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乱力怪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遮蔽。

林河先生为侗族学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相对于一般专家来说，对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切了解是他得天独厚的所长。在他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雉文化，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中一直流行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雉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源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雉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的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

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我曾经随林河先生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尊他为师，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并无真正的评价资格，对他在今后研究中更多注意方法论清理和建树的希望和建议，也只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感觉，仅供他参考。同样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一直相信，林河先生的研究——尽管眼下还不是特别完善和周密的研究，是人们至今重视得远远不够的一笔宝贵财富，终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别开新局，获得一种革命性的展拓和推进。

一九九七年三月

（此文为林河先生《雒文化研究》序言）

## 当年对床夜语<sup>①</sup>

我在中学时期的语文成绩不好，作为知青下乡以后逐步学习文学写作，得益于很多老师的指引帮助，胡锡龙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中文科班出身，这在当时的小小县城里并不多见。但“文革”的阴云那时节仍悬之不去，使他的身上多了一些拘谨之态，在机关里供职，常常和我一样免不了有时候要低眉而顺眼。两只粗布袖套常常随身配备，除了便于他供职时的辛劳和细致，还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终于工农化的流行形象。

他其实是一个开朗人，不乏工农本色的朴质和热心，毫无某些读书人的酸腐。他一手筷头行草的绝活和有求必应的楹联创作，更使他与城乡百姓尤其是各等引车卖浆者流建立了天然的联系。下班之后，如果有了二两酒或一碗茶，他也少不了朋友面前的天南海北放言无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7年胡锡龙散文集。

忌。我有幸是他当时私下里过从甚多的朋友之一，有幸从他那些坦诚的交谈里获得了许多语文的知识和经验，算是补上了社会动乱给我耽误的部分课程。有一次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效果不佳，自己也有些沮丧。他事后及时把我这一失败诊断为“体裁错误”：该写成小品的，你居然做开了论文么。这破的一语至今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作为一种实践心得和临场判断的智慧，这种诊断能力不仅很难从一般课堂学取，而且在时下诸多博士和教授中似乎也不多见。

我离开汨罗已有二十年时间，与锡龙除了偶有书信往来，并无太多联系。近日读到他写的一些散文随笔，倍觉亲切和欣喜。常常穿戴粗布袖套的他在文书中和乡亲们们的楹联中毕其大半生，并不是当代的屈原和曹雪芹，大概也无意靠文字来轰动或传世，但他关于告别父母爬上大山远游求学的动人记忆，让我鼻酸；他关于潇洒看透权势与金钱的夫子自道，让我亮眼；他在文史、民俗、文字、思想时论等方面的拾遗补阙之功，为文明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砖一瓦，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当然，这些文章里透出我熟悉的口气，熟悉的生活，熟悉的情怀，更使我的思绪不时飞向了当年，飞向了当年金黄色的油菜地，或者大雪掩盖了的乡间小路。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在乡间某个黄泥小屋里，一盏闪闪飘忽的油灯之下，锡龙与我抽着最低廉的香烟对床夜语，有不

知人间汉魏的飘然世外之感。待起身小便之时，忽听屋顶之上一只大鸟呼啦啦惊飞而去而不知所终。

我想，有那样的夜晚，一生便不再贫乏，也不再冷寂了吧。

一九九七年二月

（此文为胡锡龙散文集序言）

## 超主义的追问与修养<sup>①</sup>

对话者：韩少功 蓝白 黄丹

时间：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地点：海口市《天涯》编辑部

问：《天涯》近两年来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其改版被《新民晚报》列为“一九九六年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去年，上海三联书店的《书城》杂志又推出“97中国热门杂志排行榜”，《天涯》及《读者》等十二家刊物亦榜上有名，今年五月十九日晚的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又介绍了《天涯》与《收获》等四家文学期刊，而《天涯》的发行量几乎每月上升。一本有较强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杂志，为如此多的人所关注和喜欢，作为社长，你对此怎么看？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8年《南方都市报》。

答：《天涯》比以前多了一点影响，但不能说有了很大影响。这个曾经很困难的杂志在两年前改版的时候，编辑们相信生存之道不在于赶时髦，不在于拉赞助，而在于把稿件的质量真正抓上去。怎样才能有质量？当然就是要有“问题意识”，即善于发现社会和人生的现实问题。精神萎靡，知识混乱，创造力不够，这都是我们发现问题的障碍。这就决定了杂志既要与消费文化划清界线，即拒绝那些拜金的、势利的、跟风的、庸俗的文字；又要与所谓经院文化拉开距离，即要防止那些貌似高雅但实质上内容空洞心智贫乏的文字。宁夏一位姓陈的读者曾经来信，说《天涯》“不会让人变得更深奥更学究更神叨叨，也不会让人变得更低俗更琐屑更无可奈何，而是——让人变得更有教养。”我想这是对《天涯》最好的鼓励。《天涯》并没有达到这位读者划定的标高，但主编和编辑们在尽力朝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努力。作为社长，我尽力在社务方面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保障。

九十年代其实是文学与文化大有作为的时代，因为国内外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困惑和困难可以成为文学与文化的动力，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很多现代化想象已经完全不够用了，需要人们对思想和情感的现状作出新的诊断。在这个时候，一切言之有物而且直指人心的刊物都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想，《天

涯》只是这些杂志中的一种，如此而已。

问：确实，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旧式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化，出现了某种精神真空，而社会变动也更为复杂，激发了对社会变革殊异的理解与相应的主张、见解，各种思潮与学术也异常活跃。尤其是近几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甚为活跃，《天涯》也刊载了不少这样的文章，你自己也在《读书》等杂志上写了不少关注现实问题的文章，能否谈一谈你主要关注的问题以及你对这些学术思想论争的看法？

答：我不是专业的理论家，最近有个出版社邀请我参加“青年思想家”丛书，我谢绝的理由是，我既不是“青年”，也不是“思想家”。我有时候放下小说，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谈一些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看法，甚至偶尔打一下理论上的“遭遇战”，是履行一个人的文化责任，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正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几千年官僚政治和极权主义的问题；有些问题正在产生，比如消费主义和技术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式的，比如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运用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全球性的，比如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的问题，等等。当然，这些现实问题又牵涉到更多基础性知识原理上的清理和探讨。我以为，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文学刊物也好，回避这些问

题或者在这些问题上人云亦云，不是自己的光荣；恰恰相反，如果真要关心人，关切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包括要建设一种能够保护人生和健全人生的现代化文明，时刻抗拒某些潮流中的谬见和欺骗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还有点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要勇敢抗拒某些不义而且无知的文化潮流。在九十年代这个知识正在出现分化和重组的时候，人们有很多事情可做。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作为刊物内容的一部分，《天涯》确实发表了一些作家和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成果，并且包容不同的意见。作为社长，第一，我不会以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主编和编辑们对稿件的取舍，事实上，一些与我观点相异或者直接批评过我的作者，也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稿件；第二，我不以为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无误，坦白地说，我自己的思想经常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状态，并无终极的定见，而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思考的“方便”而已。我总觉得自己在“摸象”，不应该把象腿或者象鼻子当作大象的全部。这样，从总体上来说，我比较赞成一种超主义的知识态度——虽然我明白主义之间的抗争是很必要的，“深刻的片面”也是很必要的。超主义的通达和宽容，正是以主义的执著甚至偏执为前提。《天涯》主编蒋子丹有一个态度我很赞成，她说：《天涯》宽容一

切认真的探讨，惟一不宽容的，是那些出于不认真的文化垃圾，比如不讲道理但大言欺世和恶意搅水的文字。

问：这么说，你在思想学术上并没有固定的立场和观点？这种态度与机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答：我说过，我会有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实践前提和具体条件，就不是不可以怀疑的。这牵涉到一个知识有效性的范围问题。比如我们不能用“民族特性”来证明中国人就是应该官本位、家长制、不民主等等，不应该因此而拒绝国际社会所普遍公认的人权基本原则，中国不是已经签署和将要签署一些国际人权条约吗？但“民族特性”在某些领域却可能是有效的，比如中国人是否都应该禁京剧、吃汉堡包？是否不这样就不能“与国际社会接轨”？又比如“自由”的价值观，对于广大弱者来说是有效的，因为自由在这里意味着抗拒强权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在某些强者那里却是无效的，因为这时候的自由可能意味着为所欲为损人利己，比如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要求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自由”。最近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公司，中国取缔传销活动，这也是一些限制负面“自由”的现实例证。

坦白地说，我并不特别关心理论，只是关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很多知识及其观念，在这个范围里可能是有效的，在另一些范围里就可能是无效的；或者说在这

个范围里是强效的，在另一些范围里就可能是弱效的。因此我们的知识活动要防止越位，防止简单横移和抽象扩张。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他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经济上是社会主义，文化上是保守主义。不管他的看法是否正确，他至少明白每一种主义都要“因地制宜”，知识要因问题而择，因对象而用，不是机械的一元独断治天下。这是不是机会主义呢？我看不是。机会主义在表面上看来貌似辩证法，忽东忽西，亦左亦右，但骨子里缺乏追求真理的真诚，缺乏创造的智慧，只是一种势利心态的学术包装。机会主义刚好总是与真正的辩证法拧着干。

问：你思考这些问题对你的文学创作是否有益？是否会损害你的艺术想象？

答：文学是“不平之鸣”，没有问题追逼的文学是无聊的文学。当然，思想和感觉都能把握问题，而思想对于艺术来说有一个“载舟覆舟”的问题。一味跟着感觉走，可能是很棒的艺术家的，也可能是很糟的艺术家的，而有思想兴趣的作家，情况也是这样。与西方的“纯文学”传统相比较，中国文学从来以“杂文学”为传统，文史哲不分家，三位一体，思想（甚至理论学术）从来不被排除在文学艺术之外。这个传统我看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也是我们的文化资源之一吧。在另一方面，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对小说

的热爱，并不妨碍我思想的兴趣。就像我喜欢萝卜，同时也有权利吃点白菜。我没有必要因为有人说我萝卜吃得还不错，就永远只吃萝卜。我觉得顺其自然比较好。也许哪一天我突然对思想理论的兴趣减弱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问：《马桥词典》以后，你在创作上进展如何？

答：我本就写得不多，加上海南不设专业作家，我现在有一些作协会务工作和杂志的社务工作缠身，成果就更让人惭愧了。《马桥词典》以后，没有特别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写了几篇随笔，一部长篇小说的修改方案还没有成熟，作为读书的副产品，最近译完了一部葡萄牙作家的随笔集《惶然录》，将在上海出版。

问：你曾经译过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次，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译这本《惶然录》？

答：没有特别的目的，就是觉得这本书很好，很有意思。

## 反思八十年代<sup>①</sup>

采访对象：韩少功

采访地点：海口市《天涯》编辑部

采访时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采访者：甲子

整理：棋子

甲子：来之前我翻看了你写的一些散文和文章，发现你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还是一个在思想领域里非常活跃的思想者。你开始搞文学创作时，最初并没有想到拓展的范围会这么广，是吗？

韩：当然没有，最初只是写写小说觉得好玩而已，后来写着写着，就会有许多问题促发你去思考，而且小说有许多边角余料用不上去的，就写一些散文，而散文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9年《八面来风》。

就需要一些思想去组织它，去保护它，这就需要思想。当然作家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一定之规。在国外，今年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他就写了好多政论，写了很多有关社会有关政治的书，而且他从来就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活跃的人物。还有一个拉美的作家略萨，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天涯》——笔者注）也发表过他的政论性随笔。再往前数，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作家大多写了很多文学之外的哲学，而且我们古代的文学家也是如此，比如说苏东坡，他是海南最熟悉的作家了，但苏东坡其实是一个大的政治家，写了很多策论，给皇帝写改革方略这种文章。

甲子：从我所知道的您的作品就是最早您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这本书的影响的确也很大，您是怎样发现这本书的？最近我看有关介绍，您又翻译了一本书。

韩：是的，翻译了一本葡萄牙作家的书，这个作家叫费尔南多·佩索阿，早已经死了。我前年在欧洲的时候，到处都在谈他，开了不少的研讨会，报纸上也在整版整版地评价。这个人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名，就是在这些年才重新发现的，中国的读者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我也问过北大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的教授，他们也知道这个人很优秀，但在翻译的时候就忘了。按诺贝尔奖的评选办法，死了的人是不能参加评选

的，但去年得诺贝尔奖的就是一个葡萄牙作家叫萨拉马戈，他说他沾了佩索阿的光，因为人们重视佩索阿，所以也重新关注了葡萄牙。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的。看了一些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中国读者特别需要知道他，因为他写的情况同中国很接近，当时捷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从我那本开始，中国把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地翻译了大概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甲子：在一些文章中，我很刻意地关注到你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论述，这是不是现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反映的一个方面？

韩：所谓的自由主义（当然这个命名有简单化的倾向，也不一定准确，我写文章也尽量避免这样的命名）崇尚的是一种进步主义，就是世界是不断直线进步的。其实进步主义不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进步主义的，因为马克思说人的历史有五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进步，最后进步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直线前进的形式。但“进步”所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比旧的好，现代比传统好，所以说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普遍注重这种观点，甚至成为我们潜意识里的思维定式：对“新”的崇拜。毛泽东一上台就横扫四旧，五四也是反传统，资本主义更是反传统。但这种进步仔细分析也有问题。比如，你说三陪小

姐是传统是现代？再比如旅游文化，黎族老乡现在已经不住那种房子，还要造一些那样的房子让他们住进去，这是传统还是现代？不是说传统和现代在一切的地方都没有区别，但是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传统和现代不是简单地能够分为两种东西的。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所以说简单地按八十年代确立的这种以现代反传统的观念（当然还可能更早，五四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八十年代是一种强化），去认识现代和传统，你就不会真实地描绘现实，也不会真实地诊断。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化生产，包括理论生产，艺术生产，还有大量的诸如我们的服装、广告以及所有已经进入大众文化范畴之内的东西，都会造成一种误区或者盲点，掩盖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这种思维的简单化是八十年代启蒙或者说再次启蒙留下的一些毛病。九十年代的人至少应该反省一下哪些东西出了问题，而不要那么简单地区分传统与现代，市场与国家，等等。

甲子：我们国家是不是有这种从两极来考虑问题的思维传统，比如说阴与阳，科学与民主，进步与传统，都是一对一对的，这可能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认识却有它的局限性。

韩：人认识事物总是要有一些简单化。比方说，我对你进行描述，说你是个男人，这种描述本身就是简单

化了，很多东西你没有描述出来。如果我要详细地描述你，就会说，你是一个有胡子的男人，你是一个中年的男人，等等这样的话就没完没了，你要是把这个人完全说清楚的话，写上一百万字、一千万字都写不明白，所以说我们描述的时候，往往是简单化地抓住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有时候这种两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我们权且用来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就等同于你的认识对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两分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是不实用的，它需要三分四分或者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法进行分析。

甲子：我想，我们简单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套用这种模式通过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解决一下，但社会生活是一个较大的系统，有些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主要的。

韩：是的，就像股市，现在谁也说不清股市的规律是什么。两个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指导了一个长期基金投资会，就砸锅了，一赔多少亿。所以说我们认识事物的规律肯定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就完全掌握了世界，就完全了解了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认识模式，但都是瞎子摸象，每个人都摸到了一个部分。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历史上的过于乐观的情绪。日本裔的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观点，意思是我们认识历史已经到头了，按

市场经济按民主政治这样搞下去，不可能再发展了，不可能再变化了。这就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态度。

甲子：是不是肯定有一种模式在认识角度上是高于其他模式的？

韩：有，相对来说，是有真理可言的。这就是防止虚无主义。认为所有的模式都是有限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而意义常常表现为：相对来说，这个模型比那个模型更有效。

甲子：中国的官僚体制是有别于西方的体制。在我看来，我们国家进行改革要改变的首先是改革者自身，但谁愿意改革自己？谁愿意主动放弃利益？你对此是如何看的？

韩：如果社会没有危机和压力，既得利益者要放弃自己的利益当然很难，但在出现危机和压力的情况下，连皇帝都是想改革的。几乎所有末代皇帝都是要改革的，因为不改革他也活不下去。

甲子：那改革本身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还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前进？

韩：目的就很复杂了。我们不排除有些有识之士，是以一种全局的观念进行一种很理性的改革，但多数人往往是因为活不下去而被迫地改革。比如行政对市场的干预，对此当官的大多很高兴，我想干预就干预。但为什么他们还要不断地让出一些权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没有活力，经济是萎缩的，你也收不到税，也活不下去，你这个官僚机构也维持不了，于是被迫作一些调整。以前的八小时工作制，或者是工伤者劳保，这也不是西方资本家一开始就很乐意做的，但后来发展到他的东西卖不出去，三十年代大萧条，直接引起世界大战，于是人们意识到穷人没钱，富人也赚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很多思想。你要活，人家也要活，你可以活得好一点，但人家必须也要活，这样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所以才出现了以后的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福利等，也保持了社会的良好运行。这是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无数次的调整才有的今天。再比如我们在文革“学大寨”“学大庆”时期，那些官也当得有滋有味的，后来在他自己得不到好处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下去也不行，他也会去改革。所以，二十年来的历史也是不断的自我改革，这个前提一定是社会有重大的危机压力，既得利益者本身也陷入了重大危机，那么这种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明智之人，就会进行自我调节。

甲子：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似乎处于一种大家都不知所措的状态？

韩：出现普遍的困惑，也许是以前把改革想象得太简单了。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变化，都面临着一种调整，结构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经营方向的调整，等

等，包括个人都要选择。在这样的变化中，有些人会受益，有些人会付出代价，从总的来说中国是代价大还是受益大，这个东西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这完全是对中国执政者管理层的一次考验。也是对中国老百姓、中国知识分子素质的一种非常好的考验。中国如果冲过了这一关，也可能就会进入一个像四小龙像日本这样成功者的行列。按联合国今年的统计，世界上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国民收入比十年前更低，那么如果中国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就将要步入这八十多个国家的行列，比十年前更差。

甲子：从你的人生阅历来看中国发展的前景，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可能？

韩：这当然不好说，算命都是不好算的，只能从一个感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会付出很多代价，最后还是成功。中国在历史上是不保守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就把胡人的东西纳入进来了。后来又对东南方向开放，向海洋开放，把欧、美、亚、非的东西纳入进来了。中国人特别能学，比较灵活，这也使我们文化的包容能力很强。满族人进来，中国人把满族人也包容进来。佛教进来，中国人把佛教包容进来。

甲子：但这不是一种实用主义？

韩：这种实用主义就有两方面了，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或者就带贬义的实用主义，投机取巧啊。

但是灵活，没有教条，就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都敢想，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没有约束没有上帝，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力的表现。有人说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宗教。仅有的一点佛教、道教也很容易变成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是一种很实用的送子娘娘、财神爷等等，而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中国的坏人特别多，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没有人管他。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点使中国人很有活力。这是两方面的东西，到底在将来会起到哪一种作用？目前，中国知识阶层的表现不是很好，政府的表现也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国家这么大，所以可变的因素就很多，不像一个小国说亡就亡了。

甲子：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能说真话这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比较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开始多了起来，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缺少独立的精神，无论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韩：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知识界的表现确实不是很好，无论是他们做学问做研究的才能，还是他们的人品方面，都缺乏很多东西，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你到大专院校去看一看，很多教授讲师在干嘛，像个知识分子吗？甚至我们到中小学去看看，老师们都在干嘛？他们在认认真真地教孩子吗？我们的新闻媒体这

么多知识分子在干嘛？

甲子：是不是这十多年来，你也在极力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氛围，从《海南纪实》到今天的《天涯》？

韩：我们只能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没办法估计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就是只问耕耘不管收获。人在历史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有的父母连儿子都改变不了，你还想改变社会？《海南纪实》发行了一百多万，《天涯》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样就能改变多少吗？有时候你真不能有这样的奢望，而只是说这个事我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做的，我就去做，至于说能否产生效果，天知道。

甲子：你是怎样看待企业文化的？

韩：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观念，是说“更加看不见的手”。搞经济的都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我就说有一个“更加看不见的手”，就是文化。因为市场就是文化塑造出来的。你说市场讲究供需平衡吧，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决定了市场的运作，问题是：这种需求是怎么产生的？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以为，需求是人的天然的本能的要求，比如说吃饭。吃饭肯定是天然的本能的，但是我吃汉堡还是吃牛肉拉面，这种需求就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一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再比如我打高尔夫，我本来有这种需求吗？没有，但为什么大家要趋之若鹜地去打高尔夫，就是一种文化给塑造出来的。如果人真是本能的天然的，人就会

像动物狗猫牛，几千年几万年它的需求都不会变，它们会去打高尔夫吗？当然不会。又比如说大哥大，有些中学生也带着大哥大，你说他有什么需求？他根本不需要，他和谁打电话呀？他挂着大哥大，是为了一种荣耀，一种进入某种阶层的身份，这就是一种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媒灌输到他脑子里去，然后就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所以我们说看不见的手后面有一个隐藏着的更加看不见的手，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文化。你只有把文化研究出来，你才会知道我们市场的需求是怎样变化的。很多人做曲线、研究图表研究我们一天能吃多少饭，一天能穿多少衣，用这些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经济。你以为人就是简单地吃几顿饭穿几件衣吗？亚当·斯密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他就说人天生有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解是不同的，对利益的看法不一样。伊斯兰教的人认为这是我的最大利益，但基督教的人就会认为这不是我的最大利益。再比如一个人认为尊严是最大利益，要我丧失尊严去讨五块钱，我是绝对不干的，但另外一个层次的人就认为尊严不值钱，能讨五块就讨五块，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就是绝对不一样的。人因为文化的构成不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行为。

甲子：现在的企业家基本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代是个体户，八五年起来的一批，后来就是从国家机关

出来的，但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通过讲故事把资金弄到手，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市场而是怎样把钱弄到手，可能这几年产生了一批现代的企业家，他们还真是从市场出发，但想想中国这么一个传统的国家，国营企业这么庞大，官僚体制这么厉害，中国有多少民营企业不依附在政府的身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中有多少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家？

韩：我想市场的规则没有建立以前，能利用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赚到钱，就肯定是用一个非市场的手段，因为市场本身的游戏规则没有成熟，我按这个规则玩不行，就按别的规则办。非市场规则就是送红包，与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开个发廊我就找个派出所的警察做后台。权力经济，官商勾结，既毁市场也毁国家。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力量就强大，如美国市场完善就产生了很多税收，税收增多，警察的装备就非常好，官员的薪水也非常高，官员怕丢饭碗也会廉政一点，在这方面市场和不完全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完全是有些人说的那样：国家与市场你死我活。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包括一个很健全的国家能够较好地保护市场规则。我们国家为什么贪官这么多？因为国家养不起这么多人，就收那么一点税，还要制造原子弹，还要养这么多的军队，还要搞这个那个，最后分给官员发薪水就没有多少钱了。官员活得不够好

就来插手市场，把市场规则搞乱了，市场运转不灵，市场产生的税收就更少了，国家就更弱更乱了。

甲子：你对俄罗斯的改革是怎样看的？

韩：俄罗斯现在稍好一点，但前一段是市场也不灵，国家也不灵。寡头资本主义形成大的财团以后，力量强大得很，可以与国家对抗，不交税，国家也没办法。国家收不到税，就发不出工资，贪污受贿也很严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自由主义者也不提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情况确实不好，但愿会很快好起来。印度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注意。我到印度去，看见它的飞机场就挂了一个很大的招牌——欢迎你到最大的民主国家来。印度确实也民主，报纸是各党各派搞的，但是它的市场经济没有搞好，比中国大约落后十年到二十年，街上的汽车全是破铜烂铁，连新德里也是满街叫花子。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民主就等于市场经济。新加坡的民主程度比印度差远了。香港的民主也比不上印度，彭定康以前都是行政主导制，而不是议会主导制，议会的很多议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搞得很好，所以不能将民主和市场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非洲还有很多国家也是民主制的，但情况更糟，每年饿死多少人。所以八十年代最值得反思的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很多的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建立了一种现代化的想象，这种现代化的想象是由很

多等号组成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等于政治民主等于现代化等于美国，这样一系列的等号划起来就建立了大家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甚至到我们现在当代的中国共产党内的上上下下的很多官员和他的理论家以及他的意识形态的指导者们都是这个模式，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表面上也写一些其他的应景文章。这种思维模式在九十年代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在下个世纪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国家在八十年代恢复市场经济是对的，没有市场的社会就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但是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它是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就有必要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来看，俄罗斯是什么情况，台湾是什么情况，印度是什么情况，美国是什么情况，非洲是什么情况，中国可能出现什么情况，这样的研究才会有道理，而不能简单地喊一些口号，建立一些等号。这么多的等号会使我们认识问题变得非常的简单肤浅，从而犯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

甲子：九十年代这样的呼声会越来越高，除了对我们过去的认识反思外，是不是对邓小平理论也会有一些反思？

韩：肯定会有，因为邓小平的理论本身按它的说法，它也不会是绝对真理，所以肯定是要反思的，这种反思并不是要回到七十年代去。七十年代那种完全扼杀

市场扼杀民主 ,那种运动经济僵硬计划 ,肯定是不对

在  
小说  
的  
后  
台  
反  
思  
八  
十  
年  
代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的。但是八十年代在肯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也产生了很多简单化的认识模型，这种模型是需要修正的。就像我们中国现在内需不足，失业增加，城市贫困问题在急剧严重，因为市场有些不灵了，有钱人不投资，不敢投资，他觉得没有规则。结果市场不产生税收，国家如何运转？这个问题不是说就像八十年代那种想象，靠市场化就能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主义的讨论中间，我比较赞成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怀疑，因为自由主义很多学者都是太简单化的，以为市场化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化就是美国化。这种观点连欧洲都不赞成的，但这种观点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甲子：我们用特别简单特别粗暴的方法拉动市场，比如说拉动股市，以为拉动了股市，让它火起来，大家有钱了就会买东西了，看报纸新闻媒体也是大幅报道股市起来市场就应该好起来。

韩：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可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内需不足就是一个贫困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纳入全球化格局之后，沿海发达地区与境外循环，与境内不形成足够的循环，结果造成了一些富人，但是也造成了更多被抛弃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甲子：你怎样看待现在出现的贫困现象？

韩：在很多人那里出现了绝对贫困，还有相对贫困

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海南的打工仔，一般工资十几年都没变化过，八八年就三百来块钱，现在还是三百多块钱一个月，甚至倒退到两百多块钱一个月就能请到工人了，你说增长了吗？没有。这就是相对贫困。也许你会说他在城市打工比在农村好一点。但你不能这么比，它在家里可以感受家庭的完整，有利于对孩子的教育，他还有尊严感，是土地的主人，但在城市里他的地位却很低，而且还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比如现在的学费这么高，他在城市各种开支的费用也很高。把这些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等等抛开，他还是增长的吗？未见得。很多国营企业就更不用说，现在很多人只能吃饭了，连肉都吃不到。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贫困，怎么办？我们以为市场能够通过什么“涓滴”效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渗透让这些人也能受益也能搭上车，问题是这个途径没有实现，就像三十年代大萧条一样卡住了，穷人富人都着急。六万亿存款分到每个人是五千块钱，三口之家就是一万五，这一万五连孩子读书都不够。所以你说这个内需不足是什么问题？实际上它就是贫困问题，我们把这叫内需不足。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照搬西方教条是行不通了，一个消化中、西各种经验并且坚持创新的新中国正在出现。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书信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闲邮拾零<sup>①</sup>

### 感觉也可蜕变

枢元：近好！

前信想已收到，留下《超越语言》这个题目另外给你写。我没有系统读过语言方面的理论，由你这本书给我补补课，快餐式十全大补，得谢谢你。我赞同你的基本看法，觉得你冒犯当前的语言学大潮，大造了一次反，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把你的文艺心理学扩展到更阔大更坚实的基础上。你把本来不可言说的东西说得大致明白，很不容易。

艺术语言本来恐怕是不可实证的命题。佛学最后的办法就是让人中断理智和逻辑，虽然粗暴，却也较为彻底。我们暂时还不行，总是忍不住要说。一九八六年我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4年《文艺争鸣》。

在上海座谈：（一）好小说探寻主题是成功也必是失败——迷茫；（二）好小说建设语言也必破坏语言——失语或胡言（大意）。当时若碰到你这本书就好了，就可以说得更壮胆了。

这些年引进洋人的方法，常常是阴差阳错。尤其语言学，多是科学主义的面孔，因其论者的科学底子不够，对于文学到底有多大的用，我一直存疑，总觉得搔不到文学的痒处，或最痒处。你在语言学领域里坚持或恢复审美的立场，是清除谬误的劳动模范。这本书的分量很重，依我看，足可以“西渐”一下入侵欧美。也许我孤陋寡闻，至今还没有看到关于艺术语言的好书。

H 等人对“酒神”也一直给予理论化的尊重和景仰，但衣冠楚楚从来不曾醉酒，最终自然只能拿政治和理性的番茄汁来邀客。这是我看 H 大师一些对文学、电影作品评论时的感觉。

当然，我并不认为科学主义到今天才霸权，人类物盛心衰恐怕不是自工业革命始，物学（科学）为显学恐怕是个古老的话题。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佛陀、基督当时的悲哀。我也不认为艺术就比科学高级，不认为感觉就比理智更接近人性，或更能保护人性。时下的流行文化不也是很“感性”吗？也就是几年前，朦胧诗还被视为革命性的事件，而现在，任何商业广告语言也可以诗，也可以朦胧，也跟着感觉走。自嘲 OK 的卡拉声

色卡拉犬马，从来不理性的，而且是对“大漠孤烟直”、“人迹板桥霜”以及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等构成几乎自动的排拒。可见感觉也可以蜕变，也可以被物欲改造得臭烘烘。谈审美时似不能忘记这一点。

以上仅供参考。

感谢你送给这本书。顺颂时绥

韩少功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

## 文学哈欠

立伟：近好！

示悉。蒋回来就忙着喂猫和忙着煤气中毒什么的，还未将你的漫画大作给我，但我在书店里已见到你在书架上赫然，开本及封面设计很爽目，一定是让人喜欢让人受用的。说起这些文墨事颇让人感叹。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是山中无勤虎，猴子也称王——文界艺界现在什么观念也不缺，首先缺勤快。

最近也写点文章，算不上要为文学引颈就义，只是眼下不写写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做。做得不好，总比虚度时日好。过了年，人客散去，便想看些书。书店里实在没有什么好看。港台某些太太散文或仿太太散文，在北京出版了一堆又一堆，见到什么小草小花就振作精神爱

一番，不爱点什么就没法把日子过下去似的。可遥想太太们每天花两小时化妆，花两小时沙龙酬客，再剩下两小时来作散文爱，这种润肤护发去皱文字居然可冒作优雅美，实际上是一种贵妇病，类如偏头痛。

王安忆越来越古今中外，一两年就有换代产品只批发不搞零售，最近的系列一块块收复境内外大好河山，其中似以写香港那篇感觉含量最高，虽然哲学，但不似哲学气功，不累人不暮气。

张承志斯坦也可看。他深入敌后更加发现了敌情，就回国来发动文学界的芦沟桥事变，打响抗日以及抗美第一枪，主要的工作就是重提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扩大统一战线就把汉族人及黑人当作穆斯林的兄弟交流正义与仇恨。我很担心他被误认为光头党，或真被光头党高兴地列入联络图。但我景仰他找到了精神敌人所以激情和新句子弹雨纷飞横扫千军。摇滚离骚摇滚古兰经，前卫放血。相比之下，很多文学人现在的悲哀在于丢弃使命也没有能提提神的敌手，连一个假想敌也找不到。一天没被劳改并且有了喝酒和勾引女人的自由，就没有了真正的兴奋点，占了各刊物的头条也只能满脸抹万金油，打文学哈欠。

与湖南联系很少。近有聂鑫森手录《幽梦三影》邮来，中有妙文可心，果真不凡。一接鑫森墨宝就知其仍如 UPS 稳压电源，抗干扰能力强，心态奢侈得连钱

都不想赚了，仍然活出楷书和绝句的味道，应该被旅游部门列入湘楚八大或十大人文景观。舰平偶有电话来，眼疾依旧，前不久写出眼疾人内心景观，倒让人读了亮眼。只是他闲时太多，便对电脑一再全方位服务，最终还是决定舍弃国民党汉卡，回归祖国的北大方正，一失足成千元恨。

马原仍潜伏海口造经济反，自称是海南惟一骑脚踏车的老总。有次却不过去海南大学讲了一盘文学，潘军一听就很生气，觉得自己领导不力，扎着袖子发后先锋脾气，说“这小子说得好好的怎么还做这种事？”潘军自己最近解构广告业，好几次传达老婆语录，宣言文学整体性的失败，也蛮横地不准马原偶发性地变节动摇居然还向文学暗送秋波。

百事可乐余不一一。侯顺适

少功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 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

## 中国的特殊国情

× ×：你好！

对历史重新清理十分必要，终于有人做这个工作了，文章也给我很多启发，谢谢你。

总体印象上，有一点似乎还得多下笔墨：即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性。这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因为人口、资源、缺乏资本和国际冷战封锁等严重问题和特定历史处境，革命、政治以及理想道德才成为这种国家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社会改造工具，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替代。我们没有条件靠高薪支农，靠巨奖采油，靠专利制度搞“两弹一星”，靠国外超额利润来缓解国内矛盾并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是中国经验和毛

泽东思想中最有意义之处。如果说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有可能有依附性发展，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走与欧美日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有些官僚与知识分子都无这种眼光，这是中国发展多次发生内部冲突的原因之一。革命后期尤其是文革中极权与人权的冲突构成另一方面的真相，但常常被用来掩盖了前一种冲突。这两种乃至更多种冲突才构成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毛超越了斯大林，但对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仍无彻底性，比如对进步、科学、历史规律等基本价值的崇拜，导致他后期特别是在文革中采用极权和斗争方式时不择手段，具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样的道德优越感，只是西方殖民者为“先进文明”而不择手段，而中国革命者可以为“先进阶级”不择手段，包括对某些所谓“封建”制度资源（山呼万岁，家长制等）的容纳与利用也就顺理成章。一个第三世界的农民集团“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汪晖语）”，最容易落入这种结局。这一过程不能少谈，恰好应该多谈和谈透。这可能是我们实现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时代的重要工作。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不是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中国的（不是一厢情愿照搬欧美日的）人民的（不是属于少数巨富和官僚的）现代化。

最近对某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瞟了几眼，没

有时间多读。感觉他们理论上颇多亮眼之外，也有不少问题。可能是出于我很糟糕的文学感觉和怀疑主义，觉得他们大多对人的复杂性注意不够，多概念的推断而少生活的感受。比如说自由竞争将导致垄断极权，这个逻辑过程是对的，但人很复杂呵，垄断极权集团内在冲突很可能超逻辑地出现自我调整和改革，包括汲取社会主义的很多成果。十月革命一闹，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计划调节和控制，福利政策和工会权益等等，这些社会主义遗产都被后来的资本主义汲取并且促成了他们战后的繁荣强盛，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幸在这个时候滑向僵化。说全面民主的方案也是对的，但同样得考虑人的复杂性，考虑民主的内在冲突，不宜过分地理想化。前人对资本主义的预断和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所以出现很多意外结果，撮其大端，我以为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把人的多相性（私性/群性，自然性/文化性，理智性/情感性等）纳入他们的理论运算，在有些时候把社会过程都书本化和图标化了。事实上，因为人的复杂性，各种体制都会有很大弹性，在一定条件下都有改革的内动力。

作印象之议，你不必当真，我也是随便聊聊。颂  
秋安

少功

## 革命的原因

× ×：你好！

能清醒把握现实的人都不多，何况历史乎。我在农村当知青六年，至少明白农业学大寨并不完全可笑，在没有强大国家财政的时候，在世界银行之类相对于一个大国也只是杯水车薪的时候，不靠精神动员、艰苦奋斗、集体体制下无偿或廉价征集人力和物力，如何能完成那么多农田基本建设？那些设施至今还是农业的老本钱，是当今很多地方农民致富的依托。想一想印度眼下每年的水患，想一想非洲眼下每年的旱灾，就可知道当年中国人的汗没有白流。有人说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这当然是部分的事实，但也说得过分了，因为现在算出来多少多少亿的国有资产流失，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不就是当年的收获和积累？在这一点上，农民比很多知识分子洞明，所以曾经说“毛泽东搞建设，邓小平搞生活”，并不把改革前的几十年一笔勾销。只有毫无历史感的人，才会以为中国一开始就可以靠外资、靠高薪甚至靠大家的搓麻和泡妞来整治国土。

八十年代以来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确实是非常明智的改革，现在重提社会公正和社会保护正是为了使市

场经济更健康发展。过于两极分化，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萧条，所谓内需不足，多数人没有购买力，老板们也没法做生意；二是犯罪（剧增）或革命，如果社会不能尽量使大家都搭上车，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二次分配即非市场化的分配，无活路的人就会以暴力变相实行之。这两条都会使市场经济受挫，富人也活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冲突的良性解决就是阶级的共存和互助。

中国人均资源很少，历史上各朝各代只有抑兼并才能防止危机，才能安邦富民，其现代版本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往或是体制内的改革（如贞观之治），或是体制外的革命（各次农民起义），原始小农的社会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粉红色的孙中山和红色的毛泽东。这个传统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中国为定居农业社会，人口转移和国土拓展的空间小，明清以降虽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仍然尖锐化，无法像欧洲国家那样，凭借技术和财力的强势，可以向整个美洲和澳洲以及中东、非洲大举移民，大举开拓殖民或国际贸易的获利空间，并可能“以外养内”、“以外安内”，培养本土的中产阶级并依托这个阶级来结构民主秩序。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受到冷战的政治围堵，连下南洋这种小调整都不可得，反而要增加军事自卫的高额成本。中国怎么可能像

有些人说的那样“以英美为蓝本”？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设想以及实行统购统销，并且直接引发后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粮商的投机导致城乡粮荒，整个上海和南京差点就没有饭吃，于是再一次证明“抑兼并”的必要，证明当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诸多条件尚不具备，或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因此每一种主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聪明人从书上读来的，而是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策略选择。至于这种选择带来了别的问题，滑入了别的陷阱，那是应该另说的。我们清算革命时代的悲剧和罪恶，甚至可以反思革命手段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当年革命的真实原因。答案不对或不全对，不意味着答案所针对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当今一些小说家的笔下，看法似乎特别简单：是中国革命毁了他们的好日子，革命只剩下血污和残暴（当然可说部分真实），大概只能让鲁迅先生以及当年的左翼作家都大为惊讶和绝望。

印度为宗教之国，多宗教之国，故有独立运动而没有社会革命，一直保留贵族制以及由贵族集团控制的多党民主，这一点使社会的破坏性震荡较少，杀人少，庙也烧得少，但森严等级制极大限制了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重新配置，社会动员力太弱，在很长的时间里哪个想改革，哪个就更可能“民主”地中箭落马。因此虽有不

错的上流社会,包括大学发达、新闻自由等等,但农村教育、公共卫生、水利及农田整治成了经济的最大瓶颈,中下层的广大地域可说是满目疮痍,贫困和灾荒的“杀人”并不见少。如果没有宗教镇痛,很多极贫地区恐怕早已崩溃。但中国的有些知识明星既不看中国的过去,也不看印度,不看俄罗斯,只看欧美,让人觉得糊涂。

我相信吉拉斯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完美的社会。若心怀恻隐,行任何主义都当使代价尽量减少,否则便会丧失其公共性和公正性。中国、俄国、印度在这方面国情相近,都有深刻而重大的教训,应该互相借鉴。颂  
时绥

少功

## 学术的利益背景

××:你好!

回家后又忙起来了吧?这次开会也是我们尽力而为,能否有益于世道也只有天晓得。

我不喜欢当少数派,但并不害怕当少数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自由化分子”,也是十面埋伏,频遭攻击。过了这二十年,我看知识界很多人还是没有什么出息,只会随大流,赶浪头。比如赶一赶批判文革的浪头,至今还在一个劲地抹鼻涕。其实现在痛斥文革还

需要多大的勇敢么？“全面否定”文革不已经是党和政府的决议而且几成全民共识么？这种一心跟党走的行为如何还要摆出烈士的悲壮？又比如说纷纷争夺“民间”身份。“民间”当然很好，但黑道很难说是“民间”，那只是另一种专制组织；黄道也算不上“民间”，那是金钱控制下的另一种体制，另一种权力。有些人的所谓远离权力，其实是向另一种权力跑步前进，比如开始学会“傍大款”。真正的独立并不容易。

有很多人算计得很清楚，眼下思想“犯上”的风险已经大为降低，而这种体制内的损失可以用另一种体制内的回报来弥补，如国内的损失可以用国外的回报来弥补。政府手里只捏着几个官位几个职称，连饭碗都管不过来了，能管住的几个饭碗里面也无太多油水了，各种资源正在往“民间”转移，因此“民间”不热起来也就不可能的。有些人编造一些故事，冒充“民运英雄”去找外国基金会要钱，就是看出了这些故事的商业价值。有些人动不动就把论敌封为“官方”，于是自己可以得到记者的追捧，编辑的青睐，评论家的赞赏，还有西方大量名和利的犒赏，也是看出了这种“民间”身份的商业价值。故表面的“勇敢”后面，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投资权衡。有一个老板对我说过：“现在好多数人的爱党和反党都商业化了，一点都不严肃了，好没意思了。”

我曾经很觉得奇怪，有些人对革命时代一个党委书记糟蹋妇女怒不可遏，但为何对眼下老板玩妓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甚至还津津乐道？那么当年他的怒不可遏是何道理？是不是以为只要金钱代替了政治权力，强奸也就有了“进步”？恰恰是这些冷漠者，也在热衷于民主化，他们在有了地位、名声、金钱乃至各色小蜜以后，当然就只缺一个权力了。但这正是民主和宪政面临的新危险。这些冷漠者如果只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权力等级制，那么他们不过是要把老权贵取而代之，改朝换代；或者是要在老权贵那里分享权力，合股联营。他们的政治情结与人民真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没有什么关系。

当前的争论既是学理之争，也隐藏着背后这样越来越明显的利益背景。多数人的思想分歧当然是源于思想方法、观察角度、个人经验等等的不一样，这种分歧最终比较容易沟通或者相互补充。但个别人对有益于社会的事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们凭鼻子一嗅就知道自己能从什么人那里得到好处，得到资助、喝彩、出国机会以及在 BBC、USA 的大出风头。他们像飞蛾趋光一样有天生的“趋金性”。所以我常常感叹，这后一个问题比较难解决，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理论问题。

再聊。

## 好战者让人厌恶

× ×：你好！

文章拜读，觉得不错。民族主义容易走火入魔。其实中国过去丢了高丽、南安，后来又丢了外蒙古等等，虽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但也未见什么天崩地塌，而且现在谁都心平气和地想得通，如此便可知国家主权很神圣，却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国家或民族之间烦事也多，并无太多良策，能谈爱就住在一起，烦了就打离婚，没有什么了不起。硬要为神圣婚权和国权血刃相见，或者导弹打来打去全都不活了，只能是糊涂和居心可疑。联合国里一下就增加了好几十个国家，让我们的地理知识几乎废了一半，都是闹“婚变”给闹的，也只能由他们去吧。

至于西方强国想分解对手和制约对手，那是另外一回事。虽说是自然而正常，却未见其仁，Y的文章为美国出兵科索沃叫好，缺点是把美国说成是道德义军和雷锋群体，这起码还需对其进行萨特或加缪式的现代主义教育。

中国当然也要立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民族国家体制时代，当然也可学美国搞点正常而自然的自利行为，但得有个度，比如反战就是一个度。鼓吹战争总是让人

恶心，因为这些鼓吹者没有一个准备自己上战场的，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丑恶之处。据我看，自古以来凡平稳时期，多是武官好战而文人反战，这是因为武官要多拿军费花花；凡战事临头则多是文官好战而武官反战，这是因为文官都站在安全地带。我没有去打仗的愿望，所以除非人家打上门来，我反对用战争手段去实现合理或不够合理、明智或不够明智的各种国家利益。几个大学生容易情绪冲动，一爱起国来就容易“血血血”、“死死死”地慷慨悲歌，当然难能可贵；可真要他们操刀上阵，恐怕其中很多人又要责怪国家不珍惜人才了，又要责怪国家剥夺他们的谈爱权和深造权了。这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连蒋介石都看破了这一点，只能摇头叹息。

世界眼看就要分裂成五百多个国家（专家估计数），那么多边界和海关和总统并非人类的聪明所在。科长本就多了，还加那么多总统！这当然不是什么美事。奈何？

颂

时安

韩

## 骗子的盈利空间

× × :

“请教”太吓人了，聊天便是。文章文理俱佳，有何不好？为避“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可附一则说明，说明写作时间以及自己眼下文章出手的想法。

各种精神骗局可被政客利用，但确实不完全是什么政治现象，而是永恒的人性痼疾。哪个政治派别里都有精神骗子，哪个时代也免不了邪教和准邪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是“政治”一讲就灵，一讲就百弊皆除的。说这种骗局是“唯心论”也不在点子上，因为正常宗教也不是什么“唯物论”，却也做些好事，起码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起码能受到政策和法律的保护。美国大概是科学最为发达的，但几天前我对何清涟说，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科学家信宗教的更是比比皆是，可见科学与宗教的所谓“唯心论”（暂时就这么说吧）并不是非此即彼。要真正说清说透这种骗局是怎么回事，一些简单化的宣传不但无用，而且后患无穷。

中国有玄学传统，少实证功夫，通才多，专才少，动则天上地下搞大系统。这样一来，中国可能出圣人，但最可能同时多产骗子。这大概是骗子们的文化渊源。

而且中国除西藏一块，一直缺少真正成熟的宗教，特别是汉区的宗教只有灶王爷和送子娘娘一类福利官员，很多宗教活动就是贿赂这些官员以求安求福，如同在世俗社会里收买科长或局长。信徒们大多没有对“天命”和“天训”的敬畏，只有对利益的算计和保全。在这个情况下，道德不像有些西方国家由教堂来管理，而只好政治化或美学化，价值空白由政委、书记或文化人来填补。这种传统也许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已。只是一旦政治出现了“三信危机”式的内分泌失调，很多执政官员都惟利是图了，文艺圈也差不多变成娱乐圈了，大众的道德信仰就势必茫然无依，于是“真善忍”就成了精神骗子们广阔的盈利空间。这大概是骗子得手的社会条件之一。

西方当然也有骗子，但西方多少还有宗教顶着，施政者的道德压力有所分解，政治只是政治，总统泡了一个莱温斯基照样可以当总统。这不似全能政府下的一治皆治和一乱皆乱，道德信仰危机总是要施压于政治，而且也通常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现在大家都说全能政府不好，就是要分散管理的风险和压力，但不知道精神这一块将来如何处置。蔡元培早就说过最好用“美育代替宗教”，可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现实却是有人在用“气功代替宗教”，这只能让蔡老先生瞠目。

如你所说，大话一旦超出人们知识实证范围，就无

法驳斥，也就不怕没人去相信。要玩就玩大的。这是当下的骗局特点。牟其中不也是在玩经济大气功么？还有些人不正是在玩政治大气功、学术大气功、艺术大气功么？喜看气功千重浪，遍地大师下夕烟。中国似乎是块特别肥的骗子高产田，那次我去看了一次元极功的演示，想真心学一点气功，但活活地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不容你不承认皇帝没穿新衣。明明背上台的瘸子都是一个个再背下台的，但全场信徒就是要欢呼气功治好了瘸子的奇迹，让你觉得太阳真是要从西边出来了。从众心理，知识奇缺，再加上有些人急功近利（谋延寿消灾之捷径），以及沽名钓誉（我跟你们常人玩的不是一路），都使文革势不可挡。

其实他们大多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只是错把骗局当作了自求自强的廉价快车票。这样的弱者越多，这样的快车票也就越多。所以扫除骗局还得有整个社会的改良，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颂

撰祺

老韩

## 多元的没心肝

× ×：你好！

收到两封一样的信，但题目不一样，不知是什么鬼闹的，反正能收到就行。

说起美术，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原来一直订《中国美术报》，后来没订了。见到一些画家，觉浅陋和庸俗，只是拿吓人而轻薄的前卫作派来包装而已。什么装置艺术，行动艺术，有些人惊世骇俗还有些来由，但大多数是毫无感觉者的虚张声势，与这两年臭了街的一些电视台春节晚会没有什么两样。

最近看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当年一个获奖电影《云上的日子》，才知中国一些先锋导演的作品原有所本，把几对男女一些破碎的琐事拼结起来，示之为深刻，这其实是傻子都能干的活。就算是打碎好莱坞的情节霸权，也得放点血才对么。破碎取代周密，一定是破碎更能表现人的情感和灵魂才有道理。怪诞代替寻常，一定是怪诞更能表现人的情感和灵魂才有道理。

有些人现在是戏不够，人权凑。中国的人权当然问题还很多，但对于艺术家来说，有好作品的人权是真人权，没有好作品却硬要给作品加人权的外销包装，便居心可疑。文学损失政治补，这种戏一轮轮见得多

了。

八十年代艺术始有主义之争，九十年代的艺术在很多人那里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人民币服务了，于是在很多人那里，各种主义只是各种作派，没心肝是一样的。这就多元的没心肝代替了一元的没心肝。故说艺术有“进步”有“发展”，大谬。

再聊。颂

安适

少功

## 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

× × :

再写几句。“后现代”中的一些人解构理性与科学，是一种轻狂和野蛮，是为他们半文盲状态作时髦的辩解。我同意你对他们的看法。

但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科学本身并非万能，它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控制甚至是压制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福柯（他常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思想来源之一）的提醒也许值得重视。这“后现代”不是那“后现代”。

问题：一，科学永远是必要的，重要的，但科学主义表现为滥用科学，比如将进化论加之于社会，将机械

论加之于历史，将政治或经济学加之于文学艺术等，常常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也批判科学主义，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

二，科学不光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甚至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某些科学超常发达，如对历史上某些强势集团有利的地理学、精神病学、军事科学、当前有关金融与电子的科学等；而有些科学反常地萎缩，如解除穷人疾苦的职业病治疗，贫瘠地区的水土整治，就可能得不到应有的科研投入而长期缺“学”少“术”。甚至有些知识被列为“反科学”：在革命时代妨碍革命升温的人性研究，在市场时代无助于市场扩张的“人文精神”，不都被打入“不科学”之列？这都显示出科学并不那么价值中立。

产值利润率曾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铁律，但如果换一种观念，在计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效率时，把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包括世界大战、文革、生态危机等）都打进去算，那么不仅往日的社会主义效率不高，资本主义也牛皮不起来。这种新的成本概念将导向一种新的经济“科学”。与旧的经济“科学”相比，哪一种更“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是“科学”变了，还是制造出“科学”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变了？

断演变的解释体系，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复杂互动的产物，从来没有绝对真实或绝对客观可言。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但为什么能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对谁有利？……却受到“人”这一变数的制约。我以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变数的作用更明显和更紧要。

中国人最缺科学，又最迷信科学，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是五四“德先生”的应有之义。这种阴阳两虚的病最不好治。这使我们说话都难，一说就可能被人误解。

再听你们的。

少功

## 文化这个大魔方

× ×：你好！

来信是大题目，平时不敢妄言，私下里也许可不避冒昧地说说。

我当然也不赞成把文化差异性绝对化。把文化划分为中西，正如划分为秦楚等，只是描述文化的角度之一。国以下还有省、县、乡、村、家乃至个人，而共时性之外还有历时性的切割角度。故中西文化的不同点之外还有共同点，这源于中西人种都有一个头、两只眼、

两条腿等等……文化还能“不同”到哪里去？难道中国人吃饭，美国人就吃泥吗？中国人讨老婆，法国人都克隆吗？文化差异等等问题，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里来谈，才是有意义的。

文化的共同点，当然会构成共同的价值标准，故屈原不光承担楚文化价值，也承担着楚文化以外各种文化的共同价值，于是才有人类“共鸣”说云云。后人和外人敬仰之，不一定要对楚文化发烧，更不是也要泪流满面地效忠楚王。而一切丑类，不管他们是希特勒还是汪精卫，不管他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不同，都在人类文明的共同尺度之下显示出彼此相似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文化的叛徒，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所贩卖的文化有多么可惜，而在于他们违反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比如他们的势利等等。

所谓文化霸权，问题也并不在于他们的文化应不应该霸起来，也是在于他们违反了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比如表现于他们的骄横和无知等等。这就像一个人杀的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这并不是问题的要紧之处，问题是杀人应不应该被接受。

所谓“文化冲突”说，常常是表面上的热闹，更深的层次，是人们要利用这种热闹干什么？生活中，国粹派常常在眼红着轿车和美元，而西化派则常常在弱者那里三宫六院。再说嫖娼是哪一国的文化？贪污和暴力

是哪一国或哪一个时代的文化？……人都活在文化杂交状态里，没有什么从一不二的纯粹，也就很难有什么文化的代表权。故“文化版图”以及列阵相攻式的“文化冲突”，也只是在非常特定的范围里才有效的。

每一种文化从来就不“纯”，欧洲文化中的基督教就是从欧洲之外来的，其数学最初是从阿拉伯世界来的。这与中国文化夹“番”带“洋”的情况相仿。各种文化从来都是大魔方，都互为资源，互为条件。资源多样性好不好呢？当然好。会不会有些资源要丧失呢？那也是一定的。这就像世界上总会有人要死的。有人说：让中国文化死了算了。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你说的秦国灭了不就灭了么？很多东西失传了又怎么样？我们一般来说并不赞成对民族文化的守成态度，不想号召大家都当博物馆长。问题是，文化没有凭空的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总是需要利用一切有益的资源，为何独独要排斥中国这一份资源？一个人对身边的资源没有兴趣，那么他对遥远地域的文化兴致勃勃就那么真实？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凡是对西语、西学不大通的人，甚至是也没有去过西方的人，才较为容易说这种文化大换血的大话。有一个最为主张全盘西化的青年朋友，到欧洲某国呆了两个月，后来碰到我，大为失望地说：欧洲怎么这么不现代化呢？在我看来，这位青年的西方观才是最为“中国”的，只是他对自己无形的小

辫子不自觉罢了。

再颂

顺适

老韩

## “兽性”浮现的条件

××：你好！

你说兽性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浮出水面，这虽然是普遍主义的老说辞，却还是简明易懂的方便。一个以公利为目标的社会，兽性常常会表现为理想的虚伪和专制；一个以私利为目标的社会，兽性则常常会表现为现实的贪婪和冷漠。形式不一，但实质无二。也许兽性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兽性不绝，故天国遥遥。

兽性得以“浮现”，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需要具体分说。天主教是公利组织，初始之时善面可亲，一旦执掌政权则生大恶，出现十字军、宗教法庭等等暴行，待政教分离之后，又成了今天民间互助互慰团体。故权力体制最为值得警惕，一旦缺少民主制约，权力便常常会诱发和扩张兽性。不赘。祝  
安好

少功

## “反专制”的一词多义

× ×：你好！

上次出访，见了新加坡的富和印度的穷，于是有自由主义的朋友便面对印度自我感觉良好，坚决认为宁要专制而不要印度的民主。这真是个讽刺，资本主义可以随时向专制致敬。其实这是十分普遍的事实：有些老板仇恨中国的“专制”，可他们揣着外国护照就是不去那些不“专制”的国家做买卖。有些外商也在指责中国“专制”，但西方资本家向“民主”的俄罗斯和“民主”的印度投了多少资？向“专制”的中国又投了多少资？对这些现象，不用多想也能知道其中奥妙的。

自由主义以“反专制”为立身之本，这当然没有错，其人权与宪政思想为文明重要遗产。在中国当下语境里谈“反专制”，对专制的新形态和新特点却不应佯装不知。眼下很多局长不容易见到市长，倒是有些老板可以分分钟见到市长。往好里说，这是官员重视经济招商引资；往坏里说，腐败就在这种现象后面形成。中国眼下的专制以“傍大款”、特别是勾结跨国资本为主要特征。

“反专制”似乎至少还有下面几个问题：

一，“反专制”不意味着以“市场”反“国家”，

因为成熟的市场不是以虚弱的国家而是以强健的国家为条件。没有合理的国家调控和国家监管，市场只可能混乱和崩溃。强制银行实行存款实名制，强制各地撤销地方壁垒，强制各地遏制泡沫经济和过分投机，包括香港政府入市击退“炒家”等等，这些都是国家保护和促进市场的例证。可惜很多自由主义者总是笼统地把“国家”当作“专制”来反对，过分渲染“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他们要求什么样的“市场”岂不耐人寻味？

二，“反专制”以扩大民主参与和提高政府效能为目的，因此必须以社会大体上的共富为基础，必须防止贫富过分地两极分化。民主是要成本的，支付不了这种成本的贫困化阶层毫无民主可言，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因此关注失业问题，关注西部开发和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对民主的促进，而不是坏了“反专制”的好事。相形之下，有些人士把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以“进步必要代价”一笔勾销，对民主的向往中越来越多等级制气味，他们要求什么样的“民主”同样耐人寻味。

三，中国是一个大国，改制分权从来有更大的成本和风险，本世纪前期的军阀割据，还有历史上的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中央集权削弱之后几次大乱，应为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防范。体制散化的大乱，不仅会葬

送市场经济，而且往往会以小专制代替大专制，徒剩“民主”的哗众招牌。因此任何自由民主的呼吁和宣言，都须落实为具体可行的方案，使改革既能保障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民主参与，又能防分裂，防内乱，避免历史覆辙。但愿自由主义的朋友们不会把这事又当作无足挂齿的“保守”。

再谈。

老韩

### 发展主义的共同逻辑

××：你好！

没有收到你的第一个邮件，大概也是谈 A 的文章吧。A 文有他的倾向性，这恐怕也很正常，正如萧功秦、任剑涛、何清涟等文章一样，并不能由编辑代庖。但苏联东欧改革不是没有教训的，在没有更好的文章详细介绍之前，由他谈自己的亲历和感受，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可有抛砖之效。我看他的文章前面部分，也生出一些怀疑，但看到后来，他对前东欧也是有批评的，对当时反民主的表现也是否定的，便觉得他还不失大体。至于有些看法与所谓官方接轨，这不是文章的罪过。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否定文革，热情歌颂市场化道路和全球化方向，甚至达赖先生也坚决反台独，这些不

都是所谓官方口径或者接近所谓官方口径么？我看那也不是什么罪过，不必在乎人家怎么说。

A文所提出的问题有意思，只是没有谈得更深入，比如没有进一步分析“比富裕”这后面的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逻辑，曾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家共享，这个大前提很值得清算。站在这个大前提下，当然匈牙利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是有成绩的，中国也可以在印度面前牛皮一把，何以印度不危而中国危？同样是站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匈牙利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很没面子的，匈牙利虽然小康，曾让八十年代的中国羡慕至极，但在美国的发达面前仍是民怨沸腾。这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两个角度的不同比较，都有一定的真实性。若把大前提说清楚了，“自相矛盾”就不矛盾了。至于说匈牙利当时外债太多，因此是泡沫经济，不能说是经济成果，那倒不足为据，因为如此追究的话，很大程度上靠殖民而发家的西方经济是否也属泡沫？西方的经济优势是否也属虚构？要谈，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有两个层面，一是发展模式方面：在这一方面，当前有些批评已经过于意识形态化了，妖魔化了，即过于低估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包括过于低估这种成果对资本主义形成的改革压力，即对资本主义的间接促进。同时这种批评也抹煞了社会主义的遗

产，包括社会保护、国家计划调控、社会精神动员等等，对于今天大量后发展国家的意义。这是某些右派的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对发展理念本身的反思方面：在这一方面，批评还很不够，还很少有人清算社会主义是曾经怎样承袭了其对手的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逻辑，社会主义出现过的弊端，如侵害政治人权及私产权、剥夺农民、官僚体制等等，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得到合法化的辩护，所谓进步有代价，强国必须牺牲个人，这些在发展至上的方向下都顺理成章。这是某些左派的问题。因为很多左派在批评右派的时候，其实站在右派的逻辑上，比如还是“比发展”，A文一开始就给人这个印象。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正如有些学者专拿中国和印度来比而已。尽管这种比较并非欺诳，但中国比印度有较高的GDP，就证明文革或大跃进是功勋而不是错误么？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多强国，所以常恶于外，多以侵害弱小民族为发展的“代价”；社会主义曾经多弱国，所以常常恶于内，多以侵害弱小阶级为“代价”。孟子曰：杀人以梃以刃有异乎？无异也。杀人以社会主义或以资本主义有异乎，同样无异也。这是我们必须警惕任何主义下的“代价”论的理由。改革和发展当然是有代价的，但代价有度，也不能光由弱势阶层去承受。今天，有人说失业是代价，腐败是代价，环境恶化是代价，“三陪”是代价，劳工待遇恶劣也是代价……似乎

这些都不值一谈，“代价论”又很时髦了。以这种思潮来否定社会主义，其实是复活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最糟糕的东西，是在另一种政治尺度上复活了林彪的说辞：“文化革命成就最大最大，代价最小最小。”

回到正题，我以为 A 文触及到这些问题，对纠正第一个层面的谬误有意义，但在第二个层面上，作者似乎还没有理得很清楚，于是会给人“自相矛盾”的印象。怎么办？你能不能就此写一篇文章以作回应？写不长，写成简短的“读者来书”也可。

顺颂

编安

少功

### 多重意义被单向理解

× × :

文章读了，觉得这篇文章很及时也很有份量，对这些年的思想梳理准确而透辟，尤其对市场化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其思想反应描述得有说服力，给人印象深刻，对回头认识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如还想再打磨一下，我的印象式零乱随想便随手写来，仅供参考：

“八九风波”的国际条件不可完全不提，苏联戈氏“新思维”当时已有影响，亚洲韩国、台湾、菲律宾的民主化运动更激发国人想象，尤其是菲和平政变几成中国全民上街的成功示范，阿基诺夫人几成民主女神。这一切都被西方赋予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使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一开始就难有理论的自觉。如八九年北京市民要“稳定物价”，上海学生要“还我海南（洋浦）”，这其实都是逆市场化的典型口号，居然后来在很多文本中被描述为对“市场化”的呼唤，对“私有化”的呼唤，后人更莫知其详，莫知其真。这种简化和扭曲当然是为了服从意识形态新神话的塑造。

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相对成功，其实也是多重意义被单向理解。“均分地权”虽然是对国家集权主义的放弃，却是中国上千年传统“小农社会主义”的恢复，是孙中山、毛泽东都想过或者干过的事情，不是什么“私有化”的改革。恢复和发育市场当然也是当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抑兼并”的市场和“倡兼并”的市场大不一样，后来居然被人混为一谈。直到今天，中国农村仍以土地所有权不可买卖的政策承担了社会保障，避免农民在兼并之下沦为赤贫流民。中国除少数城郊和沿路地域以外，大多农民也还是自足或半自足的自然小农经济，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作为“市场经济”都还很不够格，更遑论“资本主义”。

总之，当时“包”字引进城，后来被单向性理解和宣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引进城，这是八十年代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误导。

另外，据我所知，九十年代初期的“后现代批评”内部并不统一，解构现代性大叙事并由此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是一部分人；而专门解构革命大叙事进而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是另一部分人，似乎应予以区别。所谓提倡“人文精神”者内部也是不统一的，有一部分当时对市场化持乐观主义态度，另一部分则对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美国式的全球化表示怀疑和拒斥，同样是名同而实异。作出这些区别并非要搞什么排名划线，而是剖示这些内部分歧有利于总结九十年代的思想史及中国重要的特点之一：在西方理论学术单向输入之下，不同思潮常常是对某个西学概念（如后现代或人文精神）的不同解读，对现实的把握总是长期处于“无名化”和“西名化”状况。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西方有些人对这种发展中国的思想情况并不太理解，因此常常从一些表面概念来说长论短，容易把中国的思想状况简单化。

最后，民族主义讨论的复杂性还可进一步勾勒。有些人以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而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以强国自由主义反对洋奴自由主义，比如他们公开宣称“对美国的体制极为欣赏”但又坚决反对美国

霸权，实际上是“你霸权我也就要搞霸权”的逻辑，这更接近中国较为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我以为，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互为表里，两种思潮实为一家。这一点不大为人注意。这是我的印象。

似乎还想到过什么，一时记不起来了。想起来再说吧。

祝好

少功

### 个人主义是否珍视所有个人？

××：你好！

大肃反、文化革命、波尔布特之所以险恶，是以国家或阶级强大为理由，视牺牲众多个人为必要“代价”。自由社会如要少一些险恶，就不可接过对手的逻辑，视严重的失业、失学、失身乃至屠杀落后“土著”等等均为愚劣的活该。那不是普适的个人主义，而只是牺牲众多“个人”的主义，即少数人的个人主义，离波尔布特的残酷并不太远。区别仅仅在于，左派罪恶有道德包装，不如右派罪恶来得直露坦白。但揭破这种包装并不等于要肯定包装下的真货，不能说假公济私的权势者是打着错误的旗号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需要提防的一个荒唐陷阱。

在另一方面，右派也有道德包装，比如把仅仅有利于少数人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多数人乃至全民的个人主义。H先生在指责革命时激动地说：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这很对。问题是为何很多个人被资本扩张进程抛进饥寒、屈辱、疾病、绝望乃至伤亡之时，这些个人就不宝贵了？就变成了“落后了就该挨打”的垃圾？就被H先生们视而不见了？这是什么样的“个人主义”？很显然，如果提倡这种冷血逻辑，就会为斯大林主义提供隐形辩护，就可能抹去中国“两弹一星”后面的冤狱和贫困。因为你玩得“代价”，我也就玩得“代价”。资本扩张牺牲部分个人如果是合理的，那么革命斗争牺牲部分个人也就无可指责了。很多自由主义者就是在这一点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最好的革命接班人。

有一位教授在我面前大骂共产党。我问他：你说共产党最大的毛病在哪里？他想了想说：共产党自私。我接着问：你们自由主义不就是提倡自私吗？这一问真把他给问着了，问得他半天没再说话。这就是中国有些自由主义者的邪乎之处，逻辑混乱之处。其实，“公正”、“平等”不光是社会主义的口号，也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不知为何在当前的有些中国知识者那里竟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恶。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公正”、“平等”因妨碍自私而十分可恶，那么集权和专制实现着统治者们的自私又何罪乎？我们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不是

因为那些罪错有违“公正”、“平等”，难道是因为那些罪错太“公正”和太“平等”么？

之所以说到这点，就是觉得理论只要一虚浮嚣张，就会过头，而过头的“左”和“右”其实殊途同归，自己不觉而已。道不远人，以常理常心待之，各种“代价”虽确有不可免的理由，但须有人道的限度。有时不禁想起曾国藩都说过的话：带兵不可轻易杀人，万不得已要杀人之时，也须有悲悯之心，不可杀得洋洋得意。

读眼下一些红色或白色的洋洋得意之论，我常怀疑自己是否待人太苛，总提醒自己多容纳其他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容纳毕竟是容纳，容纳无法等同喜好和崇尚。再谈。颂

夏安

老韩

### 疑“人性即私、人性即恶”

××：你好！

Y文以为“人性”不可违，人性从来不认“平等”，因此谈“社会公正”纯属过时的矫情和作态。这倒使我觉得这些朋友是十分纸上谈兵的迂腐。以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身边那些贪赃营私、卖身投靠、仗势欺

人、弄虚作假者并非人性标兵，这些性恶不公者恰恰是有违人性。难道 Y 先生以为中国人都小人化了就回归人性了？改革就成功而大家就幸福了？这里不用学术，单凭直觉就是可以得出结论的。

人性并非恶，即使最粗糙最笼统地说，恐怕只是半善半恶。所谓人性即恶，人性即私，这种意识形态是很久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某种文化建构的结果，并非什么出于本能的常识。我家的狗在利己之外都有利他的本能，见我睡着了就决不叫唤，它都直觉到利他也是利己的必要条件，维护主人是它能得到肉骨头的条件。在这条狗的本能的层面，都有私欲与公欲的低水平平衡。古今中外的社会道德理论其实很世俗也很简单，极端地说，不过是我家这条三毛的为狗之道。至于道德被神圣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强调社会公正并不是要求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舍己为公。在一般条件下，“公”只是“私”的理性放大和理性延伸，“公”是对大多数人之“私”的必要保护和有效实现。这难道是这些朋友百思不解的什么难题？人皆难免私心，以前的革命道德家们把社会改造建立在人性无私的基石上，当然会大栽跟头。但若说人性无公，世界上只有“丛林原则”，于是剥削有理压迫也有理，那同样会大栽跟头，包括强胜者的“私”也是保不住的。事实上，常人都有非私非恶的本性，亦即人们常说

的“人性”，只有 Y 先生这样的人为意识形态所障，才偏偏看不到这一点。人们性交都要讲个双方愉悦，都不能一心利己的。居家过日子也是全家安乐自己才可高兴，更是不能一心利己的。社会多数人都赤贫了，你以为几个富人就有好日子过？光是市面萧条和犯罪剧增这两条就会让大款们喊天。在这里，“社会公正”首先是弱败者的要求但最终也是强胜者的利益所在。

海德格尔讲“存在就是共在”，哈耶克反对“原子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崇拜者们似乎从来读不懂这些话。他们总是恶视“社会公正”，将其当作绝对平均主义或者道德圣贤运动，这是一种妖化策略，以便把大众吓退。其实 Y 先生这种人是最不应跟着起哄的，正如 Z 也总是在办公室盛赞资本主义，我听了只是暗笑。如果真听从他的教导，我就先得把他给开了，请他这位初中生回家去拿救济金度日。人们难免常是这样：好事总往自己身上想，其实尚恶尚私也得要有点本钱吧，轮到希特勒或者比尔·盖茨来尚还差不多，哪轮得上 Y 先生或 Z 先生呢？一笑。

颂

时绥

少功

## 关于“忏悔”

× ×：你好！

文章写得不错，《天涯》也可以发表。有一天开会时我说，要说主义，第一条就是要反对简单化主义。你这篇的优点就是打破“忏悔”问题上的简单化，一层层剖开来说，破除无知妄言。

志扬说道德与政治应分开，应该是对的，虽然我不知他的具体所指。康德称道德是自我律令，只对动机负责，而法律才追究行为及其后果（大义如此）。如果接受他这一分析，那么做坏事的和没做坏事的、甚至一天到晚做“好事”的人都可能应该有道德忏悔，因为他们都可能出于恶心，比如天天挂着红绶带扫大街者，天天要求他人对文革错失忏悔者，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恰恰是最需要忏悔的人。反过来说，做过一些坏事的，并不一定都有忏悔义务，如医疗失误，战场拼杀，两害相权时取轻避重等等，事后可以有技术的检讨，可以有对受害者的同情甚至道歉，却不需要忏悔——尽管这些行为及其后果孤立起来看时完全无异于行凶作恶，正如外科医生很像一个刽子手。X与Y的指责只适用于那些既有恶心又有恶行及恶果的部分事例，而这远不是生活的全部。

以上是从道德层面来谈。至于政治方面，政治思想与政治暴力是有区别的，政治暴力和政治罪错也是有区别的。政治思想应该自由，鼓吹政治暴力（革命、政变、镇乱、阶级斗争、跨国干涉和占领等等）的主义很难说应该统统禁绝，连法西斯主义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有思想和言论空间，这是因为思想不可能有无菌保险箱，思想只有在比较和冲突中才能得到正常发育。而思想自由并不意味着行为自由。一种思想变成一种行为，甚至变成一种有害的行为，有赖各种复杂的条件，并没有因果上的必然。这便是一般基督徒不必对十字军战祸负责的理由，是海克尔的优生说不必对希特勒虐犹运动负责的理由。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正常冲突应以人道为限度，即不能在自卫目的之外对敌人给予人身伤害和基本生活条件及人格尊严的剥夺。我现在只能下这样一个定义，还想不出更好的说法。你在文中说到的国家暴行，就是因为超出了这一限度而构成罪恶；而中国在革命时代一般的政治批判，保留工资的下放劳动，给出路的“公私合营”等等，可以检讨其中是否有错误，但这些都至少不构成罪恶，这与希特勒的奥斯维辛是大有区别的。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实践中都有过血流成河的纪录，但犯罪的具体责任不能简单地算在这些主义的一切奉行者和思想家的头上。政治思想、政治暴力、政治罪错这三者在有的情况下很难区

分，但还是有必要尽可能区分。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样，把政治和道德忏悔强扭在一起谈至少就有以下几种复杂的情况：一，应该忏悔的政治罪错；二，不必忏悔的政治罪错；三，应该忏悔的政治无罪错；四，不必忏悔的政治无罪错。其实复杂的情况还可能更多。上述第二点也许较难被人们理解，但你在文章中已有提及并有高见。我以为这种情况特别多见于以暴易暴、以眼还眼的冲突中，特别多见于从正义动机出发到灾难后果的复杂行为过程中。正如你文中所说，当年有一些群众造反是借“文革”的名义惩罚党内的腐败或官僚主义，虽然有行为不当或认识错误，但情有可原，并不承担“忏悔”的义务。恰恰相反，在这种冲突中的一些受冲击者，事后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在恢复权力后并不实行政治报复，并不要求冲击过他们的人一一悔罪，这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历史上这种复杂的情况更多而那种善恶分明的“义”战其实并不太多。这是一些道德家们在书本里进行学术推算之外的真实，至少是一部分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应讨论政治的对与错，而不是道德的善与恶。强说道德无异于拿眼药水来治痔疮。

说这些，当然不意味着道德多余，不意味着文革灾难不需要人们用忏悔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然而正如

《礼记》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强求他人忏悔的高调训导不仅效果很差，而且其动机难免让人生疑。

随便杂谈，聊供参考。颂

撰安

老韩

（以上信函写于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〇年，收信者有南帆、李锐、单正平、韩毓海、张浩文、汪晖等。此次发表时为使读者对信函内容的来龙去脉略有了解，作者在保持原信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对信函文字稍有调整和充实。特此说明。）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新闻特写

东岳文库  
在  
小  
说  
的  
后  
台

## 亚洲金融风暴观察<sup>①</sup>

送走了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布莱尔首相一行人离港，又刚刚送走了中国党政领导者江泽民和李鹏等一行人先后返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虽然还有一大批客人需要会见，还有港岛、九龙、新界各地各界的市民庆祝活动需要特首“跑场”式光临，但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这已经是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二日清晨。电视台滚动式“七十二小时脑震荡”一类的回归专题节目还轰轰烈烈，电视记者们满脸倦容却不能离岗，啃着三明治，或者见缝插针地靠在哪个角落睡上片刻。早上的报纸天亮之前已经送到了各个报摊上，从香港到北京的报纸仍然在铆足劲报导香港易帜盛事。连香港天气也被一些人拿来做起了文章。近日来的香港一直大雨，于是有的香

---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原署名为“范闻彰”。

港报纸称“苍天泪雨”是为彭定康的黯然离去而垂哀，更多的报纸则吹嘘这场大雨与“江泽民”的姓名中的含水量大有关系。据易经解释，水，主财也。这场罕见的大雨是中央给香港送财喜来啦。深谙市民读者心理的香港某些传媒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耸人听闻的话题。

是的，香港回归充满着旺财的气象，连反对回归的人私下里也大多承认这一点。股市近来一直大跃进，“中国概念”红筹股炒涨得晕了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个半月以前刚刚及时地把香港由“发展中”地区正式提升为“先进经济体系”之一，与世界七大工业国平起平坐。香港就是在这一片大吉大利的好光景中回到中国的。比起这件大事来说，拳王泰森为咬对手的耳朵而道歉，柬埔寨洪森与拉那烈两位首相之间已经剑拔弩张，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朝鲜同意参加四方会谈……当然都不在很多人七月一日的视野之内。事实上，两天来的喜事大操大办，已经把人们累垮了，大多都像董建华一样哈欠连天要睡上一觉了。

谁会关注这一天清晨的曼谷？

当地时间上午，“泰国政府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启动亚洲乃至全球性金融风暴的最初一声惊雷，已经在股市和汇市形成了核爆。但这一消息在中国直到三天后的《参考消息》才在不重要版面的一个角落稍稍提上一笔，中国内地传媒上迟到的警觉神情则是十多天

以后的事情。连经济嗅觉最为灵敏的香港人，一开始也大多没有把这太当回事。尽管行政构架没有任何改变，但七月二日还是庆典休息日，公务员们都放了羊。到第二天公务员们上班的时候，他们或是因大雨原因没法正常上班，即算上班也忙着更换徽号、招牌一类事情，没有什么人在谈论曼谷的动静。穿着红色套装的布政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曹荫权随着董建华来到特区政府总部时，有记者问他们第一件公务是什么，董建华在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下回答：“我们要研究住房问题。”看来最新金融事态还没有列入他们的议程。

泰国铢的痛苦呻吟，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似乎显得过于遥远。

### 炒家扑杀泰铢

七月二日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华尔街却有另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因为时差的关系，泰国铢在汇率实行浮动的当天就一天下滑百分之二十的消息传到西半球时都在夜晚，但量子基金会一些投资顾问、分析专家以及经理们都在电脑屏前几乎彻夜未眠。他们悄悄实施了大半年的“猎鹿”之战眼下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对手已经崩溃，战果正在迅速扩大，每一分钟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哗啦啦落入他们的账号。

这群胜利者的领袖之一，就是后来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悲愤指责的国际著名炒家索罗斯。索罗斯原籍匈牙利，犹太人，一九五七年暴动之后逃往西方时还不名一文，但他凭着胆大心细眼明手快迅速在金融界崛起，攻击过英镑和其他西方货币都频频得手。他创立过“开放社会基金会”，主要向前苏联、东欧、中国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项目慷慨捐资，也做一些慈善事业，故有人把他说成是魔鬼和天才相结合式的人物。但有人也怀疑他的“开放”援资后面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和价值观背景，甚至谣传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与他的文化渗透和金融操纵有很大关系。中国一些官方和民间机构也曾经与他有过合作项目，很多留学计划用过他的钱，所以很多人对他并不感到陌生。这种合作关系直到一九八九年以后才骤然中止。

索罗斯的首席高参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应该说猎杀泰铢的战略完全是德氏的大手笔。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位密友就曾经在闲谈中向德氏忠告：“泰铢快完蛋了，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德氏的高度注意。因为这句话与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亚洲经济的神话》一文中的结论不谋而合：亚洲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以及劳动价格低廉，而不是依靠提高生产率，这种经济增长的极限很快就会到来。德氏立即暗中要求手下人详细

收集有关亚洲的一切资料。他兴奋地发现，在泰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繁荣”后面，在很多西方媒体正在把泰国称为“东亚第五虎”的一片赞扬声后面，泰国的一些数据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未收回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很短时间内已经从百分之六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五，而所欠外债一千零六十亿元已经超过了外汇储备近两倍，经常项目的收支赤字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泰国的投资结构也正在从以实业为主迅速偏向物业投机、股市、汇市，消费者中也出现了购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的热潮，亚洲人大手大脚的气派让西方人瞠目结舌。一位从曼谷回来的经理也摩拳擦掌地断言：“典型的泡沫经济！泰国不再是一只亚洲虎，完全是一只病鹿！”

另一位炒家事后还曾得意洋洋地宣称：“我们就像在山岭上俯瞰着鹿群的豺狼，泰国简直让我们难以自制。”这种冲动卑鄙吗？他说：“不，我们猎杀了鹿群中的病弱分子，维持了鹿群的健康。”

扑杀泰铢，在华尔街已不仅仅是德鲁肯米勒一个人的计划。

凭着净资产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實力，看准了泰国政府把泰铢贬值以求泥潭脱身的必然趋势，量子基金会及其盟友事不宜迟地发动了攻击。朱利安·罗伯逊等大炒家都全力调动资金包抄上去。他们大量买入预期泰铢汇

率下跌的泰铢/美元期货合同，静静等待着五彩泡沫爆炸的那一刻。他们稍觉意外的是，由于期权合同的需求陡增，泰国银行觉得有利可图，居然也加入了发出类似合同的行列，这无异于充当“泰奸”，把自己的资金更多地喂入狼口，把袭击泰铢的武器主动送到投机者手上。结果，到五月份，八至九成的远期合同都落到炒家们手上，泰国银行发现大事不妙才突然停止了合同的发出。

但绞索已经套在脖子上，越抽越紧了。五月的泰国汇市上显然是来自一些大庄家的泰铢抛售汹涌而来势不可挡，政府为了保卫泰铢立即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等近邻求助，短短几天内就耗资一百多亿美元来吸纳泰铢，花去了全部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在内阁指示之下，大难临头的政府官员还威逼加利诱，要求银行透露远期泰铢合同持有者的名单，想对炒家们逐一“战略性施压”。内政部还实行类似新闻管制的临时政策，阻止媒体发表一切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和言论。炒家们却不示弱，反过来利用政府这些干预措施，使之成为印证和强化人们恐慌心理的根据，把“危机预期”的流言越烧越旺。美国一些银行在泰国大登广告，招揽汇款到外国的生意，向虚弱的泰国政府叫板。进口商忙于及早结账，出口商则不敢让货款回国，都是防止泰铢贬值。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资金的外流，算是给摇摇欲坠

的泰铢再推了一把。

黑色的七月二日终于来到：政府被迫放弃了保护币值的努力，终于在城头挂起了告败的白旗。政府选择这一天，无非是好让大小公司可以把亏损拨入下半年的账目。

汇股两市皆应声大跌，一溃千里。泰民们眼看着手里的存款迅速失重，疯了一样地抢购黄金。银行门前挤兑人潮汹涌，十六家呆账累累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几乎让客户们绝望，并马上引发了政治抗议风潮。出租车司机们说，他们的客源一下就减少了六成。宾馆饭店里转眼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营业额减少七成。成千上万的工厂因为得不到货款或者货品积压而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各个公司纷纷裁员和减薪，在泰铢大贬值的情况下泰国从业者还平均降薪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很多按揭购买住房的青年职员由于无法按时支付房款，房子被银行收回，一下子从天天上馆子的好日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惨境，在车站或公园露宿。人们把私家车、便携电话、首饰等值钱的东西纷纷送往典当行，典当行业在大萧条的时候倒是一枝独秀。当然，算得上兴旺的也许还得加上心理咨询业，当地报纸连连报导破产者自杀的消息，还说求助心理医生的病人在黑色七月以后增加了四倍之多！

七月十日，在曼谷的外国银行联合宣布，在泰国获

得二百亿美元援助以确保资产折现能力之前，外国银行将冻结对泰国的贷款。

泰国被抛弃了，昔日那些满脸微笑轰涌而来的投资者不再愿意向这个泥潭投入半个铜板。在这个泥潭里挣扎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在大出血，看着自己的钱流入了金融杀手们的私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杀手们到底斩获了多少，有人说索罗斯收入了二十个亿，有人说他收入了三十个亿。

政府在苦苦挣扎。七月三日，泰国银行向澳大利亚央行求助，希望能得到应付货币浮动的技术指导。七月十日，泰国财长和外长宣布出访日本，谋求一揽子援助泰国的紧急贷款。在这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专家组飞抵曼谷，几天之后又决定加派一个工作组，与泰国政府共商解危之计。事实证明，泰国政府和大部分国际救援人士对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开始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最开始商定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援助基金额远远不够（不久泰方要求增加五十亿并延缓二十五亿的债务），到九月份贬值近百分之三十也远远不是泰铢危机的谷底。十月二十二日的统计显示，九月以后的泰铢在继续下滑，直至贬值百分之五十点二一。这就意味着，以美元结算的泰国所有的外债已经全都翻了一倍，以美元折算的国民财富的一半顷刻之间已经化为乌有。

泰国还要跌滑到哪里去？

## 东南亚处处冒烟

九月二十五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在香港结束，这次会议议题之一当然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第一次迎来世界性盛会，主人招待得周到备至。港九一片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万民赌马和粤式茶点的千奇百怪让外国记者和与会者们惊叹不已。前不久受泰国事态影响而出现的短时间港元抛风已经迅速平息，政府宣称炒家们已经损手烂脚，仓皇逃窜。这大概也给与会者染上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对东南亚的事态轻描淡写：“泰国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则对法国《回声报》记者宣布：“东南亚危机和泰国金融危机已经结束。”

这些说法如果不是为了稳定民心的策略性放风，那就说得似乎太早了一点。

马来西亚：政府在七月二日以后本来决心顶住泰铢跌风的进逼，全力干预汇市以支持林吉特。首相马哈蒂尔的强硬个性甚至使索罗斯都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的助手事后向报界透露，他们春天里还把牌押在林吉特的贬值上，到七月中预测马哈蒂尔可能挺得过这一关，便

临时转为买入林吉特的投机，后来竟为此付出了数亿美元的代价。因为马来西亚事实上没有能够挺过这一关。“林吉特永远坚如磐石”的誓言只有十几天就被迫正式放弃。汇市一松即溃，到十月一日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五，到十月二十二日贬值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四二。股市的跌幅则达百分之四十。马哈蒂尔怒气冲冲地指责索罗斯：“那个魔鬼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整整后退了十年！”十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不就是整整一次中国式的文革吗？

菲律宾：比索的陷落比林吉特还要快，政府于七月十一日就被迫放弃对比索比价的控制，任其波动，结果几个小时之内就贬值近百分之七。作为一个英语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长期驻扎过美军的国家，菲律宾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中算是与西方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七月十八日便及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十亿美元紧急贷款的许诺，使市场信心稍有支撑，但八月的比价还是调头向下，至十月一日比索已经贬值百分之二十五，至十月二十二日已经贬值百分之三十一.五五，股市跌幅则达百分之三十九。

印度尼西亚：数月来的森林大火使烟雾飘洋过海殃及邻国，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戴着口罩怨声载道。现在天灾之后再加人祸，金融市场的乌云从西北方向压了过来。军人出身的苏哈托总统顾不上自由派经济人士

的讥讽和指责，不惜采用国家行政干预手段，中央银行于八月三十一日宣布限制海外人士外汇期货交易，强迫投机活动降温，使印尼盾坚挺了数日。但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拆借利率让各公司和资金紧缺的中小银行全都无法承受，拆东墙补西墙终究只能使跌势向后推延一段时间。九月十四日，政府在强大抛压之下弹尽粮绝，同样也被迫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努力。至十月一日，印尼盾贬值近百分之二十八，至十月二十二日进一步贬到百分之五十点零五，成了另一个泰国。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用总统苏哈托在世行年会上的话来说，“全国民众数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新加坡：依凭强大的产业技术业绩和充裕的外汇储备，总理吴作栋脸上始终有处乱不惊的平和、静观事态的持重，但金融震波仍使这个国家人心浮动，老百姓的蚂蚁雄兵终使国家无法阻挡。至十月一日，新加坡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百分之六，至十月二十二日，则下跌到百分之十三点三七，股市同时下挫百分之二十二。然而这在整个东南亚来说只能算是轻伤员了。轻伤不下火线，政府硬撑着参加向印尼及其他邻国的援助融资，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赞扬。

缅甸、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未能幸免于难，其中七月十四日的缅元汇率已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此后便一直没有翻过身来。越南盾到十月十四日也贬值近百

分之五。

……

眼看着受灾面积越来越大，世界金融组织首脑们的口气一变再变，除了谈一谈经验教训之类，救灾措施的出台越来越慎了。援泰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既然已经说出，只好想办法凑吧，面对接下来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式的村村起火处处冒烟，谁还敢轻言援助？何况对援助心存戒意的也大有人在，马哈蒂尔就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款条件太苛刻，改善金融管理和经济结构的要求，隐含着西方资本进一步向这些受援国打开市场和控制市场的不良企图。在泰国、印尼纷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条件的同时，他执意自力更生突出重围将抗战进行到底。七月和八月间，他一连会见了三十多位国际基金会总裁，耐心解说国内实际上大有希望的经济形势，劝说他们放眼将来，出资托市。他的和颜悦色至情至理给客人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还得看一看，就眼下来说，出资的条件还不成熟。巨商们职业性的势利和无情袖手无疑深深地刺伤了这位首相，逼得他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政治。八月三十日纪念国家独立四十周年的庆典上，他头戴穆斯林帽鼓动爱国主义激情的“政治救市”行动获得了高峰体现。他痛斥那些“忘恩负义”的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在这里从事什么实业，却掠夺了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整整一千六百多亿

美元，号召国民们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艰苦奋斗，避免马来西亚的命运被别人主宰，抗击魔鬼的政治勒索和敲诈，抗击比老帝国主义还要阴险和凶恶的“新帝国主义”。他甚至在会见报界时宣称，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他怀疑索罗斯这个犹太人有一整套搞垮马来西亚的阴谋计划（政府发言人后来澄清他并未指责所有的犹太人）。

一连数日，吉隆坡出现了各界社团组织的游行，人们高唱国歌，支持马哈蒂尔，向“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宣战，买国币、买国股、买国货成了很多演说的主题和宣传口号，一位女艺人宣布用她的全部美金来入市，顿时成了万民欢呼的英雄。连黑帮组织也“爱国”起来，到处扬言要派人去给索罗斯和罗伯逊那些炒家“放血”。

这种“抓革命促生产”式的激情能够给经济帮上多大的忙呢？不少外界人士存有怀疑。尤其是马哈蒂尔作为东道主在十一月三日召开的十五国集团会议上竭力促成的《货币交易条例（草案）》，要求国际社会对汇市投机给予限制，更受到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讥评。与马氏民族政治/市场限制的思路恰恰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认为危机的根源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得还不够。他们认为只有资本市场的充分自由才会有灵活而真实的市场信号，才能使泡沫经济得到及时的诊

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化不够（金融机构透明度不够等等）恰好是东南亚泡沫久积成灾的祸根，而炒家狙击虽不够厚道，却是一剂揭露和扑杀泡沫的苦药，是一种惩罚性的粗暴纠正。索罗斯的发言人在九月二十日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也宣称：“投机活动有修正不平衡价格的作用，对经济有益。”“对此次危机更应该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猛烈扩张的政客和官僚。”“马哈蒂尔先生才是对他的国家最具有威胁性的人！”

关于自由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关于发展中的弱国能够在什么时候承受什么样的自由的问题，当然还会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这当然只是此次金融风暴带来的众多应该反思的问题之一。

## 第二震波：东亚在劫难逃

任志刚一九七〇年从香港大学经济及统计学系毕业，一九九三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今年刚刚获得世界银行颁发的“中央银行家奖”（每届限奖一人）殊荣。像董建华、曹荫权一样，他对香港经济成竹在胸，雄心勃勃。当东南亚跌风八月间第一次波及香港的时候，这位少壮派总裁八月十七日下午穿着T恤衫和牛仔褲，在中环金融中心三十号楼会见神色不宁的记者们

时就用粤语夸下海口：“莫要怕！”“我从来未惊过，我今天早上在打高尔夫。”“我最不怕大鳄，不识死的就来。”

这一把潇洒在传媒上果然让很多市民放下了一颗心。几天后，金管局官员正式宣布炒家们已经被“赶尽杀绝”。

没料到大鳄未尽未绝，时隔两个月后卷土重来，由于日本资本的大量撤退，十月二十三日市场上突然再次出现强大的港元抛压。为了维护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政府照例提息筑墙，银行间拆息率陡升百分之二百五十。根据任志刚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让投机者们抛售港元时需付出高息给他们借贷港元的银行，让他们得不偿失。但这套看家本领导致资金告紧和股市失血，恒生股指闻风大跌，四天之内就跌了三千点，穿透万点大限，后虽有回稳，但距八月最高位来说已跌了百分之三十八。国企红筹股的跌势更猛，刚上市的“中国电信”算是生不逢时，本来被股家们相当看好，结果几天之内竟跌破了发行价。有人估价股标市值转眼间损失了千多亿美元。报纸上一片惊呼：惨惨惨！血血血！“死的人多！”很多股民对任总裁咬牙切齿，把他叫做“任一招”（只有提息一招），又把他叫做任（意妄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误港庸吏：国际炒家这次明明是声东击西，首先沽空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再在汇市

上虚晃一招，你任仔让股市大跌不是正中杀手们的奸计了吗？

人们一急，还说他领着全世界银行行长中最高的年薪，自然不怕套牢；还说他前不久拿十亿美元的港人血汗去援助泰国，鬼晓得泰国还不还得起？

这些愤怒者对炒家们的分析也许不无道理，但我明敌暗，布防难度很大。再说强敌压境，很难汇股两市兼顾，只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也许比较而言，汇率主要相关实业，相关所有人，相关中长期投资；而股票主要是相关游资，相关一部分人，相关中短期投机。舍“股”而保“汇”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不管股民们怎么骂得难听，港府也只能一肩扛到底了。匆匆从欧洲赶回来的董建华一路向新闻界放话，说香港的经济基础良好，金融管理是严格而高效的，市民们尽可以相信股市前景将“放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声称不干预香港金融事务，但刚刚过去不久的回归庆典对于港人来说毕竟记忆犹新，中国一千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不说是港人重要的心理寄望所在。众多股民注意到港商大佬们突然组团访京被江泽民等领导人接见，股价回升也被疑为中国政府注资托市的结果，“社会主义救香港”的流言不胫而走，连香港的政治风向都由此产生了微妙变化。

后来，一直不认同中国政府的民主党出人意料地愿

意参加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据说就与香港股市风潮以来的民意压力不无关系。

台湾：当局一开始也是采取同香港大致相同的优先保汇战略，宣称要用八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拒货币风暴于大门之外，仅十月三日这一天就向汇市敞开供应美元十五亿多美元，比前年台湾导弹演习时保护台币而动用的储备（一天八亿美元）还要高出一大截。人们有些奇怪的是，战事刚刚展开，五十亿美元的金弹也打出去了，当局突然于十月十七日弃守台币，却宣布让有价证券和一些公共基金进入股市的“四大措施”，算是给股市大举输血，走上一条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弃“汇”而保“股”的路线。这种变化的内情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人说，“央行”总裁许远东老先生是在十月十七日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才突然作此转向的。谁来的电话？许老爷守口如瓶。为什么要急转弯？也没法说个清楚。媒体一般的猜测有两说：一是情报机关探得了大炒家声“汇”而击“股”的底牌，“央行”将计就计临时应变；二是最高层着眼于“市县长”选举前夕七百万股市散户的选票实力，再加上李登辉九月间号召大家买股票的面子要顾全，所以股市必须死托，托股就是保住国民党的选票和地位。《联合报》等媒体愤怒指责这种以政治权谋来干预金融正在导致“自乱阵脚”和“政治信任危机”。

韩国：八月以前还是亚洲不多的安全区之一，而且没有炒家侵扰的迹象。但外敌未至，内乱自生，九月二十二日起亚集团向法院申请解决四个系列企业的问题，成为今年以来韩宝、三美、大农、真露等一系列大企业倒闭之后又一次经济坍塌。大众的心理防线终于瓦解，对美元的抢购之风越刮越猛。到十一月十七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已跌破一千元心理极限。为了阻止韩元下滑，政府宣布监视美元的购买；为了挽救股市，政府宣布降低交易税和扩大外国人投资的限度。但这一切强心针还是未能重振市场。大华银行的专家十分悲观地估计，韩元在圣诞节前可能还要跌穿一千二百元大关，贬值百分之四十。股市指数则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已经创出历史最低点，第二天又继续下行而去，简直是暗夜无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一咬牙，以交出部分经济自主权为代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请求五百亿（低限为二百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当地经济评论家惊呼：起亚倒闭了，现在这种求援无异于宣布整个国家经济的倒闭，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清盘善后了。

日本：早在泰铢发生危机之初，很多西方金融专家把日本和中国看成是亚洲金融防线的最后两大堡垒，认为这两个堡垒如若一旦攻破，受害的将不光是亚洲，整个欧美的经济都会有池鱼之殃。不管世界银行也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日本都是最大的出资国。一旦自

己家淹了，还管得上邻居家漏雨？而且按照美国对东亚的出口现状来看，东亚的进口每萎缩百分之十，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要下降百分之零点二（澳大利亚手脚很快，已将今年的增长预测调低了零点二五个百分点），这还不算旅游等等方面的损失。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真是太平洋这边感冒，太平洋那边也会发烧。

日本这道最后的堡垒之一偏偏还是被攻破。应该说，日本家底雄厚，但多年来同样是“泡沫综合症”患者，七年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由于金融界与官员、黑道之间的勾结，金融秩序混乱，隐瞒的贷款呆账越积越多。有人说亚洲各地的房地产热一类泡沫中都是强大的日本资本在兴风作浪甚至充当导演，一旦在金融大溃退中被套住，老窝里不乱套才怪哩。今年七月，东京检察院发现山一证券公司向黑社会非法提供资金，搜查了该公司总部，导致经营首脑十一人辞职，总经理被捕。说这个案子怎么惊人都不会过，因为调查刚开始，该公司接待室樽古一郎就在回家途中被暗杀，公司顾问冈村勋的妻子也在家里被暗杀，可见检察院碰上了强大而凶残的对手。两声枪响之下的血流飞溅让公司的信誉扫地，十一月二十一日夜东京都中央区山一证券公司总部的大楼彻夜通明，野泽总经理在董事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宣布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公司倒闭，全场一片抽泣之声。总债务四百八十亿美元将请求政府出面处置（事

实上政府首次融资只拿出了六十四亿美元)。山一是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加上此前不久倒闭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此后不久倒闭的三洋证券和德阳城市银行等，日本金融界惊人的黑账大规模浮出水面。

十一月二十五日，山一倒闭的消息不出所料地带来汇股两市价位急挫，日元对美元比价跌到 128: 1，是五年多来的最低价，股市则单天下挫八百五十四点。美国、欧洲、拉美的股市也跟风下行，引发全球性恐慌。日本的崩市再次证明了，不管如何有钱的政府对汇率的影响能力都十分有限。据专家统计，今天工业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统统加起来也仅仅是全球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额的一半，拿几十或几百个亿去向全世界的游资抗争，也不过是挥舞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日本驻香港、台湾、韩国、中国上海等地的一些金融办事处很快奉命关闭。这一事件使刚刚陆续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准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方首脑有点猝不及防，《东京新闻》报导：各方事务一级的人员来往穿梭忙得通宵达旦，官员们都面色严峻。美国专家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敦促日本不要犯韩国和泰国在泡沫破灭后的“通病”，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和结构性改革必须刻不容缓，不可有任何犹豫，否则市场继续低迷下去，整个亚洲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混乱将不堪设想。

在温哥华召开的这次亚太经济峰会看来最是时候又

最不是时候，大多数亚洲首脑一脑门子官司，有点心神不宁，全无一年前聚会时那种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风采。尽管东道主加拿大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但整个会议的气氛明显有些抑郁和黯淡。刚上台的泰国总理川·立派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常常在某个角落形单影只。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则黑着一张脸，总是避开记者。连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国会刚刚否决了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分摊法案，锁住了钱袋子，两手空空的他似乎也有点讲不起话，有点尴尬，没有太多的事情好做，只能在会见日本桥本首相时鼓励一下日本“成功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继续在亚洲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算是在精神上打气而已。台湾愿意出资四十亿美元参加救援，但遭美国、中国政治意味明显的拒绝，也不是个滋味。作为这个组织根本目标的“经济自由化”已经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会议差一点就成了“亚洲金融专题会”。更多的首脑和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意思很明显：日本的防线既已撕开，中国还能不能固若金汤？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真的能够救香港，这一次是不是还要借社会主义的中国这道“长城”来拱卫整个世界？人们不会忘记，本世纪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还有数年前前苏联的全面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是直接的诱因，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幸免其难？让人不解的是，江泽民在第一次讲

话中对逼近国门的这一场金融风暴不置一辞，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么回事。

### 专家反思各各相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央行）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公开场所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使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金融市场翻天覆地。他很喜欢中国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朱镕基的干练、爽朗以及幽默，两位同行私交甚笃。格林斯潘曾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估计得十分悲观，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喝拉撒睡需要重量级的天才，这样的国家急刹车很可能翻车，如果不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可能也要七八年才能脱离危险期。他没有料到三年宏观调控中经济持续发展而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二，在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国家“软着陆”居然成功，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据说他访问北京之后曾私下里半开玩笑地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授给中国政府！

但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授给中国政府，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表彰他们的期权定价理论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理论革命。十月间宣布的这次授奖与亚洲金融风暴当然是巧合，但两件事情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把金融市场

风险以及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的问题突显在人们面前。

从物质生产和交换到金融证券的广泛运用，也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步抽象化；从金融证券交易到它们的预测性期权交易，大概可算是抽象之上的抽象了。两位大奖的得主对这种抽象再抽象的经济活动给出科学计算的公式，给人们习以为常的静态价值建立一种动态模型，使价值这个东西在至今被视为赌一把的天命难测的期权交易中变得有规可循，甚至税局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征税，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向保险公司投保——虚拟经济将进入每一个人的人生现实。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泰斗级的萨缪尔森在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这一独创性的工作可以预防汇率变化的风险。这项研究成果的运用将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发展，我们现在刚刚处在这一发展的开端。”

到现在为止，了解这个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人还太少，用这个公式给风云万变的金融市场建立一种明晰而准确的系统测算，也还刚刚起步。如果这个公式早诞生一年或两年，人们是否在亚洲危机之前有更好的预警和防范？

专家们对亚洲危机开出了很多各不相同的救治药方：

关于固定汇率：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尔

在美国九月八日《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严格固定的汇率能够消除引起通胀的融资活动，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对许多不能指望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贝尔这种主张固定汇率的观点大概可称为“固”派。与之大唱反调的则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他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做法是时代错误。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作出选择，要么和其他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汇率自由浮动使汇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

在“固”派与“浮”派之间骑墙的要算十月七日《华尔街日报》上的旧金山 LOG 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格林伍德，他在文章中说：“不论是实行固定汇率还是实行浮动汇率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旦作出选择，就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在格林伍德眼里，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的一条好汉。

关于国家监管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十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上强调：“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市场的条

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他把中国看成了因开放程度有限从而免遭这次危机伤害的正面例证之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撰文，埋怨自己的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方面走得太快。

与这些“管”派观点相对立，捷克总理克劳斯就以“动荡必然”论和“干预愚蠢”论的坚定开放形象，成为西方大多数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在非正式会晤中忠告台湾当局首脑萧万长，要“放开管制的手法，不要轻易干预”。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经济学家罗奇的访谈录，他认为东南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放宽对经济的管制”。他还说长痛不如短痛，“在这一方面，选择严厉措施的国家将会首先走出危机，而选择温和措施的国家从长远来说将遭受更多的痛苦”。显然，罗奇的这一“放”派主张代表了更多自由派人士的立场，也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政策。

关于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和自由化近年来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性共识。发展中国家想从一体化中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则想从一体化中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双方各有所图。而关税壁垒的拆除当然能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空间，使大家普遍受益皆大欢喜。但此次亚洲危机给有些人的

强烈印象是：强者的自由和弱者的自由并不完全等值，缺乏金融经验和有效金融机制的国家如果贸然进入一体化俱乐部，很可能受到强大投机资本的伤害。小学生和大学生能在一个场子里用同一种标准打球么？中国《改革内参》九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国外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也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再加上“国际资本可能从一国快速大规模抽逃”，因此“国外直接投资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同一篇文章还指出：“就单个市场而言，国际化程度越高，所受到的影响越大；就全球市场而言，一体化程度越高，发生全球动荡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十月间在印尼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大部分金融专家也认为，一体化的方向没有错，但考虑到利益均衡原则，眼下有必要对一体化进程“压步”和“减速”。

关于虚拟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杜拉克是这样对虚拟货币作出定义的：“它不符合金钱的任何传统定义，它是虚拟而非实值的金钱。它一天的交易量可能就相当于全球一整年贸易和生产投资的数额。”“由于虚拟金钱不具备经济功能，容易受到谣言和意外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易变性和恐慌。”美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高柏瑞也曾经说过：“市场的天性就是如此，尤其是金融市场。价格上涨，人人都想借机发财，大家投入股市。股价随着期望飚升，直到势必难免的崩盘为止。这与经济本身

毫无关系。股市投机活动有它自己的生命。”

两位学者也许并不意在虚拟经济作道德否定，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今年大获殊荣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没有兴趣，但他们无疑带有更多传统经济学的色彩，对来去无踪的虚拟经济有点忧心忡忡。台湾评论家王杏庆（笔名南方朔）在十一月九日香港的《亚洲周刊》上则运用虚拟经济概念对亚洲发出警告：“具有虚拟和准虚拟的国际金钱在全球纵横，流动快速，可以制造华丽的经济泡沫，但当它快速撤离，泡沫破裂，却又难免满目疮痍，亚洲汇市股市经过此次风暴，虽然不会像墨西哥那样一下完全抵消六年的全国努力，但各国仍应有所自省，重建更良好的基本面以及加强彼此的合作，或许才能重建‘亚洲奇迹’的另一个春天。”

在这里，与默顿和斯科尔斯对期权交易（虚拟经济的重要部分）的大举研究显然不同，王先生把“虚拟经济”几乎当成了“经济泡沫”的同义语，难掩自己溢于言表的厌恶情绪。王的这种态度当然无望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同。笔者十月间在香港遇到一位华裔美籍学者杨先生，杨先生就乐观地认为：“从货物交易到金融产品多样化及其期权交易，从实物经济到符号经济，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说，要一个人但只要他的上半身吧”。“虚拟经济有带来剧烈动荡和风险的一面，也有预测风险和降低风险的功能——如果我们运用

得不错的话。亚洲国家应对经济采取现实的态度，进一步开发金融市场，决不可实行躲避金融市场的鸵鸟政策和温室政策。”

### 结语：及时的前车之鉴

索罗斯至今没有把中国当作他的目标，甚至对狙击港元也没有信心，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要去打港元的主意。”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金融人士都没有考虑过中国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今年以来，很多炒家都悄悄地来中国踏勘。十月间，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也派了一个小组到中国内地四处转游。到了每一个城市，他们不会忘记租车环城跑上一圈，这当然不光是为了看看风景，或者寻觅美食，职业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看一看这个城市的卖不出去的新建空楼占有多大比例，就可以大致推算出银行里有多少收不回的呆账，整个金融系统存在着多高的风险。这是一种最为简单却大体可靠的办法。从广西北海到上海浦东，从深圳到杭州，他们看到了在泰国、印尼都曾经看到过的景象：几十幢几十幢的楼房闲置着，即没有卖出去也没有租出去。即使是北京、上海在房地产市场资料上显示出来的三成以上空房率，也一点不比曼谷低多少。

几年前，几乎世界任何一个港口里只要有船，只要有船在运钢材，你去问他们运往哪里，他们可能都会说：中国。这真是让人震惊。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工地，中国的发展热浪逼人。但那些钢材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不幸躺在这里晒太阳了，在这里睡大觉了——不，它们没有睡觉。对于资本的流通和运作来说，它们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共进午餐之后，高级经理彼得·丘舒斯先生对接待他的两位中国官员谈到这颗炸弹。使他震惊的是，官员耸耸肩膀，对收不回的贷款、资产价格上涨和工业能力过剩显得满不在乎。丘舒斯后来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惊呼：“他们完全采取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态度！”

中国这片大陆会不会陷入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漩涡？

十月过去了，十一月过了，十二月也将要过去了……中国仍然平安无事。《纽约时报》记者预言中由中国主演的“第三震波”并未出现。国内外专家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一）在一九九四年使货币主动贬值近三分之一，不存在东南亚币值被严重高估的隐患，而且出口一直强劲；（二）由于中国的外资结构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三分之二，而外债虽然庞大但其中百分之八十八是长期债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透露），不存在短期游资狂撤的风险；（三）由于人民币是非自由兑

换货币，暂时可以御投机炒家于国门之外；（四）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景气，政治制度足以保证宏观调控的行政力度，新闻导控可以及时遏制无谓的危机预期心理恐慌……这些因素足以使中国在这次亚洲震荡中“风景这边独好”。

当然，丘舒斯先生的观感并非虚构。就在丘氏在报纸上对中国好心告诫的同时，中国国务院智库部门专家的对策性研究报告一份份已提交国家高层领导。在这些报告里，作者们对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风险都作出了各自的全面沙盘推演，涉及到的问题当然比丘舒斯先生的所知还要多得多。从十月开始，有关讨论中国经济防范风险的文章在中央和各地报刊上也明显地大为增加。笔者曾在成都碰到一个做服装批发生意的普通个体户，“企业欠银行的钱，银行欠全国人民的钱，这一条鬼才看不到！”他瞪大眼睛说。他还侃侃谈到国有企业改制的难度和工人下岗的压力，谈到企业破产使大量银行呆账浮出水面，谈到社会上各种“灰色收入”不敢公开因此未能成为有效需求和投资，谈到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将会大大冲击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四十的外贸……四川人真是能说，四川人也真是敢干。他说他准备明年到西北去打油井，因为服装生意肯定不会好做了，沿海的出口企业肯定会要过紧日子了，相形之下，倒是可能在西北内地出现什么新的机会。

这位个体户的预测也许无须过于认真地对待，但经济学民间龙门阵都兴盛到这种程度，有个人样都能侃出一大套，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也许，很多富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从洋洋得意气壮如牛以及胡吃海喝中冷静下来，也是亚洲风暴赐给中国的一件副产品？

这是天赐良机给中国人一次恰是时候的警醒？

在我同这位个体户一起茶馆闲聊的时候，柜台里有两个小娃在打闹个不停。几个小贩前来推销水果，人民币眼下的坚挺似乎还让人捏得放心，几块钱差不多可以买上一堆。有一个女子在推销保险公司关于儿童的什么新险种。有两个尼姑则逢人出示红头文件化缘。货架上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则正好在播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既要化解境内的金融险情，又要抵抗境外的金融震波，靠改革来“攘外安内”的双重使命，将成为这次会议的严峻主题。

主席台上江泽民等五位政治局常委的面孔在屏幕上——推移过去。茶馆里的人都盯着屏幕，一声不吭。

全世界很多人现在也可能一声不吭。